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Applied History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亡國遺民鄭孝胥研究—以日記為中心

Survivors of the subjugated country CHENG HSIAO HSU Research

Focused on his diaries

研究生：莊大毅

指導教授：呂慎華

中華民國 一百一十三 年 一月

January 2024

摘要

鄭孝胥(1860 至 1938)字太夷，號蘇戡，生平經歷晚清至民國，鄭孝胥曾在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盛宣懷幕府中任職，主張預備立憲並熟悉洋務，在辛亥革命前主張借債造路及速開國會，民國成立後做為遺老參與復辟，1924 年進入遜清朝廷任職，1931 年隨溥儀參與滿洲國，使他在近代史上為一評價複雜的人物，鄭孝胥在 1910 年前往東北協助總督錫良簽訂錦瓊鐵路合同，即主張「借債造路」，及 1911 年清廷將鐵路收歸國有，鄭孝胥贊成鐵路國有，也大力主張「借債造路」、「包工之策」，這些主張在當時一般輿論顯得較為特殊，民國成立之後，鄭孝胥拒絕出仕民國，而認同遺老身分，也開始籌畫復辟，其復辟活動及思想內涵在不同時期也有不同的面向。

本文第二章討論鄭孝胥在 1897 年至 1911 年辛亥革命期間任官的經歷，包括鄭孝胥早年在盛宣懷幕中任職的經歷，辦理錦瓊鐵路草約的談判交涉過程，以及在保路風潮中鄭孝胥的鐵路國有主張，第三章主要討論鄭孝胥在民國成立之後的社交生活以及復辟活動，第四章討論鄭孝胥從 1924 年入宮至成立滿洲國期間的經過，以及其個人的思想及學說，本文以鄭孝胥日記及各當代人物日記、自傳、報紙為主，探討其思想以及其產生的背景，以及作為清朝遺老的活動經歷，試圖釐清鄭孝胥的人生經歷。

關鍵字：鄭孝胥、鐵路、遺老、復辟、滿洲國。

英文摘要

CHENG HSIAO HSU(鄭孝胥)(1860-1938) his courtesy name is TAI-I and SU-KAN. His life experience was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He once take charge of apparitor of LI- HUNG-CHANG (李鴻章), CHANG-CHIH-TUNG (張之洞), LIU-KUN-YI (劉坤一), SHENG-HSUAN-HUAI (盛宣懷), At that time He advocated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and **Self-Strengthening**. He advocated **borrowing debt and build the road** and **convene parliament** before Xinhai Revolution. CHENG HSIAO HSU remained loyal to the Qing Dynasty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e served in the **abdicated Qing Dynasty** (遜清朝廷) in 1923. He followed AI HSIN CHUEH LO-PU-YI (溥儀) to participate in the State of Manchuria in 1931. He is a complex figure in history. CHENG HSIAO HSU went to Manchuria in 1910 to assist the governor (東三省總督) in signing the Jinzhou-Aihun Railway (錦瓊鐵路)Contract, At that time he advocated **borrowing debt and build the road**. In 1911, the Qing Dynasty nationalized the railway, He supports this policy, At that time, He also advocated **borrowing debt and build the road** and **Contracting policy**, These propositions were considered quite special by public opinion at the time. After the Qing Dynasty was overthrown, CHENG HSIAO HSU refused to serve as an official in Republic of China, and Support the restoration of the Qing Dynasty, His thoughts appear somewhat different in different periods.

Chapter two of this article discusses CHENG HSIAO HSU's experience as an official from 1897 to 1911, Chapter three mainly discusses CHENG HSIAO HSU's social life and restoration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hapter four discusses He served in the abdicated Qing Dynasty and participate in the State of Manchuria, and his thoughts and doctrines.

The article uses CHENG HSIAO HSU 's diary and the diaries, autobiographies and newspapers of various contemporary figures, and Discuss his ideas and the context in which they were created, Study his life experience.

Key Word : CHENG HSIAO HSU, Restoration, railway, Manchuria.

序言

民國 109 年秋，我進入嘉義大學應歷系碩士班就讀，而論文題目決定研究鄭孝胥之原因，其淵源甚早，民國 101 年八月，我在家附近書店閒逛，偶然發現《紫禁城的黃昏》，為認識鄭孝胥之始也，然僅將其作為一清末民初之歷史人物而已，並未特別留意，越三年，購得《末代皇帝自傳》，由於書中溥儀對於鄭孝胥的描述及回憶較多，在讀過此書之後，才對鄭孝胥有更多認識。研究所第二年，思欲盡早決定論文題目，遍視諸領域，未嘗有中意者，因為有此一段淵源，便決定以鄭孝胥為題。又，此題目史料繁多，研究成果日新，自念學問不精，事先亦未詳細查閱目前的研究成果，便率爾決定，以今日觀之，實在魯莽滅裂之極也。

此論文之完成，賴有師長、父母、朋友的支持及幫忙，大毅銘感五內。

首先要感謝指導教授呂慎華老師，因我個性魯鈍，撰寫之初，茫然不知所以，在寫文章過程中，舉凡格式體例、史料蒐集、至研究方向，皆有賴老師悉心指教，才能從一極草率之文章逐步修正，至於論文口試之諸多事項，無一不有老師協助操辦，感謝老師。

感謝口試委員林志宏研究員、王超然教授，林志宏研究員指出許多論文中諸多舛錯，例如錯字及年號換算等，以及論文論點方面，王超然教授提供許多研究方向之建議，以及許多論文未能留意的史料，兩位委員的教誨，大毅受益匪淺，感謝兩位委員。

感謝父母在論文撰寫期間給予諸多支持及包容，其於寫論文期間之提醒鞭策，以及口試時之治裝、茶點準備等，若無父母諸多之扶持，則無此論文之完成，感謝父母。碩士班同學劉某及朋友葉某，平素常與大毅交遊，在研究史料之蒐集及論文之修正意見方面多有協助，子曰：「友直，友諒，友多聞」，誠哉此之謂也。最後，希望僅以此文微不足道之成果，能有裨益於後進之研究者，則亦足以下慰愚忱。

民國癸卯冬月莊大毅記於新北市土城

目錄

第一章 前言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	2
第三節 章節安排及史料說明	5
第二章 擔任幕府及辦理鐵路之經歷	6
第一節 鄭孝胥在盛宣懷幕	6
第二節 鄭孝胥與錦瓊鐵路	13
第三節 鄭孝胥之鐵路國有政策主張	21
第三章 民國時期的社交及籌畫復辟	28
第一節 鄭孝胥之社交	28
第二節 鄭孝胥對袁世凱及丁巳復辟的評價	42
第三節 鄭孝胥與陸榮廷的往來	48
第四章 1923 年後的活動及參與滿洲國	52
第一節 鄭孝胥入宮經過	52
第二節 逼宮事件與影響	56
第三節 鄭孝胥在天津時的活動與主張	62
第四節 鄭孝胥及滿洲國	68
第五章 結論	88
參考文獻	96

第一章:前言

第一節:研究動機

鄭孝胥字太夷，號蘇戡，生於 1860 年，卒於 1938 年，祖籍福建閩侯，其家族世習舉業，鄭孝胥幼年由父親鄭守廉、叔祖鄭世恭傳授經學，因此能熟讀經書，頗有文才，二十歲時 (1879) 娶福建船政督辦吳贊誠之女吳中照為妻，1883 年鄭孝胥參加會試失利，1885 年在同鄉陳寶琛的引薦下得入李鴻章幕府，李鴻章辦理洋務，使鄭孝胥能有接觸洋務並與李鴻章的部屬熟悉，1889 年鄭孝胥考取內閣中書，後分發為江蘇試用同知，1891 年經駐日公使李經方奏調，任日本公使館書記官，1892 年再經使日本大臣汪鳳藻上奏保薦，升任神戶大阪總領事，鄭孝胥在駐日期間悉心留意當時日本的明治維新，甲午戰爭發生之後回國，進入張之洞幕，¹ 授任商務局委員，1895 年劉坤一回任兩江總督，1897 年經盛宣懷咨調為鐵路總公司購料處總辦，1898 年因受張之洞薦舉而獲光緒帝召見，故得參與戊戌變法，上書直陳變法意見，宣統元年協助東三省總督錫良籌畫錦瑗鐵路，宣統三年協助盛宣懷擬定鐵路收歸國有的政策，辛亥革命之後，鄭孝胥以遺老自居，靜觀時局，後進入紫禁城輔佐宣統帝溥儀籌畫復辟，鄭孝胥也因為其所提出的「三共論」理念最終決定依靠日本勢力達成復辟，參與籌建滿洲國

鄭孝胥的經歷在無論在辛亥革命前後皆引發筆者的興趣，鄭孝胥在早年贊同變法維新，也因為其長年在各幕府中任職，而得到了實際參與政務與實業的機會，而其「借債造路」的主張在當時無疑顯得較為特殊，在宣統三年保路運動發生即因鐵路問題而起，可以說在當時「借債造路」主張在當時社會頗有疑慮，鄭孝胥究因何種原因而有此一主張？並且「借債造路」主張本身並未因為清朝滅亡而轉變，反而鄭孝胥於日後再度提出，故筆者希望究其本源，藉由鄭孝胥早年的經歷來研究此問題，又，鄭孝胥身為清朝遺老所做的活動也是研究的一大關鍵，雖然清朝遺老或稱遺民之群體，本身即有其特殊之處，然而考察遺民本身又可因其活動而有不同的分類，有的遺老，雖眷戀清室，但是並不參與復辟活動，反而專注在文化學術的著述方面，有的遺老則積極參與或籌畫復辟，鄭孝胥顯然更傾向後者，其在民國時代既然

¹ 此時張之洞以湖廣總督署理兩江總督，原兩江總督劉坤一在甲午戰爭中任欽差大臣，督關內外軍事，1895 年回任。

拒絕出仕民國，則其為了復辟有何種活動？其與其他復辟人士之間的關係為何？也是本文關注的問題，是故筆者即以鄭孝胥本人為研究對象，以《鄭孝胥日記》及其他史料來撰寫本文。

第二節：文獻回顧

有關鄭孝胥的研究大致分成兩種方向，其一為鄭孝胥在詩文以及書法等藝術方面的研究，其二為鄭孝胥復辟活動以及參與建立滿洲國等政治方面的研究，其在政治方面的研究著述以中國大陸為多，國內有關於鄭孝胥的研究較少。1985年胡平生的學位論文《民國初年的復辟派》，研究範圍大約自民國元年至溥儀就任滿洲國執政（民國21年）為止，敘述此一段時間各地復辟人士以及遺老的活動，作者在本文非常詳盡的呈現了史料及文獻，為民初遺老研究提供充分的研究基礎，至於對鄭孝胥的討論主要集中在第五章，並廣泛引用時人日記以及其他史料，對於鄭孝胥在1923年以後的行動有非常詳細的描述及考證。

1993年山室信一的著作《滿洲國の實相與幻象》，以作者原文言之，主要在探討滿洲國的「肖像」，具體而言為滿洲國的建國歷程，參與建國的日本人與中國人在其中所發生的作用，另外一方面是滿洲國的政府結構、國家理念實際上的狀態等，以此探討滿洲國的特性以及其在近代史中的定位，對於鄭孝胥的討論主要在第三章的〈龍歸故里——一場復辟大夢〉小節與第四章的〈荊棘之道——滿洲國承認與鄭孝胥〉小節，前者主要敘述關東軍選擇溥儀的背景以及鄭孝胥等復辟派遺老與日本方面的接觸，後者主要論述鄭孝胥任國務總理之後，其個人理想與實際上滿洲國情況的衝突，文中對於鄭孝胥在國務總理任上三年間的心理情狀以及對於關東軍不滿所做的努力有較多的著墨，頗能補充鄭孝胥在滿洲國時的經歷。

2009年林志宏的著作《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主要研究清遺民的認同主張以及其認同的基礎，藉此分析清遺民的心理以及動機，在中國進入近現代之後，清遺民作為認同傳統制度以及忠於清室的群體，往往被批評為保守或遭汙名化，然而清遺民因為習於前清時代的政治文化，無法認同民國時代的政治社會情況，正可以說明中國從傳統王朝轉型成現代國家的過程中，社會內部無法完全適應的狀況。在分析清遺民的認同方面，作者認為清遺民的認同實際上是以「複數的型態」來呈現，具體而言，許多清遺民的認同實際

上存在差異，有的遺民忠於清室，有的遺民則傾向認同傳統文化，將這些具有差異的認同合而觀之，才能形成一完整的清遺民認同內涵。又，作者認為清遺民相對於歷朝歷代的遺民有更多的差異，即中國在進入民國時代之後，傳統「王朝循環觀」遭到解構，此一變化也使清遺民更加失去了其作為遺民的立場。作者在文中第七章第三節中探討鄭孝胥的心理以及其理念，以鄭孝胥的經歷做為實例，說明其籌建滿洲國為試圖重建傳統社會秩序的努力，深入分析鄭孝胥的思想及主張，諸如恐共情緒、三共論、對狄克推多制的關注、王道思想等，並能以當時國內外政治情勢及思潮來展開說明，本文所分析之鄭孝胥的時代斷限大約為 1924 年至 1937 年，與《民國初年的復辟派》中鄭孝胥研究的時代大致符合，與胡著是不同的研究方向，正好相輔相成，對於了解鄭孝胥思想學說的脈絡甚有價值。

2009 年鄒金喜的碩士論文《鄭孝胥日本觀的轉變歷程》，作者側重探討鄭孝胥自 1891 年出使日本至民國二十六年成立滿洲國時鄭氏對日本態度的變化，鄭孝胥出身福建閩侯，其地方文風鼎盛，鄭孝胥家族亦世習舉業，因為此種家學淵源，使鄭孝胥早年出使日本時對於當時的明治維新頗不以為然，蓋其當時仍然認為儒學優於西學。殆至甲午戰爭後，鄭氏對於日本的觀念開始轉變，會德宗施行戊戌變法，鄭孝胥贊同變法維新，並一改前時輕視日本的態度，主張應聯合日本以實行維新。辛亥革命後鄭孝胥以遺老自居，為了復辟清朝而開始積極與日本接觸，此時的鄭氏也漸漸將日本視為合作者，對日本的態度亦趨於親善，直至滿洲國建立，兩者終因訴求不同而產生矛盾，鄭孝胥的理想最終無法實現。除此之外，作者對鄭氏的王道主義、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之間的異同做對比，對於思想及理論的部分有清楚的描述，前述之胡著及林著，儘管研究之方向不同，但大致上能發現兩者著重在鄭孝胥在 1924 年以後的經歷，本文關注鄭孝胥對日本的態度轉變，其與日本的關係非常深厚，是不同於復辟的另一個面向，但是將其合而觀之，便能呈現出其完整性，對於鄭孝胥研究而言，可謂是一種創新。

2011 年羅惠縉所著《民初文化遺民研究》，作者重點分析民國初年的文化遺民，整篇著作分成上下兩編，上編第一章論述遺民的構成，借助人類學「文化生態」以及社會學「場域理論」來定義民初遺民的身分構成，第二章論述遺民的政治認同與表現，例如支持復辟清朝

、堅持留辮、結廬守陵、堅持宣統年號以及倡導儒學等，第三章至第五章主要敘述遺民在文學、史學方面的著述成果，下編以王國維、章桢、劉聲木三位遺民為例，具體的研究文化遺民特徵，本文對鄭孝胥的討論以第一、二章為多，在第一章第二節「遺民構成」中以鄭孝胥日記、沈曾植《沈寐叟年譜》、楊鐘義《來室家乘》為蒐集遺民的樣本來源，其中對於鄭孝胥籌辦的讀經社、一元會以及其社交圈有詳細的整理，第二章對於鄭孝胥在民國時期的生活也有論述，例如鄭孝胥隱居上海，拒絕出仕民國，拒用民國紀年，行文仍用宣統年號，家中懸掛黃龍小旗等，皆是遺民認同的具體表現，對於了解鄭孝胥的遺民內涵頗有助益。

2013 年黃昱翰的碩士論文《重把乾綱握一滿洲國帝制之成立與時人認識》，主要研究滿洲國從共和國轉變為帝國的過程中，滿洲國政府與人民之間的互動關係，滿洲國既受日本扶植而建立，日本政府對外宣傳的建國理念以及其意識形態與滿洲國實際情況的落差，以及時人對於滿洲國以及末代皇帝溥儀的認識等，揆諸滿洲國的建國理念，如王道樂土等，意在發揚東亞國家的傳統文化、倫理道德以對抗西方帝國主義入侵，也成為了滿洲國在理念論述方面的基礎，惟此種理念與實際狀況存有落差，另外溥儀身為清朝末代皇帝又再成為滿洲國執政、皇帝，使許多支持溥儀的前清遺老將滿洲國視為繼承清朝的國家，至於東北地方民眾一方面由於日本侵略中國，使其對於滿洲國有懷疑以及不能接受，凡此皆造成滿洲國內部的矛盾，對於鄭孝胥的討論在文中第一章敘述滿洲國建國過程以及第二章論述鄭孝胥對於滿洲國的認識以及其活動，本文討論鄭孝胥的時代大約是 1924 年至 1935 年，作者詳細的分析鄭孝胥在滿洲國成立之後所作的〈滿洲國建國宣言〉、〈總理訓詞〉，與鄒著相較，鄒著第四章主要為分析王道主義，以探討鄭孝胥在滿洲國時期對日本的觀感及定位，至於鄭對於滿洲國的觀感則較少著墨，本文正好可以有所補充，雖然鄭孝胥並非本文的研究主旨，仍然非常有研究價值。

2018 年李君的著作《1931 年前鄭孝胥》，本文原著於 2011 年，為作者李君的博士論文經修改擴展而成，作者以鄭孝胥為研究重心，較為側重 1931 年前鄭孝胥的人生經歷，考量其人生遭遇與其思想學說、心態情感，以呈現鄭孝胥在時代變遷之下複雜的面貌，在撰寫方面除了廣泛蒐集報紙、時人日記以及其他奏摺議論等史料，作者在文中頗能注意同時代人物對

鄭孝胥的評論，以及兼論時代背景，俾利論述更加嚴謹，更為全面，在文章中的許多方面也運用鄭孝胥的《海藏樓詩集》作為史料，是為「以詩入史」，應證其論述，也是作者的一大特色，在林著及鄒著已有的研究成果之上，更加完整系統，已能對鄭孝胥有完全的認識。

第三節：章節安排及史料說明

本文之章節安排，擬於第二章討論鄭孝胥在 1897 年至 1911 年辛亥革命期間任官的經歷，本章分三部分討論，第一部分討論鄭孝胥早年在盛宣懷幕中任職的經歷，以及參與戊戌變法的經過，第二部分討論鄭孝胥往東北辦理錦瑗鐵路草約的談判交涉過程，以及速開國會的主張，第三部分討論在保路風潮的始末以及鄭孝胥的鐵路國有主張，第三章主要討論鄭孝胥在民國成立之後的社交生活，以及在這段時間的復辟活動，第一節討論鄭孝胥參與的一元會、讀經會組織及其活動內涵、日本人宗方小太郎、波多博的交往，鄭孝胥的家族，第二節討論鄭孝胥對袁世凱以及丁巳復辟的評價，第三節討論鄭孝胥與陸榮廷的往來始末，第四章討論鄭孝胥從 1924 年入宮至成立滿洲國期間的經過，本章共分四節，第一節討論鄭孝胥入宮任職的經歷，第二節討論馮玉祥逼宮事件的影響及鄭孝胥的行動，第三節討論鄭孝胥的「用客卿」、「三共論」的背景及內涵，第四節討論鄭孝胥參與成立滿洲國的經過，其擔任國務總理任內的政績，以及「王道主義」學說，又總結此段時期鄭孝胥的復辟思想

本文以鄭孝胥日記及各當代人物日記、自傳、報紙為主，藉與其有關之各當代人物史料，試圖釐清鄭孝胥的人生經歷，庶幾論述完整全面，在鐵路方面則使用各已出版之史料為主，例如《中國鐵路借款合同全集》、《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涉及國際交涉之方面則參照日本外交文書，以達到互相對比考證之效用。

第二章擔任幕府及辦理鐵路之經歷

第一節鄭孝胥在盛宣懷幕

1897年鄭孝胥進入盛宣懷幕，²深受盛宣懷以及湖廣總督張之洞的賞識，在盛幕及張幕中參與政務，是鄭孝胥任官的一段重要時期。鄭孝胥初次見到盛宣懷是在1897年2月26日，當時盛宣懷與幕僚張煥綸、何嗣焜、³時務報汪康年宴飲，鄭氏也受到邀請，但是他對盛宣懷的印象卻似乎不太好，「盛狀白皙微鬚，辭氣舉止圓轉輕便，只有瞻給之姿，而乏沉實之度」，兩日後何嗣焜拜訪鄭孝胥，稱「盛太常極相傾倒，屢促來沮英倫之行，如能見留，當於二月初入寧，言之硯帥，先諮調來滬，經商會公所事宜」盛宣懷對鄭孝胥極為欣賞，還希望派鄭氏往英倫，由於鄭氏在兩江總督劉坤一幕中，⁴故要將鄭調至上海，鄭原本不甚樂意「躊躇久之，遂應其請」，⁵1897年6月26日，鄭孝胥乘船抵達上海，盛宣懷任其為商會公所參贊，並由同鄉施滋卿、施小樵安排在長安里慶記樓下租房間。

鄭孝胥來到商會公所之後，參與的第一件事為通滬分機，通是指通州大生紗廠，滬指上海華盛紗廠，大生紗廠由張之洞委任張謇辦理，華盛紗廠前身為上海機器織布局，是以官督商辦形式，由李鴻章派候補道鄭觀應籌畫，但織布局在1893年燒毀，其後李鴻章再派津海關道盛宣懷為總辦，將織布局改名為華盛紗廠原址重建，⁶大生紗廠由於初期原來決定商辦，但因集股不順利，復由劉坤一將一批原由張之洞購置的紗機作為官股五十萬兩入股，再招五十萬兩商股，當時鄭孝胥在江寧商務局，⁷張謇也將紗機合同草稿給鄭囑稿，鄭也為張提出了一些建議，其後大生紗廠招集商股仍然困難，適巧盛宣懷在上海總辦華盛紗廠，於是將江督劉坤一紗機分為兩分，各做二十五萬入股，再各自招商股二十五萬，算是縮小規模。1897年8月10日盛宣懷告知鄭，大生、華盛改為同時並舉約款，8月11日鄭孝胥與何嗣焜共同參與

2 1896年張之洞、王文韶奏請設立鐵路總公司，並保薦盛宣懷任鐵路總公司總辦。

3 何嗣焜字眉生，南洋公學總理。

4 1894年11月2日劉坤一到京陛見，張之洞以湖廣總督署理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1896年1月2日劉坤一、張之洞各回本任。

5 1897年2月28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北京市：中華書局，1993年10月）第二冊，頁590

6 張玉法，〈清末民初的官督商辦工業〉，《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7期下冊（1988年12月），頁35至67。

7 1896年2月21日鄭孝胥受張之洞札委，充任洋務局提調及商務局差。

《通滬紗廠合辦約款》簽約，盛宣懷以及張謇簽約，8月14日鄭孝胥與張謇以及江寧商務局總辦桂嵩慶同見劉坤一，劉非常支持「極愆紗廠之成約」，⁸倒是總辦桂嵩慶因為對於合約不甚滿意，於是又由鄭孝胥及張謇兩人商改合約草稿，另一方面盛宣懷希望將其總辦的華盛紗廠租予洋商，鄭孝胥及劉坤一皆反對，「再三言華盛歸華商包辦尤善」，⁹10月盛宣懷將通滬分機事指派鄭孝胥辦理，於是鄭孝胥和盛宣懷從弟盛宙懷，紗廠翻譯以及英國工程師湯謨士等人討論紗機分運問題，其過程頗為曲折，待英國工程師湯謨士分單對號完畢，又兩次分裝延期，第一次眾人皆到，因裝運工人未到而作罷，第二次又因小工未到而延期，11月9日鄭孝胥往上海楊樹浦視察機器分運，分運工作一直到12月底才結束。

1898年4月23日，朝廷電召張之洞入京，張遂邀請鄭孝胥一同進京，張也致電盛宣懷要借鄭入都兩月。此次張之洞進京，係大學士徐桐推薦，有請張出面主持朝政的用意，¹⁰5月16日湖北省發生沙市事件，¹¹朝廷又命張折回本任，待事件處理完之後再行入都，等到事件處理完畢，軍機處電旨令張留在湖北，於是一同進京的事便作罷。此時張之洞甚是器重鄭孝胥，張在1897年8月26日在上奏朝廷的〈薦舉人才摺〉中推薦鄭孝胥，稱讚他「講求洋務，賅通透澈，能見本源，於商務尤為考求詳實」，¹²1898年1月1日，張之洞電召鄭孝胥往湖北商量要事，當時鄭孝胥剛結束視察機器分運的工作，殆至1月8日抵達湖北督署，「所言日本使人來勸聯英拒德事，南皮欲余偕日人川上者赴日一行」，¹³時德國佔領膠州灣，日本陸軍步兵大佐神尾光臣來湖北欲拜訪張之洞，勸張之洞與英日聯合以共同抗拒德國，張之洞深以為然，又致電劉坤一、直隸總督王文韶「今日宜兼聯英倭方令德俄稍有顧忌」，¹⁴故在1月1日電召鄭孝胥來湖北，希望鄭往日本一趟，但是鄭對於張的聯英日拒德俄的策略並不熱心，

8 1897年8月14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二冊，頁613。

9 1897年8月16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二冊，頁613。

10 茅海建，〈戊戌年徐桐召張之洞及楊銳、劉光地之陰謀〉，《中華文史論叢》，2007年第4期，頁356至357。

11 為湖北省沙發生招商局更夫與湖北船幫械鬥事件，械鬥中有人放火延燒導致日本駐沙市領事以及郵局遭焚毀。

12 〈薦舉人才摺〉，光緒23年7月29日，收入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北京市：中國書店，1990年10月），頁3314。

13 神尾光臣除了希望中日聯合之外，還希望張之洞能派遣學生赴日學習武備，事見〈致江寧劉制台〉，光緒23年11月29戌刻發，收入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頁11036。

14 〈致江寧劉制台天津王制台〉，光緒23年12月初10日亥刻發，收入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頁11040。

藉故拖延，此事卒無結果，¹⁵從張之洞向鄭諮詢聯日事宜以及薦舉中可見張對於鄭的重視，1898年朝廷上諭，要求各督撫薦舉人才「平日所知品學端正，通達實務，不染習氣者，無論官職大小酌保數員」，¹⁶張之洞再次薦舉鄭孝胥(1898年7月19日)，此次保薦，使鄭孝胥獲得進京預備召見的機會，臨行之前，先往湖北見張之洞，痛論「舉世皆方共保護積弊，非變法之世也」，勸張之洞「兩湖，天下之中也，極當養士、勸商、興工、勵吏，以待北方之變」，¹⁷鄭孝胥甚至勸張之洞，趁當時伊藤博文來華之時「薦為客卿」，在當時主張變法的官員有鑑於伊藤博文在明治維新的經歷，傾向借用伊藤博文的才能，使其有利於變法維新¹⁸，雖然反對者大有人在，鄭孝胥或因其辦理過洋務以及曾出使日本，思想不至守舊之故，倒是不做此想，這幾項建議，對於積極推動新政的張之洞而言，比較能接受，然而對於用伊藤博文為客卿則頗有疑慮。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從鄭孝胥所提「北方之變」，看出鄭對於判斷當時政局的敏銳，1898年6月15日即戊戌變法剛開始的時間，深受德宗信任的翁同龢遭開缺回籍，鄭孝胥認為「翁去則上孤，而太后之焰復熾，滿朝皆傖楚，亡在旦夕矣」，¹⁹這或許就是鄭所指的北方之變，後來的變化證明鄭的判斷非常精準。

鄭孝胥向張辭行之後自8月22日搭船，25日抵達大沽，1898年9月5日獲召見，關於此次召見的情形：

奏對約二刻，并呈說帖，上色甚霽，聖躬似頗瘦弱，余對時音吐稍響，上謙挹異常，呈說帖尚未及案，上引手受之，略批覽，即欠身曰可留覽之，余乃起退下。²⁰

日記紀載的召對過程似乎是很快就結束了，在9月17日鄭孝胥做〈七月二十日召對紀恩〉詩，詩中也寫了一些召對情況，其詩曰：

皇帝破資格，不忽一士微。何來江南丞，是日登丹墀。曉色麗禁闥，流光度罽毼。
內官肅前導，屏氣當簾帷。大哉本朝法，獨對無所疑。榻前咫尺地，君臣義在茲。
天容何清凜，堯顙高嶷嶷。咨汝應盡言，愀然聞累欬。於時實忘身，長跼紛陳辭。

15 1898年8月13日鄭孝胥在進京之前往湖北見張之洞，張之洞希望鄭孝胥能為湖北留日學生送行。

16 〈保薦使才摺〉，光緒24年6月初1日，收入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頁3436。

17 1898年8月13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二冊，頁671。

18 雷家聖，〈失落的真相-晚清戊戌變法時期的合邦論與戊戌政變的關係〉，《中國史研究》第61輯，2009年8月。

19 1898年6月17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二冊，頁662。

20 1898年9月5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二冊，頁675至676。

臣聞立國本，有備乃不危。積弱非一朝，無兵絕難支。願言示所急，舉國知所歸。
以我億兆人，潰此千萬圍。致死而後生，其端自毫釐。士夫躬為倡，事實不可遲。
禍來倖丘山，甫去皆燕嬉。初無憂患情，何從振其衰？所陳第一義，舍是非臣知。
忠憤見聲色，封章出諸懷。上意為之動，引手受所齎。再拜奉身退，踟躕獨含悽。
耿耿宮燭光，搖搖在心脾。²¹

此詩堯顙至不危七句，大致描述德宗發問，鄭孝胥答的過程，積弱至萬圍六句，為指甲午戰爭敗給日本，忠憤至心脾八句則大致寫鄭孝胥答完，德宗接奏章，鄭再退下。此詩大意與日記所記相差不大，但增加許多心情描寫。9月9日鄭氏授總理衙門章京行走，沒多久，鄭氏就上《敬陳變法大要》奏摺。此奏摺的要義在於求實及好奇兩點，求實即練兵造械，關於練兵，鄭氏已在召對時指出，奏摺再提，雖然殊途同歸，但是強調不同的面相「我苟能戰，則彼或猶有憚，我苟不能戰，而欲以學問教化之事折其凌侮之心，此必不可恃者也」，而好奇者即勸德宗需要有主見，不能將所有意見照單全收，而須以求實為先，「臣下以好奇為務其弊猶小，君上以好奇為務其弊甚大，願我皇上於廣開言路之下必持一安危緩急之定見」，²²可見鄭孝胥雖然贊成改革，但應是支持緩慢但實務的方向，可以說是既不守舊亦不激進，是鄭孝胥的思想的特點，鄭孝胥對於當時主持維新變法的康有為等人甚為不滿，認為「跡其心術，則借本朝之榮寵以為號召黨徒之資，按其學術，則襲西國之毛皮以開空疏剽竊之習」，並預言「此曹不能成氣候，而興亂則有餘」。²³從鄭孝胥的詩作及兩次上奏摺來看，可看出其對於德宗的召見是非常重視的，雖然為總理衙門章京，惟就整個變法而言，鄭孝胥並未能發揮其影響力，例如與其同日召見的譚嗣同，²⁴在召見當日即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參預新政，以官職而言譚嗣同相較於鄭孝胥，更接近中樞，鄭孝胥所上《敬陳變法大要》奏摺內容也似乎未獲德宗特別注意。²⁵9月10日張之洞致電總署，通知總署，由他保舉而入京觀見的錢恂，已經決定派其赴日本會商互派留學生事宜，「今外部催其速往，可否於召見後即令該守速

21 鄭孝胥著，黃坤、楊曉波校點，《海藏樓詩集》（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88至89。

22 國家檔案局明清檔案館編，《總理衙門章京鄭孝胥摺》《戊戌變法檔案史料》（北京市：中華書局，1958年4月），頁11。

23 1898年9月6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二冊，頁677。

2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上諭檔》（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4冊，頁344。

2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上諭檔》，第24冊，頁403。

回鄂，以便赴東」²⁶，張之洞所說的事即前述之日本大佐神尾光臣請張之洞聯英日拒德並派遣留學生赴日學習武備事，在 1898 年 1 月時張之洞原有意派鄭孝胥前往日本會商，惟鄭孝胥對此並不積極，後乃派錢恂前往，據學者茅海建考證，張之洞此時已經查覺到北京局勢不穩，故急欲錢恂離京，以免受到牽連，²⁷此事除了可見張之洞對於聯英日拒德之策非常積極之外，也顯示他對於錢恂的重視，似在鄭孝胥之上。

9 月 18 日上諭命康有為速赴上海，20 日林旭來找鄭孝胥，²⁸告知現在形勢危及「上勢甚微，太后命新章京所簽諸件自今日呈太后覽之」，鄭孝胥認為情勢緊急，請林旭盡快免去張蔭桓官職，以圖保存，張蔭桓因熟悉外交事務而為德宗器重，為總理衙門大臣兼戶部左侍郎，又與康有為相互往來，故鄭孝胥建議林旭「張蔭桓尚在，惟有逐之以息眾謗，則或可免禍耳」，²⁹21 日慈禧太后重新垂簾聽政，由於康有為已經前往上海，故搜捕其弟康廣仁，以及其他維新派人士，9 月 28 日戊戌六君子被斬，此前張之洞聞訊曾致電湖北布政使瞿廷韶，請他聯絡直隸總督陳夔龍，設法解救楊銳，³⁰最終無果，而變法中的新政也逐一被廢，鄭孝胥其後到寺廟悼念曾與其來往的林旭、楊銳，哀嘆「從此又是偷生世界，亡可立待矣」，³¹也無心政務，幾次請假未能獲准，已有歸志，在 10 月 21 日甚至原本要派鄭孝胥任職總理衙門的俄股，最終請病假回到上海，雖然總署要求兩個月病假結束仍然要回來供職，但鄭孝胥未再回到總理衙門，而是繼續在盛宣懷幕中。

鄭孝胥回到上海之後，隨即接到盛宣懷的邀約共同前往湖北，此次到湖北主要係盛宣懷請鄭擔任盧漢鐵路總辦，籌辦鐵路相關事務。盧漢鐵路的建造倡自張之洞，1889 年 4 月 2 日（陰三月初三）張之洞上奏〈請緩造津通鐵路改建腹省幹路摺〉，以國防以及經濟等角度陳說利害，緩造津通鐵路，改建腹省的盧漢鐵路「宜自京城外之盧溝橋起，經行河南，達於湖北

26 〈致總署〉，光緒 24 年 7 月 25 日亥刻發，收入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頁 11199。

27 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二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 年 12 月），頁 181。

28 林旭字暉谷，福建侯官人，1898 年詔授軍機章京，參與變法，為鄭孝胥好友沈瑜慶女婿，日記中初次提及在 1894 年 12 月 9 日，後世將林旭與譚嗣同、楊銳、楊深秀、劉光第、康廣仁合稱戊戌六君子。

29 1898 年 9 月 20 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二冊，頁 681。

30 〈致京湖北臬台瞿〉，光緒 24 年 8 月 11 日亥刻發，收入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頁 11209。

31 1898 年 9 月 26 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二冊，頁 683。

之漢口鎮」，³²全路分成四段，共八年完成，後朝廷贊成張之洞的建議，令李鴻章、張之洞、總理海軍事務衙門妥籌辦理。但一年之後(光緒十六年 1890)，由於東三省情勢危急，俄國開始修築西伯利亞大鐵路，有鑑於「朝鮮弱小不足自存」，³³於是又緩造盧漢鐵路，急造由營口至琿春的關東鐵路，其勘路購地等事亦未開始，便暫停工程。1896 年張之洞召盛宣懷赴湖北，討論盧漢鐵路事，後決定成立盧漢鐵路招商總局，由盛宣懷任總辦，盛規劃成立公司，並先招華股兩成，其餘八成由公司借洋債組成，後續再陸續招集華商股份籌還，以本段鐵路抵押，分期三十年攤還，³⁴遂由湖廣總督張之洞、直隸總督王文韶將盛的建議上奏朝廷獲得准許，於是成立鐵路總公司，盛宣懷任督辦，1896 年盛宣懷到上海開始辦理公司事宜，並由張之洞飭令各省督撫幫同招股，至於洋債方面，盧漢鐵路吸引了英法俄等國的投資意願，最終在 1897 年 7 月 24 日與比利時簽訂借款合同。

鄭在 1898 年 11 月 18 日抵達漢口，隨即前往見張之洞，談論朝政近況，29 日盛宣懷極力向鄭孝胥提議就任盧漢鐵路總辦，「蘆漢宜得一全路大總辦，吾熟念此事無如君者，昨語南皮，亦無異詞」，³⁵此處盛宣懷已經將此一提議向張之洞提出，張也同意，但鄭孝胥考慮到鐵路總辦一職勞心費神，並不打算接下，「胥自度于此不能有益于督辦，故不敢承也」，³⁶12 月 19 日盛宣懷派鄭孝胥往南京協助兩江總督劉坤一處理滬寧鐵路購地事宜，再次堅請鄭擔任鐵路總辦「盧漢鐵路總辦，吾終以奉煩，不可卻也」，³⁷12 月 20 日晚上盛宣懷邀鄭飲酒，又再提出請任鐵路總辦，這次鄭孝胥答應了，但提出盛需要協助達成宗旨三端「一去把持，二戢荒廢，三止冗濫」，總算答應就任總辦一職。

1899 年 1 月 21 日鄭孝胥抵達漢口的鐵路公司，並閱覽地圖及執事表等，由於鄭孝胥在九月授總理衙門章京，只不過請假而來湖北，於是張之洞決定讓鄭暫時代理，殆日後向朝廷奏調。鄭孝胥為漢口至河南路段總辦，其購地、勘路、造路、監工等事皆歸其管理，而勘路事

32 〈請緩造津通鐵路改建腹省幹路摺〉，光緒 15 年 3 月初 3 日，收入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頁 1941 至 1958。

33 宓汝成編，《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 年)，上冊，頁 188。

34 宓汝成編，《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上冊，頁 253 至 254。

35 1898 年 11 月 29 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二冊，頁 697。南皮指總督張之洞，日記中提及之南皮、廣雅、香帥等皆為張之洞名號。

36 1898 年 11 月 29 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二冊，頁 697。

37 1898 年 12 月 20 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二冊，頁 703。

務主要由鐵路公司的比利時籍總工程司沙多負責，³⁸黃河路段則由另一位比利時工程司盧法爾負責，再由沙多定期向鄭孝胥報告勘路狀況，鄭孝胥則不定時視察各工程。1900年2月鄭孝胥向張之洞上說帖「請調德安府練勇十名駐武聖關南段」，³⁹此時主要為了保護鐵路施工，其實盧漢鐵路施工，即不時發生意外，例如1898年3月曾發生橋工水壩塌陷，壓傷工人事故，當時鄭孝胥與比籍工程司沙多親自到現場查看，並調派升字營駐在工地，3月12日有民眾阻擋勘路員事件，6月15日有工頭毆傷局勇事件等，1900年3月鄭孝胥再上說帖請調派營哨赴工地巡視，張之洞也准調鐵路護營巡視各鐵路，但是五月以後再派兵保護鐵路則又與此時不同，五月北方義和拳亂起，比籍工司沙多即與鄭孝胥商量增派營哨，六月日本書記杉山彬被甘軍董福祥部殺害，德國公使克林德被神機營恩海殺害，鄭孝胥閱報得知北方的消息後，預判「太后必將西幸，皇上其危矣，傷哉，自古亡國未有若是之速也」，⁴⁰八國聯軍之役後，鄭孝胥作〈感憤詩〉四首，其第一首詩曰：

群昏自稱豪，一奮碎神器。罪魁有三士，不在徐剛輩。榮光首拒戰，咋舌敵已怪。

聶馬久枝梧，彼族嗟強對。朝中輕諸子，謂虜不足畏。何虞果掩至，很復得狼狽。

脫令津沽間，海城早為帥。微聞金鼓震，萬眾已崩潰。牽羊必肉袒，所全詎百倍。

京師安如山，完取十萬械。吾言匪詭誕，嚼血聊自快。⁴¹

此詩群昏一句似乎指義和團拳民，罪魁二句似乎指徐桐、剛毅二人並非庚子禍首，聶馬一句指聶士成率部拒戰，⁴²朝中一句則有指責朝廷之意，粗略分析此詩的文意，可以知道鄭孝胥對於朝廷在處理義和團以及八國聯軍之役是不滿意的。盛宣懷已經在6月13日致電鄭孝胥商量撤離洋員監工，7月3日更指示鄭「工次如有耗亂，即可逕行停工」，⁴³鄭孝胥開始派人迎回各路測量員並發給洋員槍枝，鐵路工程也暫時停止，8月15日張之洞命鄭孝胥為湖北全省營務處總辦，離任鐵路總辦，9月23日任武建軍監操官，1902年岑春煊奏請調派鄭孝胥為四川省商礦大臣，⁴⁴朝廷命鄭孝胥以江蘇候補道發往四川，隨岑往川省辦理商礦事務，1903

38 讓·沙多，Jean Jadot (1862至1832)，比利時鐵路工程師，1898年起擔任盧漢鐵路總工程司。

39 1900年2月4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二冊，頁748。

40 1900年6月15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二冊，頁760。

41 鄭孝胥著，黃坤、楊曉波校點《海藏樓詩集》（增訂本），頁111。

42 徐桐（1819~1900）字豫如，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剛毅（1834~1900）字子良，官至吏部尚書。

43 1900年7月3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二冊，頁762。

44 此時為四川總督。

年岑春煊調任兩廣總督，乃請鄭孝胥隨同赴粵，1904年為候補四品京堂督辦廣西邊防，1905年辭官返回上海。

第二節 鄭孝胥與錦瓊鐵路

甲午戰爭以後，俄國聯合德法干涉，使清廷贖回遼東，但亦導致俄國以此為要脅，積極在東北擴張，當時俄國正在修築西伯利亞鐵路，欲將西伯利亞鐵路與海參崴連接相通，以鞏固俄國在太平洋的勢力，⁴⁵此後俄國藉著鐵路、租界以及《中俄密約》、《合辦東省鐵路公司合同章程》、《旅大租地條約》等條約章程，已經幾乎掌握東北，此舉導致與日本關係緊張。在庚子拳亂之後，俄國原本基於《東三省交收條約》必須撤兵，然而其後拒絕撤兵，⁴⁶日本注意到此一情況，也引起日俄關係緊張，時任內閣總理大臣桂太郎在對俄交涉伊始就有開戰的覺悟，因為當時俄國在鞏固滿洲勢力的同時，也企圖擴張在朝鮮的影響力，對日本而言不啻是一種威脅，是故桂太郎內閣在對俄交涉的方針中提出「滿韓交換論」，⁴⁷亦即承認俄國在滿洲的勢力以換取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的勢力，惟交涉過程並不順利，最後終於發生日俄戰爭。⁴⁸日俄戰爭之後東北局勢日益緊張，為了東三省防務需要，東三省總督徐世昌及錫良開始籌畫修建一條東清鐵路以外的鐵路，最終決定路線由錦州繞小庫倫（今內蒙古自治區通遼市庫倫旗）至洮南，再修築齊齊哈爾至瓊瑋路段，是為錦瓊鐵路，復因財政短絀之故，為了修建鐵路，決定以招商引資，借債造路的方式盡速修築錦瓊鐵路，才能鞏固東三省邊防。

1910年1月，鄭孝胥前往奉天省籌辦錦州瓊瑋鐵路事，⁴⁹1909年8月7日時，鄭孝胥就收到奉天巡撫程德全的書信，邀請他遨遊奉天，鄭孝胥本人也是肯定錫良的開放政策的，1910年1月3日奉天諮議局議員永珍、劉興甲來上海拜訪鄭孝胥，表示諮議局議員反對錦瓊鐵路計畫，「謂徒引外人操戈入室，錫帥則言東省非開放不可」，奉天地方紳民是持反對意見

45 羅曼諾夫著，民耿譯，《帝俄侵略滿洲史》（臺灣學生書局，1973年），頁35至47。

46 王彥威、王亮編，《清季外交史料》，卷171，第2811、2813頁

47 德富猪一郎著，《公爵桂太郎傳坤卷》（東京市：故桂公爵記念事業會，大正6年），國立臺灣圖書館，頁157。

48 張守真著，《清季東三省的鐵路開放政策》（高雄市：復文圖書出版社，1995年），頁79。

49 1910年1月24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1224、1225。

的，而錫良身為總督，面對內外交困之局，顯然心力交瘁，故而也無力再與地方紳民會商，而鄭孝胥則認為「民不信官，故有此見，不足怪也，然閉門非策，能擇人與之馳逐，外人亦不足懼」，「必官對於民先行開放，使三省人民皆能起作主人，而後可言對外開放爾，錫帥嘗託人邀我，如東三省人民願以我為總代表，實行開放之策，則吾當借箸一籌」，⁵⁰願意幫助錫良來化解督撫和紳民之間的矛盾，並且參與整個開放均勢政策的施行。1910年2月13日時鄭孝胥即已擬定錦愛鐵路包工合同二十款，隔日程德全拜訪鄭孝胥，表示錫良讀了鄭氏所擬合同「意頗欣愜」。除了草擬合同之外，鄭孝胥初到東北，大約做了幾件準備工作，其一為了解東三省產業及資訊，其二為拜會奉天諮議局議長、議員以及督撫幕僚等，例如，鄭孝胥在日記中詳細的抄錄《東三省日報》中登載日本大藏省理財局所作的《滿洲經濟觀》一文，大約的統計滿洲的總人口及可耕地等資訊，又如《帝國日報》登載的美國記者所撰寫之滿洲調查，大要為滿洲的氣候、地理以及礦業、林業等各式自然資源，其他又有俄國報紙紀載的俄國在西伯利亞開發事宜，鄭孝胥特別抄錄東三省調查隊，詳細列出東三省的大豆、小麥、高粱、豆油等，可見鄭氏注意蒐羅報紙資訊，了解東三省的地理、物產等，並且從上列資料可知分別自日美俄三國而來，顯示鄭氏在蒐集東三省資訊的同時也是廣泛注意各國的訊息的。

1910年2月19日鄭孝胥拜會奉天諮議局議長吳景濂以及副議長孫鼎臣，並提出成立地方自治聯合會、盡速開墾東三省等建議，「三省事急如弈棋之殺角，非有救亡政策、救亡手段不足自存，絕非拘常襲故者所能保守也」，⁵¹是為前述的代為勸解奉天地方紳民的工作，並且鄭孝胥也為錫良出謀劃策，兩人互相合作頗為順利，鄭氏還時常與錫良的幕僚以及以及其他東三省官員會商合同事宜，錫的幕僚如鄒懷西、劉仲武，吉林交涉司鄧邦述(字孝先)等，尤其是鄧邦述，鄧氏負責與司戴德⁵²交涉，可說是與司戴德最為熟習之人，並且也受錫良鄭孝胥之託進京與各部臣接洽，在整個錦瓊鐵路合同簽訂之中頗顯重要。

1910年2月20日美國奉天總領事伏設耳通知錫良，⁵³司戴德已經將所擬的詳細合同寄來，並希望約在天津會商，值得注意的是，當錫良幕僚韓國鈞詢問該領事日俄阻撓的對策時，

50 1910年1月3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1220至1221。

51 1910年2月19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1233。

52 司戴德，Willard Dickerman Straight(1880至1918)，1906至1909年任美國駐奉天總領事。

53 伏設耳，Fred D. Fisher，1910至1914年任美國駐奉天總領事。

該領事曰「美國雖軍備未完，彼必不敢輕肆，昔朝鮮因不受美國之扶助，以有今日，吾望中國勿為第二朝鮮也」，⁵⁴該美國領事所指，雖然沒有明講，但揆諸朝鮮歷史，當指朝鮮高宗八年(即同治十年 1871 年)的「辛未洋擾」，⁵⁵當時情形頗似日本黑船事件，所不同者在朝鮮朝廷自始至終嚴厲駁斥並拒絕美國的通商提議，在經過一番戰役之後，美國撤退，朝鮮王朝得持續其鎖國政策，1875 年發生江華島事件，1876 年朝鮮與日本簽訂《江華條約》，⁵⁶直到甲午戰爭後，清朝退出朝鮮，復經日俄互爭勢力，終於在宣統二年遭到日本併吞，在該領事會見幕僚韓國鈞之時，雖尚未到併吞之時，但日本在日俄戰爭之後擴大在朝鮮影響力乃不爭之事實，此一番話大概在勸錫良等東三省官員堅持其引進外商，開發東北的政策，而此政策也符合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亦自然之理。2 月 28 日 錫良指示交涉司鄧邦述轉告司戴德「此次議約由鄭君主持，而以鄧邦述、金還佐之」，⁵⁷一面告知鄭孝胥等司戴德的合同寄到研究之後再赴天津開議，3 月 14 日，鄭孝胥與司戴德、英國寶林公司代表會晤，會商借款正和同以及包工合同，期間外務部屢屢電致錫良表明合同應從緩議，錫良無奈之下仍指示鄭孝胥「以口商，不動筆墨為主」，⁵⁸一面又請交涉司鄧孝先赴外務部陳說利害，而外務部要求緩議的原因，顯然是遭受日俄兩國的壓力所致。此時日本正思積極干預，1910 年 2 月 7 日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即以電報訓令駐清公使伊集院彥吉，表明日本政府雖然贊成錦瑗鐵路之興建，但作為條件需要日本參與，⁵⁹14 日伊集院即將此但書告知外務部尚書梁敦彥，俄國公使廓索維茲亦在 3 月 2 日向外務部聲明，錦愛鐵路建成對東清鐵路的利益虧損甚鉅，並提議改設路線由張家口至恰克圖，並且中國建造張恰鐵路時「應准由俄資本家承辦庫倫至恰克圖一段鐵路」。⁶⁰儘管在外交方面阻力甚大，在錫鄭二人積極活動交涉下，合同終於在 5 月 14 日全數談妥，等待部議批准，6 月 30 日鄭孝胥收到錫良來信，稱「因日俄協約不日宣布，監國諭樞府轉囑速

54 1910 年 2 月 20 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 1234。

55 《朝鮮王朝實錄》，高宗實錄，八年四月至五月，國立臺灣大學數位人文研究中心朝鮮王朝實錄（[조선왕조실록](#)）系統，頁 137。

56 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第九卷第一冊，頁 115 至 119。

57 1910 年 2 月 28 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 1238。

58 1910 年 3 月 15 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 1244。

59 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第四十三卷第一冊，頁 460。

60 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第一版，1979 年），卷五，頁 275。

辦錦瓊路事，已電催樞部請將合同核覆以便入奏，葫蘆島亦已議准，諸事即應預備」，⁶¹此處葫蘆島，指在此次錦瓊鐵路興築一事中一併商議的葫蘆島築港工程，葫蘆島地近秦皇島，朝廷各部意見對興建葫蘆島港口借款一事態度一直傾向反對，5月20日鄭孝胥收到度支部信稱「葫蘆島口岸可俟錦瓊鐵路議成乃議之」，⁶²7月11日部議葫蘆島事需要自募公債，顯然是不願再募借更多外債，情況不容樂觀，再加上錦瓊路事也尚未批准，錫良乃催促鄭孝胥回奉天，8月24日鄭氏抵奉，兩人會談之後決定進京赴部會商。

錫良進京後，雖然積極活動，四處奔走，惟仍遭外務部總理大臣慶親王奕劻以及軍機大臣那桐否決，最終錦瓊路事仍無法批准，錫良甚至準備以兩匹馬作為活動之用，鄭孝胥則甚為憤恨，批評道「監國暗弱，慶那皆狂呆橫肆，必不能久」，⁶³監國攝政王載灃秉性優柔寡斷，本來即不容易堅持主見，而當時清朝正在推行憲政以及幣制改革等政策，因此經濟狀況甚為困窘，導致中央各部的意見較為謹慎。而在外交方面，日俄兩國向來密切注意錦瓊路事，雖然都表示在附加條件的情況下願意協助，但基於其國家利益，本都傾向反對，就在錫良進京奔波勸說的同時，日俄兩國在7月30日達成協議，⁶⁴即第二次日俄協定以及日俄密約，雙方延續自從《樸茨茅斯條約》以及第一次日俄協定中的共存方向，此次協定日俄雙方互相承認在滿洲的特殊利益，並且互不侵犯，共同維持此一現狀「特殊利益如感受威脅時，兩締約國同意採取防衛此種利益之辦法」，⁶⁵顯然是為了防備清朝以及美國而加強彼此的合作關係，而美國奉天領事司戴德為了錦瓊鐵路事能順利推行，在6月22日曾赴俄國會商，希望取得俄國理解，使其不至繼續反對路事，惟俄國態度強硬，會商絲毫不見成效，⁶⁶外交局勢極為不利，整個錦瓊鐵路至此已經形同失敗。

雖然形勢嚴峻，但鄭孝胥、錫良並未放棄，仍然積極透過各種方法積極向朝廷遊說借債造路之策。9月9日錫良、瑞澂進京會奏，由鄭孝胥寫奏摺稿，奏摺中提到「今日種種之設施

61 轉引李君著《1931年前鄭孝胥》（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9月），頁142，「鄭孝胥1910年致程德全書信」圖。

62 1910年5月20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1256。

63 1910年9月1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1273。

64 第二次日俄協定以及日俄密約之中譯本見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卷五，第289頁至291頁，日文見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第四十三卷第一冊，第二回日露協商一件，頁153至154。

65 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卷五，頁289至291。

66 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卷五，頁276至277。

具非解決根本之論，尤屬緩不濟急，為今之計惟有實行借債造路可為我國第一救亡之要著」在這封奏摺中，⁶⁷鄭孝胥將借債造路提升成為救亡政策的程度，借債尤為其重點，鄭氏借債分成內外二層來講，當時清朝正在籌備立憲以及幣制改革，無一不是需要鉅款則不能籌辦，惟朝廷財政困窘，「今度支部預算各省歲入歲出，不敷者四千萬之鉅，其外預備增款尚有未開列者，將來又不知至何地步，非借外債必不能預防危險」，此即是外，另外一策為造鐵路，鄭氏認為「凡百政令全恃交通之便，凡百生利莫如鐵路之速，請朝廷速定大計，指定我國極應興築之粵漢、川藏、張恰、伊黑四段幹路，准以本段鐵路抵押募借外債至少十萬萬為度」，無論朝廷還是民間，都以抵押的方式募借外債，鄭氏認為如此一來，歐美各國「必競輸財於吾國」，而中國得以財政充裕，並且牽制列強，進而達到弱敵的效果，同時也能使立憲之推行更加順利。除此之外鄭氏也在報紙上投書，宣傳其「四大幹路說帖」，⁶⁸當時鄭孝胥為立憲公會會長，致力推行立憲，此處奏稿藉由借債救亡連結至立憲，可以視為一種變化，即從原來的鐵路政策轉變為救亡的國策。就在會奏的同一天，雲貴總督李經羲向各督撫發電文，稱「舊政輪廓難存，新政支離日甚」，⁶⁹認為當時朝廷之種種亂象的原因，在於無主腦「求人才人才愈不出，其大難則在無主腦，諸部各自為謀而無審國情量國力聯合主斷之之人」，李氏的電報內容訴求雖然與借債造路並無直接關聯，各督撫仍然討論熱烈，鄭孝胥看到李經羲的電報，立即在隔天(1910年9月10日)為錫良、瑞澂擬了一道回應李經羲的電文，「仲帥微電，深切洞達，同抱憂懼，竊謂憲政九年之預定，十一部同時之進行，中國無此財力，半途而廢，已可預決，非有從重要處入手之辦法，則財盡民斃，盡在意中」，至於鄭孝胥所謂入手辦法，則仍然主張從借債造路來入手，「以後鐵路陸續告成，行政之易亦如破竹，民間風氣自開，收效之速何止十倍」，⁷⁰鄭孝胥在電文中並無直接回應李經羲的討論，雖然贊成開國會意見，仍然對外力倡借債造路。江蘇巡撫程德全，載灃及度支部尚書載澤皆反對借債造路說，載澤提到：「本部堂亦知假外人財力興中國實業，本為救時之舉，第恐辦理不善，或任用非人，則

67 「借債築路大問題」，《東方雜誌》第九期，記載第三中國時事匯錄，臺北市：臺灣商務所書館，頁18311至18317。

68 原載於《蜀言報》宣統三年六月初六日。

69 「借債築路大問題」，《東方雜誌》第九期，記載第三中國時事匯錄，頁18311至18317。

70 「借債築路大問題」，《東方雜誌》第九期，記載第三中國時事匯錄，頁18312至18313。

危害不可勝言，津浦鐵路是其前鑒，甚至無力償還，釀成重大交涉，於財政前途大有危險」。

⁷¹載灃也認為流弊甚多，「慎勿鹵莽從事以致貽害無窮」，⁷²江蘇巡撫程得全在回應的電文中提到：

凡行一政必有人負其責任，用一款必有人為之監督，尊電所謂鐵路告成即勢如破竹，倘使十年之內政尚不如今日，既無主腦，又無群力，內外紛亂上下蒙飾，則雖鐵路告成而政治之不能推行也如故…是以全所謂入手之先著及入手之後備實為築路之重要問題，而責任內閣及召集國會又關係先著後備之重要問題也。⁷³

程德全認為責任內閣及召開國會為更重要的問題，而並不認為借債造路是所謂入手辦法。兩廣總督袁樹勳至各省督撫電文中也提到李經羲的主腦說，並舉美國為例，「美國維新合眾政體發生操縱自在議院，吾國政體不同，京外尚無發生操縱之樞紐」，⁷⁴意甚明顯，鄭孝胥與袁樹勳私下談論錦瓊鐵路事，袁認為此事的關鍵在無主腦，而主腦即內閣及國會，清廷預備立憲原定九年，先有內閣而後才有國會，袁氏後又續電各督撫，詳細闡述了閣會同時並立的重要：

…東三省則利用美款，各國既因均勢而有所顧忌，我亦得及此間隙以修明內政，如此辦法更需立定主腦，所謂主腦者曰責任內閣曰國會，此一語為現今普通常識上所共有…然使先組織責任內閣，尤慮僅有負責任之形式，與目前樞臣無異，而事機萬變仍責難於一人，此則立憲專制兩無所當。⁷⁵

袁樹勳認為設立內閣及國會為當前清廷籌辦一切內政的基礎，及如預備立憲及各地試辦憲政無一不需要更多人來參與，若先成立內閣則與舊制無異，至於借債造路，袁認為借債為包含在鐵路政策中，另一個應研究的部分，但不必將其推行於全國，程德全與袁樹勳都提到了負責的概念，並且都認為是政令推行的關鍵。10月26日錫良聯合李經羲以及各省督撫電請朝廷「親簡大臣，立即組織內閣，特頒明諭，定以明年開設國會」，11月1日山西巡撫丁寶銓再次請錫良爭取閣會同開，另一方面鄭孝胥也收到外務部右丞施肇基的電文，稱「初三可降

71 「澤尚書對借款之卓論」，1910年9月16日，《盛京時報》，第二版。

72 「監國亦不以借款為然」，1910年9月16日，《盛京時報》，第二版。

73 「借債築路大問題」，《東方雜誌》第九期，記載第三中國時事匯錄，頁18314。

74 1910年9月15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1276。

75 「粵督反對國會及借款」，1910年9月19日，《盛京時報》，第二版。

旨，大約即立內閣，仍以宣統五年召集國會」，⁷⁶鄭氏遂又再次為錫良擬電稿，力請朝廷速開國會：

國會既開，人心擁戴，皇室愈固，一切顛危傾側意外之變，無自而生，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自有上下相維之氣象，若又遲以三年，則三年之內風潮萬狀…朝廷宜防官邪，不宜徒防民氣，此錫良等所謂內閣國會不能不同時並立者也。⁷⁷

與程袁二人稍微不同，二人關注立憲更多是基於制度的優劣，在這篇代奏中鄭孝胥關注立憲的問題，他擔憂國會若無法速開，將導致意外發生，顯見他已經見識到民間對朝廷的改革已生不滿，是故鄭孝胥主張速開國會也是出於對局勢的憂慮。擬完之後又請友人江蘇諮議局議員孟昭常將這封電奏稿投書各報紙，力圖營造輿論，並對孟昭常說「先開內閣緩開國會之事已急，此真最後之十五分鐘矣，我將挾各督撫之力，為國決一死戰」。11月4日上諭宣布縮改於宣統五年開設議院，然而各省之國會請願運動仍不滿足，各省諮議局也都不滿足於宣統五年，要求代表繼續請願速開國會，1910年12月25日再發上諭，開始彈壓請願運動，表示縮改三年為廷臣廷議，不再縮改，鄭氏大感失望，嘆道「國民已怨朝廷之無能，朝廷猶以國民為無知」。⁷⁸

綜觀上述內容，可以知道鄭孝胥在錦瑗鐵路到請速開國會的主張，實為一脈相承，自從鄭孝胥到東北後，面對東三省危及的局勢，鄭氏與總督錫良持同樣的主張，即為開放均勢，吸引美國資本投資東北，達成均勢以制衡日俄，往後雖然錦瑗鐵路最終無果，但是鄭氏延續借債造路之策，主張以鐵路抵押大舉募借外債，作為中國改革的基礎，並更進一步，藉著李經羲發電文的機會，使兩者合併討論。由此觀之，正是由於在東北的經歷，影響了日後鄭孝胥在宣統三年鐵路國有政策中的主張。

另外在請閣會同開的過程中，鄭孝胥也積極推動督撫及輿論爭取速開國會，從此亦可見到清末立憲人士的困境。立憲派與革命派為清末兩種不同方向的勢力，立憲派主張君主立憲，與激進的革命派相對，故對於朝廷的憲政改革仍感到不足，清廷預備立憲，原定九年，因為

76 1910年11月1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1285。

77 1910年11月1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1285。

78 1910年12月25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1296至1297。

迫於輿論，縮短成五年，但是考察朝廷預備立憲的步驟，九年之中每年都有一定之施政進程。按照憲政編查館擬定的計畫，第一年需籌備事項為籌辦諮議局、頒布城鎮地方自治章程、編輯國民必讀課本，第二年諮議局選舉、廳州地方自治、釐訂官制、設置巡警等，⁷⁹以東三省憲政施行為例，第一年由總督徐世昌辦理，東三省之黑龍江吉林等地由於與內地省分不同，作為朝廷龍興之地，長年封禁，地處邊陲，民智未開遑論選舉，故要辦理選舉遠非易事，主要有興辦學堂、選派熟悉憲政人員為選舉顧問、設立高等檢查廳、普查人口等。⁸⁰繼任總督錫良續辦第二、三年，主要憲政政績為設立簡易識字所、籌辦巡警、設立自治研究所、省城及商埠各級審判廳、續辦諮議局選舉等，⁸¹顯見雖然情況艱難但仍然確實按照憲政編查館制定的計畫在辦理，若非革命，則九年之預備立憲即能按照計畫順利進行。

再看革命黨人對於朝廷立憲的看法，以民報為例，自創刊伊始，即持一種民族主義的立場，例如第一號有一篇文章，專門評論立憲一事「中國立憲難，能立憲者惟我漢人，漢人欲立憲則必革命，彼滿洲即欲立憲亦非其所能也」，⁸²可見革命黨人自始即不信任預備立憲，即便朝廷已經為了立憲施行諸多政策，根本上不能見其成功，〈芻言報〉主筆汪康年對於立憲事評論道「…吾思之則朝廷實欲力行憲政，九年預備已極困難，何況又提早至宣統五年，國民而果有實是求事之心，則方宜忱於預備之無實而不應冀其進行之過驟」，⁸³反映了在此種局面下雙方的矛盾，立憲一事極需所有勢力的合作才能完成，而鄭孝胥見到此種情況，考察鄭氏的日記，可以觀察到鄭氏對此常有一種急迫感，故屢次代擬奏摺，聯合各省督撫，希望早立國會平息紛爭，最終在國會請願運動之後，清廷下令彈壓，鄭孝胥大嘆人心已去，「是非曲直，誰能判之」。

79 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6年7月），頁443至445。

80 徐世昌，《東三省政略》（長春：吉林文史工作室，1989），頁1072至1073。

81 錫良，《錫良遺稿》，第二冊（北京市：中華書局，1959年），頁963至966。

82 「論滿政府雖欲立憲而不能」，《民報》，北京市：中華書局，2006.09第一號，第41頁。

83 汪詒年纂，《汪穰卿(康年)先生傳記遺文》（臺北縣永和鎮：文海出版社，1966年），頁213。

第三節 鄭孝胥之鐵路國有政策主張

辛亥革命又稱辛亥國變，事在 1911 年，起因為清廷將川漢、粵漢鐵路收歸國有，引發紳民不滿，最終清廷瓦解。川漢鐵路橫跨四川湖北兩省，粵漢則跨鄂湘粵三省，兩路皆為規模浩大的鐵路工程，1905 年四川總督錫良奏請成立商辦川省川漢鐵路有限公司，粵漢鐵路初時原由美國合興公司承辦，然而合興公司在未知會中國的情況下私下將公司股份三分之二售與比利時公司，後經湖廣總督張之洞訪查得知，幾經交涉，才廢棄與合興公司的合同，並與鄂湘粵三省紳民商議，分期付款贖回粵漢鐵路，後在 1906 年也成立了湖南省商辦粵漢鐵路有限公司，為了確保利權，章程規定只招華股，並且永遠商辦，由於發生了合興公司的事件，兩路公司都規定只招華股，堅持自辦不借外債，惟在籌款的過程甚為艱難，如湖北省及四川省地方，由於紳民財力有限，無法完全商辦，鐵路也遲遲無法動工，「…乃數年以來湖北雖已設立官局招集民股，而應者寥寥，湖南向由紳辦公司經理亦未籌有鉅款，始知兩湖商民財力不厚，如任商民自行籌辦，斷難早日觀成」，⁸⁴如果繼續放任地方紳民自行籌款，則必定曠日廢時，故總督張之洞已無法再信任地方紳民的能力，遂在 1909 年 4 月 19 日向德英法三國銀團借款，⁸⁵因為張之洞在同年病故，川漢粵漢鐵路借款之事也就暫時擱置。

1911 年 5 月 4 日，給事中石長信上奏，有鑑於各省開辦鐵路以來各省士紳「自私鄉土，枝枝節節，未能統籌全局」，「至川漢集款，皆屬取諸田間，其款確有一千餘萬，紳士樹黨，各懷意見…不知何年方能告竣」，請郵傳部「將全國關係重要之區，訂為幹線，悉歸國有」，⁸⁶此奏摺後來交由郵傳部大臣盛宣懷議奏，盛氏覆奏基本持相同意見，並舉了日本鐵路收歸國有之例表示贊同，清廷隨即在 5 月 9 日發布上諭：

…數年以來粵則收股及半，造路無多，川則倒賬甚鉅，參追無著，⁸⁷湘鄂則開局多年，徒資坐耗，竭萬民之膏脂，或以虛糜或以侵蝕，曠時愈久民累愈深，上下交受其害

⁸⁴ 〈湘粵兩省鐵路請永遠官商合辦摺〉，收入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頁 4867 至 4872。

⁸⁵ 張之洞於 1907 年授大學士並調任軍機大臣，1908 年奉旨督辦川漢、粵漢鐵路，1909 年 4 月簽訂三國借款合同，旋即因病出缺，於同年十月病逝，此借款合同隨即擱置。

⁸⁶ 〈給事中石長信奏摺〉宓汝成編，《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頁 1233。

⁸⁷ 指川漢鐵路經理施典章虧空案，施典章私下挪移川漢鐵路股款去買股票，並擅自以公司名義將股款借貸與銀行，適逢國際發生橡膠金融危機，上海錢莊紛紛倒閉，造成川漢鐵路公司虧空兩百八十五餘萬兩，宓汝成編，《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頁 1093 至 1096。

，貽誤何堪設想，用特明白曉諭，幹路均歸國有，定為政策。⁸⁸

4月22日盛宣懷隨即與四國銀行團簽訂借款合同，⁸⁹值得注意的是，此前由於借款事為總督張之洞簽訂，故盛宣懷不過在考量地方紳民無能力籌辦費用，希望能盡早興築鐵路，繼續執行而已。

1911年5月17日盛宣懷拜訪鄭孝胥，兩人互相討論鐵路的問題，鄭孝胥也幫忙盛氏代擬收回商辦鐵路奏稿，6月8日，鄭孝胥收到盛宣懷電報，稱有要事相商，請鄭氏往北京一趟，兩天後又接到盛氏電報，表示「川、粵漢大局粗定，朝廷注重速成，午帥、梓帥會商，非賴公毅力熟手，難赴目的」，⁹⁰14日鄭孝胥與盛宣懷、端方討論鐵路，認為川漢粵漢鐵路應該施行包工之策，「此策既定，則風潮皆息，省費而工速，不可忽也」。⁹¹所謂包工之策，是指將工程外包給外國公司，而包工之策與錦瓊鐵路的辦法也是相同，當時鐵路外包給英國寶齡公司，此次鄭孝胥也將以相同的模式，借外債再外包以速成鐵路。6月20日上諭鄭孝胥補授湖南布政使，隔日攝政王載灃召對，鄭氏藉此機會，向攝政王建議建造恰克圖鐵路，「痛論借債造路為變法之本」，除此之外，鄭孝胥還做了《覘國談》文章向報紙投書，⁹²詳細敘述其借債造路的理由，鄭氏舉東三省以及伊犁等地的例子說明鐵路對國防的重要，「自北京赴伊犁，必四月有餘乃達，今之赴伊犁者假道西伯利亞之鐵路，又陸行月餘日可達，一但有事，中俄爭此伊犁，中國主也，豈能越百餘日之廣漠而為之主」，同時他也批評「守舊者，特欲仍其壓制人民、責收租稅之制度，所患不足以圖存，即趨新者欲襲列國之制度而經費無出，其於下手研究之際毫無研究，又果足以為救亡之政策乎」，則為了救亡圖存，呼籲大眾「姑試取借款造路之說而研究之何如」。⁹³若分析此文中鄭氏的想法，除了一貫的借債造路說之外，可以發現他同時對守舊與西化兩派感到不滿，因為當時中國朝野皆非常注重路權，即保護利權，

88 〈覆陳鐵路明定幹路枝路辦法摺〉，宣統3年4月，收入盛宣懷，《愚齋存稿》，卷17（臺北縣永和鎮：文海出版社，1975），頁441。

89 四國銀行，美國銀行團由摩根公司（JPMorgan Chase & Co.，今稱摩根大通）、昆勒貝公司、第一國立銀行（First National Bank，今稱第一國民銀行）、國立城市銀行（為今之花旗銀行Citi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組成，英國匯豐銀行（HSBC Bank），德國德華銀行（Deutsch-Asiatische Bank，為今之德意志銀行），法國東方匯理銀行（Crédit Agricole·CIB）。

90 1911年6月9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1324。

91 1911年6月14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1325。

92 登載於《憲報》1911年3月。「鄭蘇堪京卿覘國談」，1911年4月1日，《申報》，第四版。

93 〈覘國談〉，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1500至1503。

故在當時雖然盛宣懷、端方、鄭孝胥等人皆認為速成鐵路則必須借債，借債造路說所受到的質疑也甚多，例如當時的諮議局聯合會對於鐵路國有以及借債造路提出質疑：

中國幅員之廣，鐵路何以必須國有，鐵路何以摒赤民款而純借外債以收回之，外債之數能否盡舉國中之幹路…非有成算在胸，安敢毅然取消累年之成案，奪商民已得之權利…以外債造鐵路，終必以鐵路受外債之害。⁹⁴

諮議局議員除了質疑鐵路國有政策中幹線取消商辦之外，主要還是不信任借債的做法，同為立憲公會成員的湯壽潛也提出質疑：

夫募集外債而至於各國爭借，三國協謀，豈惠而好我哉，必有大利在矣，大利何在，非區區息金與材料也，敵所欲者吾土地爾，其樞臣忽贖之忽借之者，為有數百萬元回扣之利也…牟利則不復知有君，媚外則不復知有國。⁹⁵

若說諮議局議員是質疑政策本身的話，則湯壽潛的質疑更為嚴重，總督張之洞之所以之所以向合興公司收回粵漢鐵路後復又借債，前者是為利權，後者由於商辦鐵路延宕時日，湯氏指責其收取回扣，固非事實，然而至少表明湯氏也是極度不認同借債的。梁啟超對於鐵路國有一事也感到極為憤怒，梁氏批評清廷借債是「低心下首以博大國之歡」，並且「多立若干名目，多位置若干私人，大小上下聚而咕囁之」，而川粵漢鐵路國有「以國家而行豪強兼併然且不可，況乎兼併所得又非歸諸國家，而乃歸諸盜國之滑吏」，⁹⁶梁啟超的質疑與湯壽潛類似，皆指責鐵路國有以及借債造路最終流於貪汙，此說實不無道理，官辦鐵路確實流弊叢生，故在當時的社會，成立鐵路公司除了強制的租股之外，一般民間入股甚少，難成鉅款，此亦由於民眾對官辦不信任之故。汪康年對於鐵路國有的看法則較為持平，汪氏認為若為商辦鐵路的情況：「各省籌款難，不能動工時，其總協理以下坐耗薪水如故也，籌款易則爭角劇烈糜費尤甚，於是七八年之久集款一二千萬，僅成路一二百里者有之」，若為官辦，「必款無濫支，工無虛曠，行車收入莫敢侵漁，如是則可以每年溢利歸還借款，雖然，此可得之

94 〈諮議局聯合會請飭閣臣宣布借債政策呈督察院代奏稿〉，1911年6月，收入張謇，《張謇全集》，第一卷（江蘇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頁165至168。

95 〈擬上攝政王書〉，宣統元年，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浙江省蕭山市委員會編，《湯壽潛史料專輯》，第三卷（杭州市：政協浙江省蕭山市委員會文史工作委員會，1993年3月），頁535至537。

96 轉引自王傑、李振武〈論梁啟超對清末時局的審視——以國風報支時論為中心〉，李喜所編《梁啟超與近代中國社會文化》（天津市：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頁28。

吾國官場乎」。⁹⁷

綜觀晚清其他鐵路的借債與鄭孝胥所主張的借債模式，可以發現雖然同為借洋債，但兩者之間仍然有些微的不同，在此之前朝廷對於借洋債的態度較謹慎，1880年劉銘傳奏請修建鐵路，當時李鴻章在奏摺中表明了對於借洋債的態度：

惟是借債之法，有不可不慎者三端，恐洋人之把持而鐵路不能自主，宜與明立禁約，不得干預吾事，但使息銀有著，期限無誤，一切招工購料，與經理鐵路事宜，借債之人毋得過問，不如是則勿借也。⁹⁸

鐵路借債如津沽鐵路、津盧鐵路、津榆鐵路等，款項都以招集民間商股以及由朝廷各部撥款為主，只有在商股招集不足，款項不夠時才借洋債，類似資金周轉，對於抵押以及用人等有關路權方面的問題較無影響，此三路的債款也都如期清償。1896年張之洞籌辦盧漢鐵路時，因盧漢鐵路規模較大，認為難以憑商股造路，並將洋股與洋債分開，禁止洋人附股，而與比利時鐵路公司借款，此皆是基於路權的考慮，惟盧漢鐵路借款合同在各方面不甚理想，例如擔保品一項，盧漢鐵路及其附屬產業以及其他所有屬於鐵路的物品，皆在擔保範圍之內，其餘如用人、購料等權利也由比利時掌握，且比利時在正合同簽訂後又提出增加利息及銀行用費等要求，負責交涉的李鴻章、盛宣懷因為法俄兩國施加壓力，最終不得不與比簽約，1898年以後修築的鐵路主要以訂借外債的形式完成。⁹⁹

再看鄭孝胥的借債主張，例如將正在興築的鐵路作為抵押以訂借外債，建議盛宣懷將鐵路收歸國有以及包工之策等，皆表現了鄭孝胥借債主張的特別之處。以包工之策言之，此前的鐵路借債頗為注意維護路權，成立公司招集商股也有維護路權的用意，鄭孝胥在其《四大幹路說帖》中則主張「借債以十萬萬為度，包工限年以成之」，認為中國應大舉借債，如此一來則各國競相投資，暗中牽制列強的侵略滲透。除此之外更主張「包工與借債並議，而所借之債悉入包工之手，而無挪移吞蝕之患」，¹⁰⁰鄭孝胥認為包工公司為了營業與利益，在用人購料方面必會就近取資於中國，而並不認為包工會有害路權，反而對中國有利，考察鄭孝

97 汪詒年纂，《汪穰卿(康年)先生傳記遺文》(臺北縣永和鎮:文海出版社，1966年)，頁219。

98 宓汝成編，《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第一冊，頁92。

99 馬陵合，〈晚清鐵路外債觀初探—以盧漢鐵路為中心〉，《史學月刊》，第6期(2001年)，頁二。

100 宓汝成編，《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第三冊，頁1165。

胥關於鐵路的議論，可以發現他對於鐵路權利以及其營收等有關路權的問題並無詳細的考量，而側重強調借債包工，速造鐵路。從當時輿論來看，鄭孝胥的包工策略頗受攻擊，例如《申報》紀載鄭孝胥主張川漢粵漢應包工造路，但他主張包工價格每里合銀二萬兩，¹⁰¹而當時中國其他鐵路造價多在四萬至六萬兩不等，批評鄭孝胥「便宜豈中國人占者」，並且刊登了端方的評論「鄭蘇戡闢包工好是好的，只怕做不到說說罷了」，¹⁰²可見端方雖然認同包工策略，但認為其無法實行，另外由於鄭孝胥主張包工用洋人工匠，輿論認為此舉將導致許多原本以川漢粵漢鐵路維生的工人失業，也是鄭孝胥在當時受到輿論攻擊的原因。¹⁰³

1903年商部奏定頒部《鐵路簡明章程》，允許民間組成公司修築鐵路，亦不用官督商辦形制，一時之間各省紳商紛紛成立鐵路公司，設立此章程的用意在於獎勵民營公司，並藉由獎勵商辦而杜絕列強資本的滲透，此種風氣持續至1912年盛宣懷奏請將全國幹路收歸國有，鐵路收歸國有政策引發民間大量質疑，是故鄭孝胥的借債造路主張，雖然大多是從國防以及救亡來考慮，在當時亦難以實現。鄭氏曾在某次與湖南京官談話中提到「然則做事宜求諒於少數之明白人，抑將求諒於不明白之多數乎」，¹⁰⁴可以看出其贊同鐵路國有以及其心境。¹⁰⁵

鄭孝胥補授湖南布政使，在日記中可以見到鄭氏展現出躊躇滿志充滿報復之狀，例如他曾說「吾今挺身以入政界，殆如生番手攜炸彈而來，必先掃除不正當之官場妖魔，次乃掃除不正當之輿論烟障，必衝過多數黑暗之反對，乃坐收萬世文明之崇拜」，¹⁰⁶並在1911年8月2日入署接印，端方甚至奏請以鄭孝胥為川漢粵漢鐵路總參贊，但是自國有政策宣布以後三省民人抗議不止，如川漢公司董事、董事局、四川諮議局紛紛表達抗議。1911年6月24日四川省保路同志會成立，保路運動之初起，尚未有太激烈的抗爭，由蒲殿俊、鄧孝可等發起，¹⁰⁷

101 申報評論認為鄭孝胥包工價二萬兩是因為鄭在簽訂錦瓊鐵路包工合同時的價格為每里合銀一萬九千餘兩，原合同第三十七款規定價格為每英里7815英鎊，交通鐵道部交通史編纂委員會編，《交通史路政編》第十五冊（南京：交通鐵道部交通史編纂委員會，1931年），頁791。

102 「鄭蘇戡之闢包工恐怕不成」，1911年7月3日，《申報》，第一章第四版。

103 「明清末造之比較」有評論曰「清末鄭孝胥首倡鐵路借款之說，以失民心」，1911年7月2日，《申報》，第一章第五版。又見〈鄭蘇戡主張包工之受敵〉，1911年12月30日，《申報》，第三章第二版。

104 1911年7月7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1330。

105 日後溥儀曾與鄭孝胥談論辛亥革命前的四川保路風潮，鄭孝胥回答道「臣的方策中有官辦有商辦，不過中國人窮，錢少少辦，外國人富，投資多多辦」。愛新覺羅溥儀著，高陽序，《末代皇帝自傳》上冊新修版，（台北市：風雲時代出版，2014年6月初版），頁283。

106 1911年7月19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1333。

107 蒲殿俊字伯英，鄧孝可字慕魯，兩人皆為四川省立憲人士，蒲殿俊為四川諮議局議長，鄧孝可為諮議員，兩人合辦《蜀報》，亦為川省保路同志會之發起人，中央研究院近現代人物資訊整合系統。

其宗旨在「破約保路」，並不涉及其他宗旨，並未直接反抗朝廷，並且約定不罷市罷課，和平抗議，並指責主持簽訂四國銀行團借款的盛宣懷賣國，罵其為「盛賊」，但其後事態逐漸失控。

8月24日已經有部分州縣停課罷市，繼而9月1日川漢鐵路公司股東會議決定不納糧稅，9月3日，朝廷令端方入川調查抗議事件，5日端方致電盛宣懷，邀請鄭孝胥一同前行，「緩急扶持，交情乃見，蘇勘健者，必不吝此一行」，端方希望鄭氏幫忙的心情躍然紙上，但鄭氏婉拒，回信稱「午帥既行，風潮自息，必無險阻，何用扶持，孝胥本不樂湘藩，若復遠調入署，亦非所勘，且外官制關係全局，竊願竭其所見，終始其事，求我公婉解於午帥」，¹⁰⁸顯然鄭氏不願在此時隨同前行，並以參加外官制會議為由婉拒。事實上端方由於四川抗議日益激烈，已在9月4日上奏朝廷懇請另簡重臣赴川，但朝廷並未准端方的請求，川督趙爾豐，在接任總督時，也屢次上奏朝廷請准商辦鐵路，以穩定局勢，而8日上諭令趙爾豐「即將首要人犯先行正法，並妥速解散脅從，毋任蔓延為要」，¹⁰⁹9月14日端方再次請求鄭孝胥赴川相助，「如公不允來助，惟有奏陳真確為難情形，請責李帥一手辦理，或令簡與路事無關之重臣，雖得嚴譴，亦所不避」，端方已在十日前上奏朝廷請另簡大員，此次再託鄭孝胥，顯然極欲脫身，觀察當時輿論，端方與盛宣懷同樣支持鐵路國有，亦不可免的被罵成賣國賊，鄭孝胥則認為端方「方寸亂矣」，然而終於沒有赴川，遂託盛宣懷建議朝廷，以為端「智勇並竭，如強遣之，必至誤事，請公言於中樞，日內須速另籌辦法，亂本易了，措置失宜，或釀巨禍」，此時四川保路運動已經成為暴動，省城遭四面圍攻。

10月10日武昌起事之後，各省黨人以及新軍紛紛獨立，¹¹⁰10月26日盛宣懷奉旨革職，11月1日慶親王內閣總辭，11月18日袁世凱內閣成立，亦因情勢危急，清廷在數日之內所安排之舉措，惟並未能緩解各省獨立之勢，¹¹¹鄭氏對於革命感到氣憤，認為「今日尤是行政改革之時代，未遽為宗祀覆亡之時代…使革黨得志，推倒滿洲，亦未必能強中國，擾亂易而整理難，且政黨未成，民心無主故也」，¹¹²鄭氏只得將希望寄託於袁世凱，冀其「開國會，

108 1911年9月5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1341。

109 宓汝成編，《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第三冊，頁1293。

110 高勞，《辛亥革命史》（臺北縣永和鎮：文海出版社，1971年），頁7至16頁。原書出版資訊：高勞編；東方雜誌社編纂《辛亥革命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25年）。

111 高勞，《辛亥革命史》，頁22。

112 1911年10月27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1352至1353。

定皇室」以其權勢成立君主立憲，鄭氏所在的湖南省在 10 月 22 日由諮議局宣布獨立，最終黯然回到上海，鄭孝胥在朝廷發布退位詔書後，又作〈十二月二十五日鑒泉示生日詩〉，其詩曰：

避兵真偷生，亡國方忍死。非徒無死所，留眼將有視。君王何所慕，棄國如敝屣。
天傾地維絕，舉世悖人理。老夫今焉歸，投彼虎與兕。磨牙復吮血，大亂從此始。
嗟君抱忠義，阿世深所恥。傷心生日詩，不啻以自誅。歌哭老更哀，意氣付逝水。
惟應奮史筆，文獻徵宋杞。惡名彼何成，千秋誅豎子。¹¹³

此詩自避兵至有視四句，似在表示自己之所以偷生忍死，是為了見證歷史發展，天傾至此始六句，則指革命是有悖人理，虎兕出典於論語季氏，此處則仍指革命黨，自己有不知將來何以自處之意，歌哭一句以下則表明亡國的哀痛，並要發奮著述，紀錄歷史之意。



113 鄭孝胥著，黃坤、楊曉波校點《海藏樓詩集》（增訂本），頁 223。

第三章民國時期的社交及籌畫復辟

第一節 鄭孝胥之社交

(一) 讀經會及一元會

自辛亥革命之後，鄭孝胥回到上海，雖然仍時常留心時事，但直到丁巳復辟以前，並無明顯參與政治或復辟的舉措。在此一段時間，其日常生活中最常見即是為人題字、寫書法、作詩等，其社交生活以鄭孝胥親自參與的「讀經會」、「一元會」為其中的重要部分。讀經會的創立時間在1912年7月15日，終於1913年7月13日，約一年，共計開會49次，由沈瑜慶創辦，第一日即加入的有沈瑜慶、王仁東、林開謩、劉宣甫，其後日記中紀錄有陸續加入的成員有，吳學廉、吳學莊、楊小宋、陳樹屏、壽蔭、金邦平、陳立村、劉樹屏，其開會時常有攜帶子侄孫等親族一起參加的情況，例如高而謙之女高君珈、陳樹屏兒子、沈瑜慶姪子沈蟾南、劉宣甫兒子劉天民、王仁東兒子王孝紓、孫子王世富、劉樹屏兒子。其中有關係可考的，吳學廉、吳學莊為鄭孝胥的妻舅，林開謩、楊小宋為鄭孝胥的表親，¹¹⁴金邦平為鄭孝胥的女婿，劉宣甫為鄭孝胥在壬午年（1882）鄉試同年，可見讀經會成員大多和鄭孝胥有親屬或同窗朋友的關係。讀經會大約一週一次，每次出席成員不定，其活動內容並無詳細的紀錄，從日記中頭兩次的紀錄來看，應以研讀《禮記》、《大學》、《孟子》為主，每次閱讀若干章節，有時也會作詩，或看書法作品，開會期間也偶爾有人來旁聽，例如1912年8月4日高而謙與其女高君珈來旁聽，高而謙為鄭在商務印書館同事高鳳謙的次兄，1912年10月20日有日僧水野梅曉來拜訪鄭，「聞讀經會，肅然起敬」，¹¹⁵1913年2月16日有南洋公學漢文教習李仲韓來旁聽。

一元會創立於1915年1月31日，2月2日鄭孝胥與壬午鄉試同年一起飲酒，「壬午同年釀飲，各出公分一元」，¹¹⁶出席的有馮煦、朱祖謀、王乃徵、陳三立、楊鍾羲、李鞠農，後續加入章梈、唐宴、鄭績臣、鄭堯臣，一元會開始時以鄭孝胥的壬午同年為多，期後逐漸加

114 李君，《1931年前鄭孝胥》，頁209。

115 1912年10月20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1429。

116 1915年2月2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1549。

入其他成員，有學者統計自 1915 年 2 月 2 日至 1931 年 4 月 13 日為止共有聚會 105 次，¹¹⁷再加上成立首日的 1 月 31 日，合而為 106 次。一元會聚會的頻率不像讀經會一樣固定，每次出席成員亦不固定，其聚會的活動，從會名看，當為每人交一元，共同宴飲，¹¹⁸一元會既與宴飲有關，則每次聚會的菜館也值得一提，¹¹⁹在《鄭孝胥日記》中一元會聚會常去的上海菜館約有幾處：式式軒、古淪軒、都益處、別有天、小有天、廣福樓、雅敘園，若按菜系來分，可以分為閩菜、川菜、京菜，式式軒、古淪軒、都益處為川菜館，別有天、小有天、廣福樓為閩菜館，¹²⁰雅敘園為京菜館，按上海地方菜館發展來看，在辛亥革命之前，在上海盛行的菜系約有蘇菜、粵菜、京菜，川閩二系為辛亥之後才漸漸進入上海，¹²¹鄭孝胥祖籍福建，故閩菜對他而言可謂家鄉菜，或許能解釋鄭孝胥聚會宴飲時常選在閩菜館的原因，觀察日記也能發現鄭孝胥在不同時間對不同菜系的偏好，日記記載例如「馮孟華、唐元素、楊子勤來，同至別有天作一元會」，¹²²「唐元素約作一元會於雅敘園」。¹²³

(二)宗方小太郎、西本省三、波多博

辛亥革命之後鄭孝胥與日本人的往來為其社交生活的重要部分，日記中以宗方小太郎、西本省三、波多博為多，其中宗方小太郎更是在日後鄭孝胥從事復辟時提供協助。宗方小太郎在 1864 年生於肥後國宇土，¹²⁴早年進入熊本縣濟濟黌就讀，¹²⁵師從佐佐友房，1884 年跟隨佐佐友房前往上海，並加入了日人荒尾精創辦的「漢口樂善堂」，1889 年被派往北京設立支部「積善堂」，從事販賣藥品、書本，並一面蒐集北京各地的情報，1890 年由於荒尾精改變

117 張笑川，〈鄭孝胥在上海的遺老生活(1911—1931)——以《鄭孝胥日記》為中心〉，《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 0 期(2012 年)，頁 10 至 12。

118 陳衍曾經作詩描述一元會聚會的情況，其詩曰「道道非常道，天天小有天」，「記蘇堪老人之一元會」，1931 年，《上海畫報》，第 694 期第 1 頁。

119 周松芳，〈老上海的川菜館：最豪奢的開場，最經濟的殿後〉，收錄於「澎湃新聞」：
https://m.thepaper.cn/kuaibao_detail.jsp?contid=16168225&from=kuaibao (2024/1/7 點閱)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168226 (2024/1/7 點閱)。

120 「滬上酒食肆之比較」，1923 年，《紅雜誌》，34 期，頁 46 至 47。

121 「菜館之新陳代謝」，1915 年，《小說新報》，第一期，花史，頁 6。

122 1915 年 10 月 31 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 1583。

123 1915 年 12 月 17 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 1589。

124 為今之熊本縣。

125 今稱熊本県立済々黌高等学校。

經營方針，原本目標為蒐集情報，轉變為培養日清貿易方面的人才，宗方也在此時協助荒尾招收學生，前往上海創辦「日清貿易研究所」，並擔任學生監督，1893年經過其師佐佐友房的介紹，與日本海軍大佐島崎好忠接觸，隨後宗方長期受雇於日本海軍，定期將中國各地的情報撰寫成報告傳給海軍，1896年收購報紙「漢報」，擔任館主，¹²⁶漢報主筆姚文藻也經常與鄭孝胥往來。而鄭孝胥與宗方小太郎的第一次見面在1899年11月24日，此時鄭孝胥在漢口鐵路公司擔任盧漢鐵路總辦，1900年8月8日，時值拳亂，宗方拜訪鄭孝胥，並詢問鄭有關當時局勢以及京中情況，宗方再次見到鄭孝胥時已是1912年4月，宗方小太郎早期對中國的政治傾向可以從其參與「東亞同文會」得知。該會在1898年由「東亞會」、「同文會」合併而成，東亞同文會的宗旨即為「保全支那」，其認為欲振興亞洲則必先振興中國，故宗方小太郎積極聯絡中國各界人士，¹²⁷包括梁啟超、文廷式、汪康年、孫中山、陳其美、蔣介石等人，宗方接觸了包括維新派、革命派在內各界人士，了解他們的思想，1889年宗方在北京即曾與哥老會聯絡，密謀推翻清朝。惟在清室退位之後，宗方除了與革命黨人士往來之外，也開始與鄭孝胥、沈曾植等遺老往來，1907年晤見時報報館主狄葆賢，決定以宗方的名義發行時報，1913年宗方小太郎與鄭孝胥、西本省三、波多博共同創立「春申社」，創辦《上海》雜誌。¹²⁸

波多博為東亞同文書院第六期生，師從宗方小太郎，1914年協助宗方創辦「東方通信社」，宗方任社主，波多任主筆，該社以擁護日本的政策以及介紹日本、中國的各種事件為主。西本省三在1878年生於熊本，為1900年南京同文書院的畢業生，1901年往東亞同文書院擔任教師，西本省三在擔任教師期間與宗方小太郎熟識，1913年與宗方、鄭孝胥、波多博等人創辦《上海》雜誌，後《上海》雜誌改為週報《上海》，¹²⁹由西本省三接辦。西本與鄭

126 1900年8月8日日記，收入宗方小太郎著，大里浩秋整理，《宗方小太郎日記，明治32~33年》，《神奈川大學人文學研究所報》，NO.46(2011年10月)，頁176。

127 戴海斌，〈宗方小太郎與近代中國——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所藏宗方文書閱讀札記〉，《中山大學學報》，第53卷第四期(2013年)，頁69。

128 《上海》雜誌為日文雜誌，立場同情復辟，例如《上海》雜誌第70號第二版至第三版，有刊登討論袁世凱與清朝復辟的社論，雜誌的文苑欄目有時會刊登鄭孝胥的詩作，見《上海》雜誌第三號第五版，第六號第五版，神戶大學附屬圖書館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

129 藤谷浩悅，〈芥川龍之介の長沙遊歴—1921年の排日運動を中心に〉，《中國研究月報》，Vol.74 No.5 (2020年5月)，頁29。

孝胥在日記中第一次見面為 1912 年 10 月 22 日，此後西本不定期往海藏樓拜訪鄭孝胥，有時會傳遞有關復辟的消息，有時則會求鄭孝胥的書法，西本同情復辟，在《鄭孝胥日記》中也能看到西本與鄭討論復辟的情況，¹³⁰有著作《大儒沈子培》、《康熙大帝》。

在《鄭孝胥日記》中辛亥革命之後的紀錄中能頻繁的找到宗方小太郎、波多博與鄭孝胥的會面紀錄，例如到宗方與鄭孝胥互相邀請宴飲，有時為春申社的集會，在宴飲的過程中經常能見到日本軍政界人物的參與，例如 1916 年 2 月 17 日，宗方小太郎、姚文藻與日本海軍大佐八角三郎拜訪鄭孝胥，7 月 26 日，宗方與鄭孝胥、鄭垂、姚文藻共約在日本俱樂部，座中有中島晉、八角三郎、增田高賴三人，中島、八角、增田三人皆為海軍大佐，1917 年 9 月 10 日鄭孝胥與李經邁、姚文藻邀請宗方來鄭孝胥的海藏樓家中宴飲，¹³¹一併邀請列席的有津田靜枝、佐原篤介、林出賢次郎三人，津田為海軍少佐，佐原為大阪每日新聞特派記者，¹³²林出為東亞同文書院畢業生，1917 年在上海日本總領事館任書記，其中佐原篤介除了與宗方熟悉之外，也是「春申社」成員，在辛亥革命之後，鄭孝胥與宗方小太郎、西本省三、波多博等人的往來、宴飲、詩文、言談等成為鄭孝胥日常生活的一大活動，透過他們的集會宴飲也使鄭孝胥結識了許多日本軍政學界人士，也擴大了鄭的社交圈。

(三) 家族及妾室

出現在鄭孝胥日記的家族成員，有妻吳中照、弟鄭孝樾，以及五子四女，除卻早殤的三子、次女、早夭的三女，長大成人的有長子鄭垂、次子鄭禹、四子鄭勝、五子鄭何，長女鄭景、三女鄭惠、四女鄭文淵，在日記中皆以小名稱之，鄭垂稱大七，鄭禹稱小七，鄭勝稱小乙，鄭何稱五丁，鄭景稱女景或德徽，鄭惠稱女惠或彌明，鄭文淵稱小虎，除此之外鄭孝胥先後納兩任妾室，第一任金月梅，第二任劉婉秋。夫人吳中照為淮軍將領吳贊誠次女，1879 年鄭孝胥和吳中照結婚，鄭孝胥和吳家關係親密，除了夫人之外，吳贊誠之子吳學廉、吳學莊、

130 林志宏，〈危機中的烏托邦：西本省三對民國的觀察和議論，1912- 1928〉，《思想史》，第 8 期(2018 年 12 月)，頁 116。

131 1916 年 2 月 17 日、7 月 26 日，1917 年 9 月 10 日日記，收入大里浩秋整理，《宗方小太郎日記，大正 5~6 年》，《神奈川大學人文學研究所報》，NO. 56(2016 年 9 月)，頁 58、69、97。1916 年 2 月 17 日、7 月 26 日，1917 年 9 月 10 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 1598、1620、1683。

132 中村謙三編，《三十七・八年役大阪每日新聞戰時事業誌》，大阪每日新聞社，明治 41 年 7 月，頁 75。

吳學恂也與鄭往來密切，1884年吳贊誠逝世，吳學廉聘鄭孝胥為其二子教書，以後吳家兄弟仍時常與鄭孝胥夫婦往來。鄭孝胥的六名子女中，鄭勝於1918年因罹患腦膜炎逝世，鄭惠於1908年病逝。鄭孝胥對於子女是非常關心的，子女的學校都是經他親自挑選，例如1898年為長子鄭垂報名上海中西書院，並附讀英文班，1902年就讀上海聖芳濟書院第三班，學習英文，可見鄭孝胥加意培養鄭垂英文能力之情況，日後鄭孝胥也會將上海的外國報紙交由鄭垂翻譯轉述來閱讀，鄭垂也會幫助鄭孝胥向外國人探聽消息。¹³³另外為四子鄭勝報名青島特別高等學堂，鄭勝也因為在青島讀書之故，與張謇之子來往親善，在日記中也可以找到鄭孝胥與夫人一同參加女兒鄭文淵的學校運動會的事。除此了學校之外，由於鄭孝胥的家學淵源，他也經常會親自給子女出日課，諸如讓子女寫詩再由他批改，練習古文，研讀儒家經史典籍，足見鄭孝胥對於子女的教育融合中西，不僅非常重視並且皆親自參與。

鄭孝胥的長女鄭景多次出現在日記中，鄭對於長女的關心可以從一些小事中得知。1904年4月金邦平曾寫信並與自己的照片寄給鄭景，應與婚事有關，鄭孝胥見金的措辭文雅，乃對其有良好映像，原本打算取鄭景的照片作為回信寄出，不料鄭景得知之後憤而離家，使鄭孝胥甚為沮喪，1914年鄭景與金邦平已經成婚，在三月時金邦平欲受洗入基督教，金的家族無不勸阻，鄭景頗為煩惱，甚至回家與父親鄭孝胥「談久之」，惟到四月時金仍然決定入教，並將決定寫信給鄭家，大概出於觀念的原因，鄭景難以接受，「哭泣擲書」，¹³⁴鄭孝胥夫妻則好言安慰，勸其接受。日後鄭景與金邦平時常回家與看望父母，鄭孝胥也時常前往探視女兒，兩家也時常一起出遊、聽戲。

鄭孝胥的家庭活動非常豐富，例如聽戲即是鄭家一大家庭活動，有時是夫人吳中照帶子女聽戲，有時是全家一起聽戲，其在日記中常常進出的戲園也多在上海，例如群仙茶園、丹桂第一台等。¹³⁵聽戲之外，上海樓外樓以及大世界等也是鄭家常常去的地方，樓外樓號稱「陳

133 鄭孝胥曾與鄭垂共同翻譯《大陸報》中關於一戰的報導，1914年8月27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1528；在丁巳復辟前約一個月，鄭垂曾與升允一同拜訪德國公使顧錫恩，探聽德國對於復辟的意象，1917年5月26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1664。

134 1914年4月4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1511。

135 丹桂第一台在當時的地址在上海四馬路，聘請全國各地有名戲班，並定期在報紙刊登廣告，見《申報》，1911年1月14日，上海版第七版。

列奇花異草，為中西遊人憩息之所」，¹³⁶鄭孝胥與夫人曾經在樓外樓賞月，大世界遊戲場建於1917年，其創辦之初號稱蒐羅「目所未覩，耳所罕聞之事物物」，¹³⁷從廣告來看應是類似遊樂園的地方，鄭孝胥有時帶兒孫一起逛大世界，有時是自己去買東西，也會和朋友約在大世界。在鄭孝胥任督辦廣西邊防以及在東北協助錫良辦理錦瑗鐵路時，其家人也會隨之在當地租賃房屋短期滯留，順便帶子女遊逛當地景點，例如鄭孝胥在廣西時，夫人曾帶兒女遊廣西小蓮城，1911年鄭孝胥上京期間也與家人遊逛北京陶然亭，此外上海的愚園、¹³⁸張園也是平時鄭家遊憩的場所。

鄭孝胥的兩任妾室中以金月梅的記述最多，金月梅(1878-1924)為滬上名伶，為當時著名京劇坤角，其父官至淮軍將領，駐防在旅順，會甲午戰爭爆發，軍事失利，其父遂帶金月梅母女逃到上海，因家計貧困，金月梅又頗有天分，後遂以唱戲維生。兩人初次見面在1901年3月14日，鄭孝胥聽戲時注意到金，四天之後鄭孝胥原欲請金月梅唱戲，但是金沒來，兩人再次見面已是一年之後，即1902年4月，當時鄭孝胥在上海與盛宣懷議定《商約》，鄭在上海群仙茶園聽戲，再次遇見金月梅，鄭對於金月梅的映像不錯，評價她「敏銳非常，巧於言笑」。在四月底至五月鄭孝胥多次往群仙茶園聽金月梅唱戲，以後兩人逐漸往來密切，¹³⁹鄭孝胥送摺扇給金，並為其取「雙清館主」雅號、¹⁴⁰寫詩及對聯，¹⁴¹金月梅也因為傾慕鄭孝胥的名聲，甚為中意鄭，1902年5月21日鄭孝胥往金月梅家，適巧金不在，金母遂留鄭孝胥坐談，據日記備註當日日記被剪去五行，故已不清楚具體坐談內容，從時間上來看，應是與納妾有關，此後鄭孝胥與金月梅的感情穩定，兩人書信往還，鄭也常常寫詩郵寄給金，有時候鄭孝胥也會在金月梅家過夜。

136 此段文字為鳴盛公司刊登之樓外樓廣告文案，見《申報》，1911年6月12日，上海版第七版。

137 此為大發公司徵求大世界遊戲場發明或美術的廣告，《申報》，1917年3月1日，上海版第一版。

138 據申報廣告描述愚園有亭台樓閣、假山水池，是當時上海一大名勝，原址在上海靜安寺之東，如今靜安寺尚在，而愚園已不存，有路名為愚園路，《申報》，1890年7月19日，上海版第二版。

139 《漢口中西報》載鄭孝胥與金月梅因互相欣賞而結識的過程「蘇堪即心賞其女流而有丈夫氣，月梅亦震於鄭氏才氣縱橫，他日必能騰達，以名伶而嫁名士，亦稱得所，故於朋輩，必盛稱鄭老爺如何如何才冠群倫，因是蘇堪之友，感慙惠蘇堪藏諸金屋，月梅於是遂歸鄭氏」。「近代名人軼事」，1935年4月25日，《漢口中西報》，第三張第十版。

140 1903年4月26日鄭孝胥送給金月梅「鳳雛」小印，故日記中常以「雙清」、「鳳雛」來稱金月梅。

141 《大中華》雜誌曾刊載鄭孝胥贈給金月梅的九首七言律詩，「鄭太夷贈金月梅詩」，1915年，《大中華》，第二卷第二期，食字居談錄，頁2。

1903年岑春煊奏調鄭孝胥同赴川省辦理商礦事務，鄭非常希望金月梅能隨他一起前往，余語雙清：「能同入川乎？」，(金)對曰：「恐未能耳」，(鄭)「然則若之何？」，(金)曰：「吾將奉二老往奉天依吾舅以居，吾亦埋頭年余，以待君之逐我」，余曰「子北行，不亦瘁乎？」，(金)「吾棄所業，則滬上居不易，且不能絕往來者，故寧出此也，我不更適，君勿疑矣」，余曰「子非戲言耶？」，曰「戲君何為？」，余悵然良久，言曰「子乃如是，吾不負汝」，遂太息而起。¹⁴²

1903年4月19日岑春煊調補兩廣，鄭在六月前往龍州，鄭督辦廣西邊防一直到1905年，金月梅母女住在山東煙台。這段時間兩人仍然有持續書信往來，但由於煙台與龍州距離遙遠，兩人的書信通常要一個月才能送達對方手上，並且鄭在廣西平亂之後，特意在龍州築屋，以迎金氏母女來廣西與他同居，「及廣西亂平，蘇戡於龍州築屋，將為藏嬌之所，四圍遍種梅花，命之曰梅亭，大有唐明皇寵梅妃之意」，¹⁴³金月梅則回信「曰身在芝罘，心在桂嶺，雖欲赴龍，事多梗阻」，總之鄭孝胥在龍州三年，持續與金月梅保持聯絡，也希望金氏母女能搬來龍州，惟未能如願，兩人的感情也發生一些波折。¹⁴⁴ 1906年鄭孝胥往煙台接金月梅，將金氏母女接到上海春暉里，租賃房屋給母女倆居住，兩人的感情復趨穩定，鄭孝胥常常在金月梅處吃午飯和晚飯，有時會在金家過夜，並且與金月梅談論詩文，寫詩給金等。

金氏母女搬到上海之後約一年的1907年4月20日，金月梅忽然寫信給鄭孝胥提分手，「依君一年，自殘無功坐食，而婢母猶嘖有煩言，婢自無顏立於君家，高情厚愛，終身不忘，今願自苦，請勿相迎，婢不來矣，寄去繭綢二端，乞存之以表微意」，鄭孝胥收到信之後「肌跳頭眩，幾不能坐」，¹⁴⁵隔日隨即去信質問金「汝病瘋耶？乃為此語，我誠有負情意，使汝有去志耶」，¹⁴⁶在日記中鄭孝胥寫信很少使用激烈的語義，從其反應來看，鄭孝胥對金月梅的確用情甚深，也屢次寫信極力挽回，4月24日鄭再寫信「二月十二日春暉樓中敘別之情，

142 1903年3月15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二冊，頁868。

143 斗山山人〈記女伶金月梅母女事〉，收入莊建平主編《近代史資料文庫》第九卷(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1月)，頁328。

144 鄭孝胥在1903年8月就寄詞給金月梅，試圖勸金來廣西，金回信稱家務難離，鄭孝胥遂懷疑是金月梅母親從中作梗，另外也因為兩人久未見面，使鄭孝胥開始產生煩惱，1906年鄭孝胥聽說了金月梅與人有染的傳聞，經金月梅極力否認，遂重歸舊好。

145 1907年4月20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二冊，頁1086。

146 1907年4月21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二冊，頁1086。

今為三月十二日，宿熱猶在肌耳，豈可視我如路人哉？必踐前約，或母子偕來，或汝身獨來，商量日後之計，決無難也」，¹⁴⁷其痛苦萬端之情狀溢於言表，惟金去意以決最終無果，1907年5月14日金月梅重新在天津天仙戲園演戲，鄭孝胥與金月梅的關係乃告結束。

關於鄭金二人分手的原因，最常見的一種說法是金月梅不見容於鄭孝胥的夫人吳中照，斗山山人在〈記女伶金月梅母女事〉中提及由於鄭孝胥時常在金月梅家過夜，吳夫人幾次率領僕婢來金家找人，及找不到鄭，復又向金月梅罵道：「如明日不得老爺，當要你小命」，¹⁴⁸金母憤而命金月梅分手，早年與鄭孝胥熟悉的陳衍在《石語》提到此事：

蘇戡堂堂一表，而其妻乃淮軍將領之女，禿髮跛足，侏身麻面，性又悍妒無匹，蘇戡納妾，余求一見，其妻自屏風後大吼曰『我家無此混帳東西』，蘇戡亦殊有杖落地而心茫然之意。

陳衍又指鄭孝胥「夜起」，是藉口鍛鍊身體，「實就其妾宿也，為妻所破，詬誶之聲聞於戶外，蘇戡大言欺世，家之不齊，安能救國乎？」，¹⁴⁹陳衍的評語表現出其對於鄭孝胥的譏諷與不信任，《石語》一書寫於1932年，晚年的陳衍因為鄭孝胥參與復辟及籌建滿洲國而對其非常厭惡，故不能排除《石語》的說法真實性有受情緒與立場影響之可能。劉衍文先生在《寄廬茶座》中考證陳鄭兩人絕交已久，¹⁵⁰不免口出惡言，認為陳衍的說法是妄測臆猜「即使石遺所述出之目擊，恐亦亡斧疑鄰，妄測而已」。¹⁵¹實際上鄭孝胥夜起早在認識金月梅之前就已成為習慣，¹⁵²日記中常常能見到鄭「昧爽即起」的話，¹⁵³鄭孝胥在日記1933年6月26日有作一篇「練魄制魂說」，略述夜起實為一種修心練性的方法「學道之士必先練魄，次以制魂，吾自辛亥至今二十二年，半夜即起，坐以待旦，乃得練魄制魂之說，孟子所謂養心寡

147 1907年4月24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二冊，頁1087。

148 斗山山人，〈記女伶金月梅母女事〉，莊建平主編《近代史資料文庫》第九卷，頁329。

149 陳衍口述，錢鍾書《錢鍾書集：寫在人生邊上、人生邊上的邊上、石語》（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頁483。

150 劉衍文，《寄廬茶座》（上海：漢語大辭典出版社，2004年11月），頁82。

151 劉衍文，《寄廬茶座》，頁90。

152 鄭孝胥詩作中常有以夜起為題的，例如1900年的〈夜起江樓口占〉，1901年的〈四月二十日夜起〉，《海藏樓詩集》卷四，頁110、116。

153 曾有人向鄭孝胥請教養生之術，鄭提到他每天「（晚）九時安寢，三時半即起，每睡二小時而起，飲茶少許復睡，行之若素，互二十年矣」，「鄭太夷先生之養生法」，1931年4月25日，《社會日報》，第二版。

欲，周易所言無思無為，皆不外此」。¹⁵⁴至於吳夫人悍妒一事也頗值得討論，因為考察日記，金月梅與吳夫人並非全無往來，例如 1903 年 3 月 12 日金月梅和吳夫人、鄭孝胥、鄭景一起遊逛上海愚園，晚上一起到丹桂第一台聽戲，同年 6 月 24 日鄭孝胥收到家信「雙清十八赴煙台，中照懼有變，更使稚辛致詞曰：『本欲沮其勿行，今既不可中止，則以速回為勸』，雙清曰多不過兩月，必返滬矣」，¹⁵⁵此時是鄭孝胥往廣西，吳夫人怕金月梅赴煙台而一去不回，讓鄭孝胥追回的事，適可證明吳夫人並無對金月梅悍妒的意思，否則大可不聞不問，1904 年金月梅寄信給鄭孝胥，也寄送一枚指環給吳夫人，可見金月梅和鄭家情感融洽，¹⁵⁶在日記之中也幾乎沒有看到鄭孝胥對於吳夫人有任何怨懟之意，雖然不知吳夫人的真確感想，但至少在表面並無深刻的矛盾，1910 年 4 月 28 日鄭孝胥在一次與朋友的宴飲中見到趙爾萃，趙向鄭轉達金月梅自述分手的理由，「鄭君遇我誠厚，其人家庭甚篤，吾不欲使其有間言，乃忍而去之爾」，¹⁵⁷側面提及了金分手離去的原因，這段戀情也使的鄭孝胥的私生活情形更加完全。

辛亥革命無疑對鄭孝胥的影響甚大，觀察此一段時間鄭氏的日記也能了解其對於當時人物社會的看法，辛亥革命後鄭孝胥回到上海住家海藏樓，其在日記中總結了迄今為止的仕途，「在湖南則驅之至北京，在北京則驅之至上海，冥冥之中，孰主張是，人生種因得果類由自取，余之造海藏樓，遂適為避世之地，此豈吾所料及哉」，¹⁵⁸鄭孝胥回滬在此時確實有避世之意，除了因為革命而仕途中止之外，還因為此一段時間，鄭氏頻頻遭到革命黨人恐嚇，投書將要殺鄭氏之故，在 1911 年 12 月 7 日，申報登載：

前夜有人在各處分佈傳單，其文云『近日袁世凱特派員孟庸生輦巨金來申，聯合雷繼聲、張菊生、夏粹芳等，主張君主立憲，運動《時事新報》、《新聞報》、《申報》、《時報》四家，捏報漢陽失守等情，淆亂人心，凡我同胞，切勿為其所惑，仍乞堅守一定宗旨以圖進行，民國幸甚，國民公啟』……本館今設誓言於此，如該項傳單確有實據，無論用何種激烈手段，皆所不辭，倘係架空憑虛，本館寧甘忍

154 1933 年 6 月 26 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五冊，頁 2468。

155 1903 年 6 月 24 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二冊，頁 882。

156 劉衍文，《寄廬茶座》，頁 91。

157 1910 年 4 月 28 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 1253。

158 1911 年 11 月 23 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 1358。

受，水落石出，會當有期。¹⁵⁹

當日鄭孝胥又收到自稱「革命團」者寄來的恐嚇信函，其中附上《中外日報》、《晚報》，期中晚報有一文章，其大意稱在武昌起義以後，袁世凱原以為起義規模甚小，詎料各省響應，先後獨立，「而各省獨立所以能如此之速者，皆源於報紙之鼓吹，滬上各報鼓吹為尤力，因特商之鄭蘇龕，鄭力言能擔任運動各報事，並舉孟庸生為副，當由袁世凱指撥銀二十萬，由鄭孟二人挾之來滬」，¹⁶⁰在文章中，鄭孝胥更被罵為「鄭賊」、「甘為袁世凱做奴隸而破壞共和政局」，此兩件事合併觀之，可知道是革命黨人的訊息戰，之所以稱訊息戰者，因為就此事而言，在同年11月27日清軍確實克復漢陽，而所謂袁世凱授意帶款來滬，經過孟昭常登報辯白，也證明並非事實。¹⁶¹惟此後鄭孝胥即頻頻遭到革命黨人投書威脅，例如前述的「革命團」，也有以日文寄送恐嚇信並勸其自殺者，¹⁶²11月25日又有署名「民國團」者投書預告將要暗殺，¹⁶³甚至在孟昭常登報辯白之後，又有一位署名「唐緘」者，指鄭孝胥「恃孟昭常辯護，上海議和，以刀筆破壞革命，已議決，三日內必殺汝，今日晚間可至門外試之」，¹⁶⁴類似此類投書恐嚇，預告暗殺之事在此段時間可謂櫛次鱗比，1912年1月16日，革命黨人陳其美探聽鄭孝胥的行蹤「鄭君猶未他往耶」，又有四川某甲向陳其美密告，謂「鄭有與議和使交通蹤跡」，¹⁶⁵友人吳學恂因此勸鄭暫避大連或青島。

同一日鄭氏即收到陶成章被殺的消息，為陳其美命當時為其部屬的蔣介石槍殺，¹⁶⁶陳其美為孫中山的忠實支持者，而陶成章之被殺，與當時光復會同盟會之間的矛盾不無關係。1913年8月28日，鄭孝胥至商務印書館，夏瑞芳向鄭氏展示一封警告信函，內容為「黨人惡虞洽卿、張菊生及夏等，可慎出入」，¹⁶⁷又接獲消息稱虞洽卿在當日早上遭人投擲炸彈，隔年

159 「本館第三次宣言」，1911年12月7日，《申報》，第一張第三版。

160 1911年12月7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1366。

161 孟昭常字庸生，與鄭孝胥一同成立預備立憲公會，與鄭氏熟識，孟昭常共在《民立報》辯白兩次，「孟昭常告白」，1911年10月18日，《民立報》，第一頁。「孟昭常第二次告白」，1911年10月20日，《民立報》，第一頁。

162 日記原文稱東文。

163 1911年11月25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1359。

164 1911年12月13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1369。

165 鄭孝胥《鄭孝胥日記》第三冊，1912年1月16日，頁1384。

166 一說為蔣介石親自殺之，見鄧文儀編著《蔣主席》第八章槍殺陶成章，頁14至16，國家圖書館臺灣華文電子書庫；另一說為蔣介石買兇殺之，見「陶煥卿被刺警耗」，1912年1月16日，《申報》，第七版。

167 虞和德字洽清，張元濟號菊生，夏瑞芳字粹芳，夏瑞芳為商務印書館之創辦人兼總經理，虞和德、張元濟、鄭孝胥為董事。

1月10日，鄭孝胥往高鳳謙宅中用晚餐，¹⁶⁸突然聽到夏瑞芳遭槍擊的消息，立刻與高鳳謙往醫院探視，惟夏氏已宣告不治。此後鄭孝胥勸張元濟暫避風頭，當晚亦送張氏直到車站，此事又與陳其美有關，原來「二次革命」期間，夏瑞芳曾為了維護商界利益，聯合上海商界反對陳其美駐紮上海，後租界工部局因而查扣討袁軍槍械，並驅逐孫文陳其美等人，時陳其美為討袁軍司令，對此事銜恨在心，遂遣人殺之，¹⁶⁹此亦可見陳其美之為人。故在當時，陳氏評價頗為兩極，以其贊同革命且忠於孫中山之故，但同時也因其多次暗殺政敵而招致物議，後陳氏被暗殺，許指嚴在《新華秘記》中說道「當陳被刺後，滬人大半數均稱快意，絕不為之鳴冤，蓋因被害者多，久犯眾怒也」，¹⁷⁰鄭氏本人也不甚清楚這些投書恐嚇的主使者究竟為何人，只是將其皆視為「黨人」，已將其與革命黨畫上等號，而鄭氏之厭惡革命黨已甚為明白。

關於鄭孝胥在辛亥革命之後對政局的認知以及其思想，最常表現在辛亥革命之後的一些言論或著作上。1911年11月26日，此時距離革命已經過近兩個月，攝政王載灃告廟宣誓，頒布《重大信條十九條》，希望緩和局勢，12月4日朝廷指派唐紹儀為代表與革命黨議和，革黨方面則提出議和條件為攝政王載灃辭職，同一日攝政王隨即向隆裕太后辭職，「立憲徒托空言，弊蠹因而叢積，馴至人心瓦解，國勢土崩，以一人措施失當，而令全國生靈橫罹慘禍，痛心疾首，追悔已遲」，¹⁷¹革命黨方堅持共和政體，毫無談判之餘地，¹⁷²最終在12月28日，隆裕太后下詔同意召開臨時國會，公決國體問題，對此鄭孝胥非常氣憤的表示「前日朝廷所頒信誓十九條，大權全在國會，政治改革之事已無可爭，今革黨欲傾覆王室，清臣欲保存王室，實則王室已成虛號，所爭者乃對於王室之恩怨，固與改革政治毫無關涉者也，若爭此而戰，則所謂自亂自亡而已」，¹⁷³並且痛心「皇室無人，被逼遜位」。鄭孝胥有如此之反應，固因其本身立憲的立場，在他看來，《重大信條十九條》若果能實行，則其所期望的君主立

168 高鳳謙字夢旦，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後任董事。

169 張樹年主編，《張元濟年譜》（北京市：商務出版社，1991年），頁116；又見郭廷已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1913年8月17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春秋TIS系統；又見1914年1月10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1497。

170 許指嚴撰，《新華秘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4月），頁153。

171 1911年11月26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1367。

172 楊凡逸，〈唐紹儀與1911年南北議和〉，《中央史論》，第26輯（首爾：中央史學研究所，2007年12月），頁199。

173 1911年12月31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1376。

憲便能成功，惟情況並不如鄭氏所想，在其看來，民主共和政體會導致當時的中國動亂頻仍，而不利於國家發展。1912年9月鄭孝胥作〈弔日本大將乃木希典詩〉，1912年7月明治天皇駕崩，9月乃木希典夫婦在葬禮當日雙雙自殺殉節，鄭孝胥得知此事頗為感嘆，在此詩中又可見其抒發對於辛亥革命之不滿情緒，其詩曰：

性情挾禮義，勃然在一發。百世猶興起，壯哉此賢匹。君臣與夫婦，同盡意何決。

似含厭世旨，棄濁自成潔。知君百戰餘，視死遠勝活。功名出至哀，垂老郁勁烈。

苟非斷脰舉，殊負一腔血。平生信詩書，助汝捨生熱。中原今何世，誰復識名節？

綱常既淪喪，廉恥遂漸滅。聞風獨酸鼻，感動為淒絕。低迴誦遺篇，夢魂逐豪傑。¹⁷⁴

此詩前半部在吟詠乃木希典的事跡，自中原至豪傑八句是感慨中國社會綱常道德淪喪，在日記中記「嗟夫，彼以愚忠為重，我以犯上為能，同為人類，背馳至此，奇哉」，¹⁷⁵又可見鄭在看見乃木希典為君殉節的事跡後，在對比中國發生的革命，所發出的感嘆，以今日觀之，此種不同顯示兩國的歷史發展不同，但透過此詩作也能有助於今人了解鄭孝胥在當時內心的思想。然而相對於宗社黨等保皇的立場，鄭氏對於民主共和制度本身卻似乎並無惡感，1911年11月14日，友人柯鴻年（貞賢）、孟森（莚孫）將往蘇州拜會當時自行脫離朝廷宣布獨立的江蘇都督程德全，鄭表示「吾於君國，不能公然為無情無義之舉，共和者，嘉名美事，公等好為之，吾為人臣，唯有以遺老終耳」，¹⁷⁶在此種私下的場合有這種表示，可見鄭其實並非完全反對共和，惟基於忠君以及個人道義，使他不願出仕民國，他又批評當時的社會「以利己損人久成習慣之社會，而欲高談共和，共和者，公理之至也，衿而不爭，群而不黨之效也，此豈時人所能希望乎」，¹⁷⁷可知鄭孝胥反對共和的原因，除了君臣恩義的因素之外，更認為當時的社會以及革命黨人以及轉而支持革命的立憲人士不足當此重任，而共和制度本身在鄭氏的認知中倒是不失為一良善之制。

觀察鄭孝胥對當時人物的評價也能側面了解其思想，首先以正面而言，亦即褒義而言，當屬升允。升允字吉甫，多羅特氏，蒙古鑲黃旗人，為前陝甘總督，後加入宗社黨活動，往

174 鄭孝胥著，黃坤、楊曉波校點《海藏樓詩集》（增訂本），頁230至231。

175 1912年9月15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1432。

176 1911年11月14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1356。

177 1911年11月22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1358。

還於大連、青島、日本等地籌畫復辟，鄭孝胥注意到升允之原因是因為 1912 年 3 月 14 日，當時清廷已經退位，而升允仍在陝西用兵，志在恢復，當時留守的河南巡撫齊耀林於是電致升允，勸其勿再用兵，升允回電表示自己原來系奉旨督師剿匪，「蓋初時系為剿張鳳翽而用允，今則共和甫布，忽又飭張鳳翽督軍以討允，昔視曰賊，今反為正大之師，昨日勤王，刻反為悖逆之賊，試問天下五洲，有此公理乎」，¹⁷⁸其實升允執意用兵，除了其本身忠於朝廷的理念之外，還因為有張鳳翽的緣故。張鳳翽為陝西省前清秀才，於 1902 年進入陝西武備學堂，時升允為陝西巡撫，畢業之後升允派遣張赴日本振武學校，不料張鳳翽加入同盟會，並在辛亥革命時被推舉為秦隴復漢大都督，¹⁷⁹1912 年任陝西都督，升允所指正是此事。對升允而言，昔日部下倒戈加入革命，而自己原是奉旨討賊，如今立場調換，情何以堪，後升允繼續用兵潼關，希望迎隆裕太后及宣統帝到陝西復辟，成為偏安之局，終因其部下甘軍不欲再戰，最終失敗。¹⁸⁰鄭孝胥稱讚升允的忠義，謂其「不愧王保保也」，王保保乃元朝名將，本名擴廓帖木兒，小字保保。元至正二十八年（明洪武元年，1368 年），明太祖於應天府即位，同年攻克元大都，元順帝率太子皇后北遷，後王保保封為齊王，對抗明軍，力籌戰守。殆至順帝駕崩，元昭宗即位後更受重用，明太祖曾派遣大將徐達攻北元，為王保保大敗，此後明朝終於不敢輕易出塞。後王保保跟隨昭宗北遷，明太祖曾經為了招降王保保，用盡各種手段，諸如遣使通好、派元降將招降，甚至策封其妹為皇子妃，王保保皆始終如一，不為所動，明太祖乃嘆其為「天下奇男子」。¹⁸¹對比王保保及升允，可以發現兩人的境遇有類似之處，例如身處王朝衰微之時，並且都忠於故國，不仕新朝，另外元清兩朝同為「征服王朝」，相對於其他朝代的忠臣名將，則更有可比性，故鄭孝胥將升允比為王保保，自有其邏輯所在。不過由於升允在回覆齊耀林的電報中曾表示「世界共和，迫於時勢，允何敢獨違…絕不與共和為難」，認為升允恐怕已有妥協之意，雖不知升允的真意如何，鄭孝胥在日記中認為升允「宜力戰直前，俟必不能支，則以奔俄為末路，使志趣大明於世界，亦可為滿洲生色矣，列國必敬重

178 1912 年 3 月 14 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 1404。

179 郭廷已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1912 年 1 月 16 日、3 月 15 日、5 月 6 日。

180 《時事新報》，1912 年三月十八日第一版。

181 張廷玉等編，《明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資料庫，列傳第十二；柯劭忞著，《新元史》，（上海：開明書店鑄版，1935 年），第 53 冊，列傳第一百十七。

其人」。¹⁸²升允日後仍為了復辟勤王竭盡奔走，諸如參與宗社黨活動，赴日活動結交政界名流，又往甘肅勸昔日舊部參與復辟「遍說諸馬」。¹⁸³鄭孝胥日後持續注意升允的消息，1914年間，鄭氏聽聞升允在日本生活窘迫，在東京賣燒鴨時，連忙與友人姚文藻（賦秋）、沈曾植（子培）合資接濟升允，1917年鄭孝胥作〈贈升吉甫東行〉詩，此詩可見當時鄭孝胥對升允的期許，其詩曰：「蜎志厭厭久厭看，巍然達道出江干。祈天可恃孤忠在，復闢誰言國事難。動地波濤送殘歲，傷心關隴話嚴寒。因公雪涕陶齋語，祇許留侯解報韓。」，¹⁸⁴此詩蜎志一句出典世說新語中，「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懔懔恆如有生氣。曹蜎、李志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一句，¹⁸⁵蜎志指雖然活著，卻有如黃泉下之死人一般，用在此處似乎為鄭孝胥對自己清遺老身分的自我解嘲，祈天至事難兩句，則稱讚升允為了復辟而四處活動，最後引留侯典故作結，留侯為張良封號，張良父祖皆為韓國相國，歷相五世韓王，及秦滅韓之後，張良散盡家財，準備刺殺秦王，為韓國報仇，此處則似以張良比升允，期許升允的行動能成功。

另一位值得探究的人物為湯壽潛，湯壽潛字蟄先，鄭孝胥在日記中第一次提到湯壽潛是在1901年，時鄭孝胥在張之洞幕府，沈增植、張謇發電報稱何嗣焜（梅生）病故，當時公祭，除了沈、張之外，湯壽潛亦到，鄭孝胥與其三人皆為贊同立憲的人士。1905年由鄭孝胥、張謇主持之預備立憲公會成立，經選舉，鄭為會長，張、湯為副會長，¹⁸⁶當三人在當時又有「鄭張湯」之號，三人皆為東南省分出身，由他們主持成立的立憲公會中也有許多工商界人士，例如張謇開辦的「大生紗廠」，鄭孝胥開辦的「日輝呢廠」，湯壽潛則是浙江鐵路公司總理，可以說三人不但立場相近，並且都具有實業的背景。1908年，立憲公司第一次開會「是日為會員第一次常會，到者四十四人，提議私立法政大學，求開國會，設宣講研習所三事」，¹⁸⁷此一階段立憲公會主要以普及知識，宣講立憲理念為主，1908年7月11日，鄭孝胥與湯壽潛共同擬電稿，以立憲公會的名義致電憲政編查館，要求速開國會，「若期限太遠，則中間之

182 1912年3月14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1404。

183 胡平生，《民國初年的復辟派》，頁363至366。

184 鄭孝胥著，黃坤、楊曉波校點《海藏樓詩集》（增訂本），頁276。

185 劉義慶著，劉孝標註，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中冊（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頁592。

186 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頁1368。

187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浙江省蕭山市委員會編，《湯壽潛史料專輯》，頁724。

變態百出，萬一外憂內患從而承之，則所期之事必成虛語...某等竊願王爺、中堂大人上念朝事之艱，下順兆民之望，乘此上下同心之際，奮其毅力，一鼓作氣，決開國會，以二年為限」，¹⁸⁸當時的請願運動聲勢浩大，參與請願者除了鄭孝胥湯壽潛所屬之預備立憲公會，尚有各省請願代表，然而最終朝廷查禁政聞社，此次請願以失敗告終，湯壽潛在此次請願失敗以後斷絕與立憲公會的關係，鄭孝胥則辭去立憲公會會長。1910年8月23日，湯壽潛致電軍機處，抗議盛宣懷回任郵傳部，結果遭革職，其上諭稱「措辭諸多荒謬，狂悖以極，朝廷用人自有權衡，豈容率意妄陳」，不過湯壽潛倒是早有心理準備，湯在事前向鄭孝胥說「吾月底入都，必闖大亂，或至見殺，無所託君，願以一詩弔我足矣」，鄭孝胥事後與友人談及湯遭革職事，認為「諭旨輕佻陋劣，乃下流筆墨，難乎其為朝廷矣」，¹⁸⁹對於朝廷的做法不表認同。雖然如此，在鐵路一事上，鄭湯兩人的態度卻不太相同，湯壽潛為浙江鐵路公司總理，在浙杭甬鐵路風波中，極力反對將浙江鐵路收歸國有，堅持自辦，拒絕借債，這與鄭孝胥素持的「借債造路為變法之本」大相逕庭，而盛宣懷與鄭孝胥在鐵路政策上算是相同的意見，鄭氏也代盛宣懷擬定收回商辦鐵路奏稿，可見兩人的不同；在辛亥革命以後湯壽潛轉向支持共和，鄭孝胥則希望保存皇室施行君主立憲，對於張謇、湯壽潛支持革命，鄭不只一次在日記中嚴厲譴責：「南中士大夫毫無操守，提倡革命，附和共和，彼於共和實無所解，鄙語有所謂失心瘋者，殆近之矣」，「武昌亂後，國人以排滿為心理，士君子從而和之，不識廉恥為何物，於黎元洪何責焉，宜作一書正張謇湯壽潛之罪，他不足道也」。¹⁹⁰鄭湯二人曾經同為立憲公會同志，至此已形同決裂，日後雖有往來，已不復昔日之相親。

第二節 鄭孝胥對袁世凱及丁巳復辟的評價

鄭孝胥對袁世凱之認識也是極有討論的意義，在清末民初的時候一般而言，革命黨人內部對於袁世凱並不能信任，光復會李燮和在〈上孫大總統書〉中評論袁氏，「彼蓋乘時竊勢，舞術自恣之人耳，安知所謂盡力民國，又安知所謂效忠滿廷，凡其竭智盡技，縱橫捭闔而

188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浙江省蕭山市委員會編，《湯壽潛史料專輯》，第725。

189 1910年8月25、28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1272。

190 1911年11月22、30日，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1358至1361。

為之者，無非為彼個人之計」，¹⁹¹《時報》評論袁氏亦無好感「袁初到北京，即向人云，『內閣大臣三年一任，為期太迫，恐於政治不能多所措』，識者莫不嗤之，今於共和前途，如是作梗，推其心，殆欲將萬世一系之專制君主易為袁姓而始快意也者」，¹⁹²當時正當南北議和之時，則袁世凱不受信任之情況可見一般。而鄭孝胥自從辛亥革命以後即時常將袁世凱的奏稿、報紙投書或與其有關之消息收錄日記中，可見甚為注意其動向，對於袁氏的認識也是隨時事而逐漸轉變，可謂是一段轉折的歷程。在1911年12月18日南北初次議和之後，袁世凱以及慶親王訓令清廷代表唐紹儀，向革命黨方提出召開國民會議以公決國體，時袁氏對外聲稱「仍主君主立憲」，鄭孝胥認為「今為袁計，有路三條，守君主而戰，一也，辭職以避他國，二也，漫應總統之舉，以圖日後之反正，三也，然第三條詭譎太甚，亦極危險」，¹⁹³1912年1月13日，報紙登載〈袁世凱覆梁鼎芬書〉，袁世凱頗有為己辯白之意「…奮此愚忠，戰彼群魔，但求皇統之能保存，領土之不破碎，免瓜分之慘，抒種滅之憂，惓惓自私，唯在於此…」，鄭氏讀後認為袁世凱「文筆清暢，質樸處頗可動人」，¹⁹⁴至此鄭氏對袁的觀感尚屬正向。1月23日鄭氏在報紙上看到一篇〈北京某要人之信件論袁世凱之真相〉，¹⁹⁵其大意为袁世凱並非真心贊成君主政體，指自從陽夏戰役之時袁氏努力壓制主戰派，並在最後建議袁「如果真心主張共和，為國利民福起見，似宜迅速疏通北軍，以平其氣…發表優待皇室條件，以釋親貴之疑，如此則共和可望，國家可全」，鄭氏在看過這篇文章後表示「吾以君子之心度項城，若果如此，真爾朱兆之類」，當時鄭孝胥反對皇室退位，自然也反對所謂優待條款，當鄭氏聽聞優待條款的消息，怨皇室不爭氣，罵道「是甘心亡國，孰能助之，哀哉」，¹⁹⁶鄭氏原冀望袁世凱能夠「開國會，定皇室」，或守君主而戰，聽到如此消息甚難接受，著名遺老勞乃宣對於袁世凱也有相似的期待，在其著作〈續共和正解〉中甚至勸袁世凱效法周召共和故事復辟清朝，「今年(1914)為共和三年，至總統十年任滿為共和十二年，其時宣統皇帝年已十八，可

191 白蕉，《袁世凱與中華民國》(台北市:文海出版社，1967年)，頁27。

192 白蕉，《袁世凱與中華民國》，頁23。

193 1911年12月24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1374。

194 1912年1月13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1383。

195 1912年1月23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1386。

196 1912年2月4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1390。

以親裁大政，預定於是年還政於皇帝，依周之共和十四年周召還政於宣王故事也」。¹⁹⁷對比兩者，可以發現兩者皆期待袁世凱就任大總統之後能還政清室，勞乃宣除了寫〈續共和正解〉之外又寫信給徐世昌，請他勸說袁世凱復辟，袁氏讀了勞乃宣的文章後便派人請勞氏擔任參議，¹⁹⁸對於勞氏所說的還政清室之議並無回應，而隨著時間過去，鄭孝胥對於袁世凱亦逐漸不再抱有期待，1912年2月7日鄭氏全文抄錄《袁世凱奏請收回封爵成命及瀝陳大局情形摺》，又說「余所錄者，皆望袁以臣節終始之意，倘果負朝廷，則我為不智矣」，¹⁹⁹頗有自責錯信袁世凱之意。

此後鄭氏仍會記述與袁世凱相關的消息，然而其意旨已大不相同，大致而言此後他對於袁氏或北洋政府的看法皆以嘲弄或不滿居多，例如善後大借款一事，北洋政府成立之後，袁世凱任命唐紹儀為國務總理，隨即派唐與英法德俄四國銀行借款，惟借款條件甚嚴苛，其中一項為銀行團監督裁軍，借款談判因此屢次破裂，鄭氏認為「惟下令解散，敢為亂者誅之，遣兵四鎮，借款四千萬，半年可定，何若是紛紛為」，²⁰⁰再如宋教仁被刺案，「武士英死於營倉，乃政府欲以是滅口，惜太遲矣，此真盜賊之政府也」。²⁰¹及1915年12月袁世凱稱帝，改元洪憲，鄭孝胥「觀之使人皆裂髮指」，值得注意的是，在復辟前數月，似乎袁世凱仍希望籠絡清皇室以及遺老舊臣，例如在1915年8月16日，時為洪憲帝制前四月，北京開始有改復君主政體的輿論，袁世凱「提議以衍聖公、明裔朱某、宣統帝為中國皇帝」，²⁰²又如8月22日鄭孝胥的日記中記載鄭的好友沈瑜慶提及袁世凱欲封宣統帝為王，²⁰³袁世凱病歿之後鄭孝胥仍不減其對於袁的憎惡，從日記中一件小事可以看出，陳其美遭袁世凱遣人刺殺身亡，其兄藹士在其美身亡約一年後前來拜訪鄭孝胥，求鄭為其弟做「百折不回」四字，並刻於墓碑上，鄭孝胥與陳其美固然為立場相對立之兩方，此時倒是能展現風度，答應幫忙，鄭氏認為陳其美「雖狂賊不識道理，然仇視袁世凱，卒為所殺…亂臣之罪浮於賊子也，使復辟事濟，陳

197 桐鄉盧氏校刊，《桐鄉勞先生(乃宣)遺稿》(臺北縣永和市:文海出版社，1969年，民國十六年(1927)桐鄉盧氏校刊本景印)，頁151。

198 愛新覺羅溥儀著，高陽序，《末代皇帝自傳》上冊新修版，頁104。

199 1912年2月7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1393。

200 1912年5月9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1415。

201 1913年4月26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1461。

202 1915年8月16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1474。

203 沈瑜慶，字志四，號愛蒼，沈葆楨第四子，鄭孝胥同鄉，並同為同光體詩人。

其美或反降，蓋惟理足以折服之耳，孫文極敬重升吉甫，即其事也」，²⁰⁴可見鄭孝胥雖然嫌惡革命黨，但對於陳其美還頗為敬重，而袁世凱以及湯壽潛等人的行為在鄭氏看來卻是「亂臣」，或許因為陳其美雖然為「賊子」，卻能長期追隨孫中山，立場堅定，兩相比較之下的緣故，其對於袁湯等人的憎惡更甚於陳其美，此處亦可見鄭孝胥在思想上的某些有趣之處。

在袁世凱病歿導致一連串政治動盪，丁巳復辟於焉發生，丁巳復辟又需從張勳組織徐州會議論起。當洪憲帝制失敗之後，南方各省的護國軍仍在繼續，於是袁世凱乃請馮國璋聯合各省將軍表達挽留以及停戰的意願，後馮國璋拜訪安徽將軍倪嗣沖以及長江巡閱使張勳，在1916年5月23日聯合各省代表在南京開會，是謂南京會議，但此次會議由於馮、倪、張三人目的各自不同，復因馮國璋邀請南方各省派代表與會亦遭拒絕，乃告失敗。張勳隨即於6月9日邀請各省代表赴徐州開會，是為第一次徐州會議，此次會議由張勳擔任主席，並宣布要綱十條：（一）尊重優待前清皇室各項條件（二）保全袁大總統家屬生命財產及身後一切榮譽（三）要求政府依據正當選舉手續，速行組織國會，施行完全憲政（四）催促滇黔桂粵浙蜀陝湘各省取消獨立，若固執成見，仍以武力解決（五）絕對抵制迭次倡亂一般暴烈分子參與政權（六）嚴整兵備，保衛本省區地方治安（七）抱持正當宗旨，維持國家秩序，設有用兵之處，所需軍旅餉項，仍當通力合籌（八）擬俟國事稍定，聯名電請政府罷除苛捐雜稅，以蘇民困（九）嗣後中央設有弊政，足為民害者，務當合力電爭，以盡忠告之義（十）中央施行簡政，固結團體，遇事籌商，對於國家前途，務取同一態度，²⁰⁵張勳素來厭惡南方國民黨勢力以及軍閥，要綱第三至五條明顯針對南方，張勳亦自述其目的在「籌南伐」，²⁰⁶當時黎元洪繼任總統，任段祺瑞為總理，申令仍然遵守臨時約法，並恢復舊國會，此舉自然不為張所喜，張勳希望排除國民黨重組國會，六七兩條目的似在確保自己軍隊餉需，九十兩條則希望固結以張勳為主之團體，力圖在政治上有所干預，²⁰⁷5年9月張勳又聯合倪嗣沖以及各省成立「省區聯合會」，即督軍團。

204 1917年3月29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1654。

205 胡平生，《民國初年的復辟派》，頁144。

206 張勳，《松壽老人自敘》收錄於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183冊（北京市：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頁199-210。

207 胡平生，《民國初年的復辟派》，頁144。

1917年4月，時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對德宣戰，段祺瑞內閣主張參戰，總統黎元洪態度則傾向反對，段祺瑞為了達成參戰目的一方面召集「督軍團」赴京召開會議，希望以督軍團會議的意見影響黎元洪府方，另一方面段內閣將對德宣戰案提交國會審查，私下又籌組「公民團」包圍議會，逼迫議會通過宣戰案，所謂公民團實為段祺瑞部下傅良佐授意，以市井流氓以及甲兵組成，手執請願旗幟，²⁰⁸包圍議院並毆打反對議員，此舉自不能達成其目的，果然國會憤而停止議案，最終緩議。時黎元洪府方與段祺瑞內閣矛盾日深，5月23日黎元洪遂免去段祺瑞總理一職，督軍團群情激憤，乃在徐州開會，是為第四次徐州會議，黎元洪因恐懼督軍團勢力乃令張勳入京調停，其實此次徐州會議，張勳雖然在會議中力主復辟，呼籲「現在時局如此非復辟不可」，各省督軍雖然並無明顯的反對，惟其意向不在此「各代表亦未嘗無深明大義者，不過當場出諸倉卒，只得屈從一時，殆一離徐，多數反對，而張勳固在夢中也」，²⁰⁹張勳率其部定武軍入京並在7月1日擁戴宣統帝復辟，段祺瑞隨即在天津組織討逆軍攻張，11日張軍潰敗，復辟乃歸於失敗。

關於丁巳復辟，鄭孝胥並未參與，至少並非居於核心位置，然而對於復辟的進展及消息卻是時時留意，鄭氏雖然以遺老自居，自然希望復辟，然而鄭氏在聽聞張勳準備復辟的消息時則傾向反對。1917年5月12日，黎元洪召張勳入京調停府院之爭，一時復辟的消息不逕而走，鄭孝胥反對「彼等以爭權樹黨之計，借復辟為擋箭牌耳，適成為加入宣戰之口實，復辟則皇室甚危，此曹真堪寸斬萬段也」，²¹⁰顯然鄭孝胥並不相信張勳為真心復辟，並且擔心此舉反而危害皇室，事實上張勳組織復辟也並非全無顧慮，張勳在復辟之前曾經與日本方面有過接觸，力求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除此之外張勳也與日本人佃信夫熟識。佃信夫為日本大陸浪人，同時也是積極倡導復辟的復辟論者，並居間打聽日本政府的態度轉告張勳，1916年12月19日，張勳透過直隸省長朱家寶的介紹會見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石光真臣，復又請石光將復辟的意願轉達日本政府，請他探聽日本政府的意象，然而由於當時日本寺內內閣對中國政策甚為重視與段祺瑞的關係，對於復辟並不支持，加上日本外務省也傾向反對，²¹¹尤其公

208 莊建平主編，《近代史資料文庫》第二卷，頁29至30。

209 翹生，《復辟紀實》（臺北縣永和市：文海出版社，1996年），頁26。

210 1917年5月12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1662。

211 胡平生，《民國初年的復辟派》，頁190至193。

使林權助，他認為「復辟絕不可行，若盲目行動，一定失敗」，²¹²並和外務大臣本野一郎向首相寺內正毅表達反對復辟的意見，最終日本政府並未贊成張勳的復辟。

張勳在得知日本政府的意象後，態度動搖，1917年6月19日張勳進京，稱「恐危及皇室，故未敢力主復辟之議」，²¹³因而遭到章梲、劉廷琛等遺老的斥責，遺老升允也請鄭孝胥寫信轉達張勳，請其盡速舉行復辟，勿失良機，張勳乃成騎虎之勢，在倉促之中舉行復辟。另一方面，在此次復辟中，由於張勳主導頒布了禁止親貴干政的上諭，也引起宗室王公的強烈不滿，不過在其作出實際動作之前，張勳已敗，一般認為清室在丁巳復辟中私下支持張勳，實則清室內部對於張勳的看法也並不一致。1917年7月9日，鄭孝胥得知復辟失敗的消息，「張勳之無謀，劉廷琛之躁妄，皆足取敗，辱我幼主，羞當世之士，哀哉」，²¹⁴大致而言，鄭的態度自始即傾向反對，擔心復辟將危害清室，同時似乎又對於自己不能參與而感到憤恨「此事由青島與上海諸君合謀之，而獨避我，知其必敗也」，²¹⁵復辟失敗，固與張勳等人謀畫不周有關，也有人認為與人心的變化有關，鄭孝胥卻不做此想。1917年9月，鄭拜訪遺老王乃徵，²¹⁶王認為「復辟之敗咎人心之壞」，鄭「終以為謀夫之不臧也」，²¹⁷其認為復辟失敗的主因在人，換言之若是鄭認為有實力才能者，則並非不可能，例如鄭孝胥一向欣賞的升允，也是其屬意的復辟人選，但是「惜以無助，恐難成功」。²¹⁸

在丁巳復辟之後，宗社黨的恭親王溥偉、肅親王善耆陸續與鄭孝胥接觸，力圖再舉，溥偉與善耆同為宗社黨成員，尤其溥偉在隆裕太后召開御前會議時堅決反對退位，此次復辟溥偉與善耆於六月前後分別與張勳會面接觸，其會面詳細情形不得而知，至少在態度上不至於反對，大體言之兩王在此次復辟中並未參與籌畫。²¹⁹殆復辟失敗後，恭親王溥偉來信邀請鄭孝胥往青島商討復辟事宜，鄭孝胥以「張勳新敗，北京事無可為，且靜觀其變」為由婉拒，

212 莊建平主編，《近代史資料文庫》第二卷，頁198至201。

213 1917年6月19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1668。

214 1917年7月9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1671至1672。

215 1917年7月29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1675。

216 王乃徵，字聘三，日記稱王聘三，為鄭孝胥組讀經會之常客。

217 1917年9月15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1683。

218 1913年6月24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1472。

219 翹生，《復辟紀實》，頁42至43。

²²⁰後鄭的友人姚賦秋指稱鄭孝胥「黨於恭王」，使鄭孝胥頗為不滿，特別反駁「宣統，吾君也，余未嘗見恭王，何為黨乎」，²²¹似乎顯示鄭與恭王關係並不密切，態度值得玩味。肅王善耆則是在丁巳之後邀請「復辟失敗諸人」往旅順商議復辟，曾經兩次派人與鄭接觸，第一次在1917年8月3日，有一位名唐其盛的人，持肅親王的名片前來拜訪，並告知鄭肅親王邀請「復辟失敗諸人」往旅順的消息，第二次在8月22日，是東亞同文書院教頭日本人森茂，森茂是肅王委託在上海的辦事人員，也同樣持肅王名片來，惟鄭孝胥最終並未前往旅順，原因不詳，從鄭與宗社黨人物的關係來看，恭王溥偉在青島，肅王善耆在旅順，一向與鄭較少往來，升允早年在甘肅蒙古一帶活動，鄭孝胥對其甚為欣賞，兩人之間也互有往來，總之，或許是由於在丁巳復辟時未能參與舉事之故，在此後的一段時間裡，在復辟一事上，鄭氏與宗社黨的關係顯得較為疏遠。

第三節 鄭孝胥與陸榮廷的往來

在丁巳復辟之敗之後鄭孝胥開始與陸榮廷接觸，一度將復辟的希望寄託在陸的身上，此事自然與陸榮廷在當時的勢力消長有關。陸榮廷與鄭孝胥之間淵源甚早，陸算是鄭的舊部，鄭孝胥曾在1903年應岑春煊之邀隨同往廣西剿匪，岑春煊又奏調武建軍入廣西協防，由鄭孝胥統領，後鄭氏又升任督辦廣西邊防，後因武建軍兵士水土不服，不能負荷防務，於是岑春煊乃又調陸榮廷的榮字營入桂，以分擔武建軍防務。陸榮廷字干卿，廣西武鳴縣人，幼年貧苦，後在安南當土匪，光緒二十年受廣西提督蘇元春招安，使陸任健字營統領，1904年升任榮字營統領，陸榮廷算是鄭氏的部下，不過鄭氏在督辦廣西邊防的期間，與陸大多係職務之間的往來，私交不甚親密。1905年鄭孝胥因邊餉問題辭去廣西邊防督辦，而陸則持續在廣西發展，在1911年升任廣西提督，民國成立以後為廣西都督，1916年袁世凱宣布洪憲帝制，陸原本支持袁世凱，在與梁啟超接觸之後，轉而贊成討袁，遂宣布廣西獨立，袁世凱病歿，黎元洪繼任總統，陸榮廷復為廣西督軍，並授一等大綬嘉禾勳章。1917年陸榮廷北上，被任為

220 1917年7月20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1674。

221 1917年7月30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1675。

兩廣巡閱使，途經上海，送給鄭孝胥「洋四千元，金表一枚，香雲紗一匹」，²²²當時鄭孝胥正與朋友在上海會賓樓，長子鄭垂以及羅誠(開軒)來告知陸榮廷贈禮，鄭孝胥不受，並讓兩人將贈禮退還，4月1日鄭氏從報紙上得知陸榮廷進京覲見宣統帝的消息，表現的頗為輕蔑「此真可發一噓也」，然而陸榮廷進京覲見清帝的消息卻引起了清室以及遺老的重視，陸榮廷給宣統帝請安，贊助崇陵植樹一萬元，並獻上土產以及洋元，因而博得清室以及遺老的好感，例如梁鼎芬，梁素以忠於清室聞名，民國成立之後赴易州(今河北易縣)哭謁崇陵，太傅陳寶琛感其忠義，又因自願結廬守陵，遂授為崇陵種樹大臣，民國三年為宣統帝師傅，梁也會去拜訪其他遺老，勸他們捐款贊助崇陵植樹，因此陸榮廷此舉自然能獲得這些清室師傅們的好感，而清室上下為了安排回賜陸的禮物也是頗費周折，又因當時正值丁巳復辟前後，故在清室內部有了「南陸北張」的稱號，²²³以張勳陸榮廷為兩大忠臣，期望藉他們的勢力有所進展。1917年4月20日陸榮廷返回上海，親自拜訪鄭孝胥，兩人「談久之」，陸在覲見皇帝的時候，曾報效一萬元的崇陵種樹費，並稱其中有四千元是鄭孝胥托令代呈，這四千元原是陸贈與鄭的，鄭不受，陸遂藉覲見皇帝的機會，算是為鄭孝胥做了人情，清室也因此頒布御筆「貞風凌俗」給鄭，鄭孝胥非常歡喜，將御筆裱框懸掛在屋內，深以為殊榮，經過此事，鄭陸兩人恢復往來，鄭對於陸的態度也大為改觀。

1918年1月，鄭孝胥拜訪胡嗣瑗談復辟事，胡嗣瑗認為「非張陸合，不能再舉」，又帶來張勳的消息，張勳部下蕭某，往廣西見陸榮廷，對於復辟的後續，陸提出三項條件，第一復辟二字勿遽提出，第二張陸兩軍會師武漢，第三陸榮廷軍入粵，張勳負責接濟兵餉，鄭孝胥則認為應「使張陸通氣」，確認了以張勳陸榮廷為主的復辟策略。適巧鄭孝胥的長子鄭垂在1917年12月9日應陸榮廷的邀約赴桂，兩個月後(1918年2月4日)鄭垂自桂返滬，此行陸榮廷聘鄭垂為顧問，並帶來陸的口信「不念舊主，非人也，特時未至，不能語人耳」，²²⁴且說陸的部下桂軍多有「念舊」之情，此時正值護法運動，桂軍軍餉告急，急需支援，鄭孝胥為了籌措軍餉於是又派鄭垂聯絡宗方小太郎，三日後宗方小太郎及波多博來找鄭，表示借

222 1917年3月21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1653。

223 愛新覺羅溥儀著，高陽序，《末代皇帝自傳》上冊新修版，頁112。

224 1918年2月4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1709。

款「事頗不易」，而當時鄭孝胥的四子鄭勝病重，²²⁵鄭亦無心力再籌畫，此事最終無果。

1919年11月1日，鄭垂再赴廣西，1920年3月1日被陸榮廷派往奉天聯合張作霖，當時直系皖系之間關係緊張，而桂系則與北洋直奉二系聯合，相約直系在北方攻皖系，桂系則驅逐孫中山，在北方，因總統徐世昌不滿段祺瑞部下徐樹錚，遂聯合直系曹錕吳佩孚以牽制皖系，總理靳雲鵬，本亦是段部，但因與徐樹錚不和，故徐世昌乃利用徐靳不合以分化皖系，靳雲鵬則為了與徐樹錚抗衡，不得不引直系奉系為外援，²²⁶於是北方乃成直奉聯合攻皖的局勢。而在南方，自從丁巳復辟之後，段祺瑞重新組閣，但不恢復舊國會，而是另行選舉成立新國會，即俗稱之安福國會，此屆國會以安福系議員為最多，於是段乃能掌控國會，孫中山即往南方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部分舊國會議員成立非常國會，西南軍閥如桂系等，本來因為不滿段祺瑞武力統一政策，故支持孫中山的軍政府，然其後桂系與直系妥協，逐漸架空孫中山。

在此局面之下，鄭孝胥透過曹經沅接觸皖系要人王揖唐，請王勸段祺瑞恢復張勳、陸榮廷巡閱使之職，如此「則軍政府自滅，而北方亦可免蕭牆之禍」，²²⁷三日後(1920年3月3日)曹經沅回復鄭，稱張陸二人復職之事需待南北議和之後。同年7月直皖戰爭爆發，一時輿論盛傳直系曹錕勾結張勳復出，重新復辟，張勳乃於7月24日在各報刊登電文，先是嚴正駁斥「所稱勾引，何據云然」至於復辟，則是表明自己受恩深重，但「博浪之錘，止於一擊」，說自己並無再次復辟的意思，轉而批評段祺瑞在復辟時背信棄義，欺騙自己，最終說自己「年已七十，但得作太平之民，永拜共和之賜，於願已足」，²²⁸正式表態不再參與復辟，張勳復辟失敗之後，轉而經營實業，大有退隱的意思，徐世昌曾委任張勳為林墾督辦，張勳亦不就，²²⁹鄭孝胥則持續關注張勳，並且也嘗試活動各方使張勳重掌兵權，此與前述「非張陸不能再舉」基本上是相同策略，可見此時鄭孝胥的確是希望張勳復出，此時在鄭的計畫中是需要張勳的，故鄭在閱報得知張勳電文之後勃然大怒，「張勳此電大為各國人恥笑，誰為

225 日記稱小乙，民國七年二月七日診斷罹患腦膜炎，十三日宣告不治。

226 莊建平主編，《近代史資料文庫》第二卷，頁51至56。

227 1920年3月10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四冊，頁1818。

228 「張大辦居然出面了」，1920年7月24日，《時事新報》，第二版。

229 愛新覺羅溥儀著，高陽序，《末代皇帝自傳》上冊新修版，頁126至127。

屬稿?殆可殺也，若果本心，真奴才也」，²³⁰此後陸續有張勳擔任巡閱使的消息，終於沒有結果。

直皖戰爭結束後約一月，粵桂戰爭隨即爆發，鄭孝胥對於桂系的表現期待甚高，甚至在7月10日曾經夢見陸榮廷，認為陸「有封侯之相」，9月26日鄭孝胥閱報得知有以江蘇督軍李純為首的十省聯盟之說，「忽有十省聯盟之說，李純為之首，蓋欲排斥張作霖也，此徐世昌陰嗾之，必以副總統許李純而與革命黨合，革命黨南援陳炯明，北援吳佩孚以破復辟之舉，張作霖、陸榮廷皆其敵也，張勳速出，則彼等難合，若陸破陳炯明，張滅吳佩孚，則復辟可成矣」，²³¹在此可見鄭仍然設想張勳復出，但後來局勢的發展並不如鄭孝胥所推斷，江蘇督軍李純於1920年10月11日死於督軍署，而粵桂戰爭的發展，桂系陸榮廷不敵陳炯明，最終退出廣東。關於桂系失敗原因，當時輿論分析，以惠州戰役為例，因桂軍進入惠州以來發生多次搶劫以及火燒民房事件，故民間自發組成民軍襲擾桂軍，使桂軍作戰頗為不利，其他諸如餉械以及糧食不足等皆為其原因，²³²1921年6月第二次粵桂戰爭爆發，此役以桂系潰敗告終，7月22日陸榮廷登報下野，鄭孝胥得知消息後甚為憤怒，一改之前看好陸的態度「閱知甚怒，辱我莫甚，速敗為愈」，²³³日後鄭孝胥雖然仍與陸榮廷有書信往來，然其計畫以支持張勳陸榮廷等軍閥為主的復辟策略最終宣告失敗。

230 1920年7月24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四冊，頁1836。

231 1920年9月26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四冊，頁1842。

232 「廣東特約通訊」，《時事新報》，1920年10月14日第二張第一版。

233 1921年7月22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四冊，頁1874。

第四章 1923 年後的活動及參與滿洲國

第一節 鄭孝胥入宮經過

自辛亥革命至 1923 年這一段時間，鄭孝胥雖然持續關注時局，並參與復辟活動，然而其與清室之間少有直接往來，1923 年鄭孝胥經清室太傅陳寶琛引薦得以在遜清朝廷中任職，比起在上海時的活動，此時的鄭氏更為接近清室，也更接近復辟的核心。根據日記，宣統帝溥儀第一次提到鄭孝胥是在 1923 年 5 月 29 日，陳寶琛將一本書獻給溥儀，溥儀將書交給執事太監收藏，但後來書本遺失，溥儀遂欲斥革太監，雖經陳寶琛緩頰，溥儀仍然堅持，「臧師傳嘗言宜罷太監，且鄭孝胥亦言宜罷」，²³⁴陳寶琛因此懷疑是鄭孝胥向溥儀上密摺的緣故，然而據鄭氏本人回憶並無密摺之事，推論是某人勸溥儀罷斥太監時提到他的名字，鄭孝胥在上海遺老圈交遊廣闊，並且其遺老的認同也為人所知，或許因為如此乃漸漸使溥儀得知鄭的消息。至於溥儀之所以召見鄭孝胥的原因，與清室內部的情況有關，當時溥儀在其英文教師莊士敦建議下，力圖改革內務府，內務府機關在清朝尚未入關時即已存在，到了清室遜位之後仍然存在，按清室優待條款，民國政府每年需移撥四百萬兩與清室，然而經費時常拖欠，故為了維持皇室的日常開支，內務府經常需要抵押文物，據莊士敦回憶，內務府貪汙情況嚴重，甚至與商人勾結，盜賣皇室文物寶器等，²³⁵莊士敦乃建議溥儀成立一專門機構來清點紫禁城文物，最初由李鴻章次子李經邁主持，惟李氏身體病弱，又請其親戚代替，然而此親戚在內務府任職三個月便請假離開，而內務府對於溥儀的改革自然大為不滿，遂請醇親王載灃出來勸溥儀放棄改革以及省費適宜，溥儀於是有所感於必須請一位不受醇親王影響的漢人來主持改革，另一方面鄭的同鄉陳寶琛也向溥儀推薦鄭孝胥，亦使溥儀映像深刻。

1923 年 6 月 26 日發生紫禁城建福宮失火事件，燒毀大量文物，溥儀懷疑是由宮中太監偷盜文物，縱火滅跡所致，於是在 7 月時遣散宮中近千名太監，8 月 7 日遺老胡嗣瑗自京中回家，在上海拜訪鄭孝胥，談及遣散太監的情形，溥儀主動詢問胡有關鄭孝胥的消息：

²³⁴ 1923 年 5 月 29 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四冊，頁 1950。

²³⁵ 莊士敦著，高伯雨譯，《紫禁城的黃昏》（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2012 年 4 月），頁 212 至 213。

上問胡曰「曾見鄭孝胥否」，對曰「見之」，上曰「鄭年幾何」，對曰「六十餘」，上嗟嘆曰「亦六十矣」，胡復對曰「其人甚壯，僅若五十爾」。²³⁶

胡嗣瑗與鄭孝胥彼此互有往來，丁巳復辟後兩人更是互相商談復辟策略，胡嗣瑗又勸鄭孝胥入京陛見，1923年8月22日，鄭孝胥入京謁見，此次召對在鄭的日記中並無直接的描述情形，是在8月24日陳寶琛對鄭孝胥提到溥儀非常滿意，「鄭孝胥殊不老，聞其言論，使我氣壯」，至於詳細情形，溥儀回憶的較為具體，「他從盤古開天一直談到未來的大清中興，談到高興處，眉飛色舞、唾星亂飛，說到激昂處，聲淚俱下」，²³⁷溥儀對鄭孝胥大為傾倒，於是便安排讓鄭氏來主持紫禁城皇產事業清理以及財政改革。1923年12月31日鄭孝胥收到陳寶琛信，「主人晤接後，極致傾倒，以為任重致遠，捨是莫屬」，²³⁸1924年1月11日鄭孝胥抵達北京，先受召見，之後與溥儀師傅陳寶琛、朱益藩、英文教師莊士敦、內務府大臣紹英會面。鄭孝胥的改革策略大致上可分為開源及節流兩種，首先節流方面，是整頓內務府，鄭孝胥擬具〈籌辦說帖〉，來說明其整理財政的步驟，「內務府要務以清理財政為最急，宜分為三期，以便循序漸進：第一期籌款，一面裁減，一面變價，第二期存款，預算既定，悉付現款，第三期余款，出少入多，用息存本」，²³⁹所謂裁減即裁減宮中開支，變價為將紫禁城中的古玩寶器變賣或抵押折現，再將款項存入銀行，逐漸增加存款，另外也計畫裁併內務府中的機構，只保留四個科，溥儀又陸續封鄭孝胥內務府大臣、頭品頂戴、懋勤殿行走、掌管內務府印鑰等職，以示對其全力支持及信任，實際上這些方法之中有些已經有人提出過，前內務府大臣金梁，在寫給溥儀的條陳中有清寶物一項，「各殿所藏，分別清檢，佳者永保，次者變價，既免零星典售之損，亦杜盜竊散失之虞」，²⁴⁰金梁在鄭孝胥入宮召對時經鄭氏奏保，後又經溥儀指示協助鄭孝胥的改革工作，據莊士敦的回憶，鄭孝胥的減省方法確有成效：

在短短三個月期中，他已經很有成效地每月為清室節省了數千元開銷，到這時候，

已經有種種跡象看出，如果沒有甚麼阻力，則在一個合理的短期間內，他可以向遜

236 1923年8月7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四冊，頁1958。

237 愛新覺羅溥儀著，高陽序，《末代皇帝自傳》上冊新修版，頁181。

238 1923年12月31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四冊，頁1977。

239 1924年3月5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四冊，頁1988。

240 愛新覺羅溥儀著，高陽序《末代皇帝自傳》上冊新修版，頁179。

帝提出一份收支平衡的預算表了。²⁴¹

鄭孝胥在開源方面亦多方籌畫奔走，例如鄭孝胥在1924年2月24日拜訪時任中國銀行總裁金還，討論籌款事，金還回應「如得曹錕囑財政籌款，而託稅務司設法，每月由正金、匯豐、匯理、道勝各撥數萬，當可得也」，²⁴²3月22日，拜訪北京實業銀行經理卓定謀、北京匯豐銀行買辦鄧君翔，分別商量為皇室籌款事宜，其中鄧君翔自稱歷年在匯豐銀行極力保護皇室的情況，也博得鄭孝胥的信任，²⁴³6月11日拜訪王克敏，王為1924年孫寶琦內閣的財政總長，又任海關附加稅保管委員會委員、關稅自主委員會委員等職，鄭孝胥請王克敏設法在海關經費中籌撥五萬元給皇室，王克敏答應設法籌畫。²⁴⁴

除了籌撥款項之外，開源策略的另一項來源即四庫全書付印事，鄭孝胥在入宮之前即已擔任商務印書館董事，1924年適逢商務印書館成立三十年，遂決議付印《四庫全書》以資慶祝，館方分別向清室及國務院會商，清室同意出借文淵閣《四庫全書》，並將全書運至上海付印，國務院則承諾保護，²⁴⁵其中負責接洽館方及清室的人即鄭孝胥，當時鄭同時為商務印書館董事以及清室內務府大臣，計畫在《四庫全書》出版之後支付一筆款項給清室，²⁴⁶此即鄭孝胥的另一項開源之策。1923年12月商務印書館編輯鄭貞文、何公敢拜訪鄭孝胥商議《四庫全書》付印事宜，由於此次付印是商務印書館獨立出資，鄭孝胥直言此事的艱難「必盡罷營業，十五年乃畢，且無紙可用」，²⁴⁷鄭貞文則有意引進日本資本，以日本庚子賠款對華文化事業投資的方式進行，鄭孝胥承諾會引見內藤湖南等人士參與，1924年1月10日，鄭氏收高鳳謙來信，提及縮印《四庫全書》，即將原版尺寸縮小排印，是為節省紙張，鄭孝胥將高的來信轉交陳寶琛，並表示印書一事應由皇室發起，隔日鄭孝胥進京召對時就向溥儀提到出版《四庫全書》事，1月16日，高鳳謙來見鄭孝胥，「示所擬縮印《四庫全書》辦法十二

241 莊士敦著，高伯雨譯，《紫禁城的黃昏》，頁251。

242 1924年2月24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四冊，頁1985。

243 1924年3月22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四冊，頁1990。

244 1924年6月11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四冊，頁2003。

245 林志宏，〈舊文物，新認同——《四庫全書》與民國時期的文化政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7期，2012年9月，頁74。

246 李志茗〈商務印書館120歲—70年的努力：歷經波折的《四庫》影印〉，收錄於「澎湃新聞」：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15923（2024/1/7點閱）。

247 1923年12月12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四冊，頁1974。

條」，1月24日 傅增湘、高鳳謙與鄭在午餐時商談印書事，鄭孝胥表示已經與內務府大臣紹英、民國政府交涉完成，並說明專車護送《四庫全書》至上海出版。2月28日再與傅增湘、高鳳謙約午餐，高鳳謙稱接到消息，內閣大多同意印書事，「唯有程克者謂，曹錕欲自印，暫緩批允」，金梁提議「徑辦不顧」，²⁴⁸幸數日之後，此提案不了了之，到此出版事尚稱順利，4月9日高鳳謙致函鄭孝胥，「四庫書事已失敗，曹錕書小紙付國務院，止勿運此書」，鄭氏頗為震驚「彼昏為何人所算，可哂也」，²⁴⁹而失敗的原因一方面由於曹錕親信李彥青索賄六萬元未成，故私下掣肘阻撓，另一方面亦因北京政府出於利益及政治的考量，故出爾反爾，推翻前約，²⁵⁰到此鄭孝胥出版《四庫全書》以開源的計畫遂告失敗。

鄭孝胥任內務府大臣總共約三月，雖然不無成果，惟仍遭受許多阻力，即以精簡人事以及減省開支兩事而言，已經得罪許多宮中人士，最明顯的莫過於內務府。前已述及，內務府自清初即已存在，長期由滿人擔任內務府大臣，鄭孝胥之前的金梁、紹英、耆齡等，據溥儀回憶，命鄭孝胥管理內務府已經算是破格提拔，鄭在上任之後雖然得到溥儀全力支持，順勢引薦了許多贊成改革的人士，例如引薦佟濟煦為三旗護軍總辦，命莊士敦為頤和園辦事大臣，以及奉上諭協助的金梁，其中莊士敦及金梁更因早於鄭孝胥入宮，故他們對於清室的財政狀況知之甚詳，鄭孝胥也時常與兩人交換意見，兩人皆支持鄭的改革。然而鄭孝胥在進行整頓時仍然不順利，據溥儀回憶鄭孝胥上任後，「從此內務府就像癱瘓了一樣，要錢，根本沒錢，真的沒有，帳上明明是這樣記著，要東西，東西總是找不到存放的地方」，²⁵¹而減省費用的舉措更使鄭孝胥被視為眼中釘，鄭孝胥上任數日後就收到恐嚇信，鄭將信拿給莊士敦看，並毫不在意的撕碎。另外內務府一方，自然不甘心利益受損，暗中抵制鄭孝胥的行動，例如請醇親王載灃出面施壓，5月21日醇親王載灃入宮辦事，即態度堅定曾告知鄭「裁減之舉，且俟節後」，²⁵²內務府也暗中向民國政府散佈不利於鄭的謠言，而早在鄭孝胥入宮之前，陸續有議員以及激進團體呼籲修改清室優待條款，因而形成一股不利於清室的輿論，在鄭孝胥

248 1924年2月28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四冊，頁1986。

249 1924年4月9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四冊，頁1993。

250 林志宏，〈舊文物，新認同——《四庫全書》與民國時期的文化政治〉，頁74。

251 愛新覺羅溥儀著，高陽序，《末代皇帝自傳》上冊新修版，第184頁。

252 1924年5月21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四冊，第2000頁。

辭職的同一天，內務府大臣紹英向溥儀轉達京畿衛戍司令王懷慶「對鄭孝胥的做法很不滿意，王懷慶說如果再叫鄭孝胥鬧下去，民國如果有甚麼舉動，他就再沒辦法幫我的忙」，²⁵³就在四個月前，鄭孝胥還和王懷慶見過面，王稱讚溥儀英毅有大略，並承諾暗中負保護之責，王懷慶一向和清室關係甚密，在此之前和鄭的關係亦不算太壞，不過數月時間態度丕變，令人玩味，凡此種種皆造成鄭孝胥及溥儀的極大壓力，鄭孝胥在幾次請辭受慰留之後，終於 6 月 25 日上諭開去鄭孝胥內務府大臣差事，仍為懋勤殿行走。

第二節 逼宮事件與影響

鄭孝胥開去內務府職務之後約一個月，發生了馮玉祥逼宮事件，即北京政變，直接導致宣統帝溥儀被迫出宮，影響不可謂不大，此事導因於第二次直奉戰爭，直奉兩系之決裂係因吳佩孚欲倒梁士詒內閣而起。自從直皖戰爭之後，直奉兩系矛盾日深，梁士詒在奉系支持下就任國務總理，而吳佩孚因梁士詒立場親日又是奉系所支持，對梁內閣極為不滿，奉系張作霖則支持梁內閣，第一次直奉戰爭由是而起，結果直勝奉敗，吳佩孚權勢日增，不但掌握中央政府，在直系之中亦勢力最盛，且吳佩孚一如段祺瑞，主張武力統一全國，奉系張作霖被驅逐至關外，整軍經武，培養實力希望反攻直系。另一件事為 1924 年江浙戰爭，因直系江蘇督軍齊燮元與皖系浙江督辦盧永祥互相衝突而起，此役奉系做為援助皖系盧永祥一方而率軍參戰，²⁵⁴第二次直奉戰爭因此發生。皖系段祺瑞雖在直皖一役大敗而隱居天津，然力圖恢復，並利用其北洋老輩的身分及人脈聯合其他勢力，力圖推翻直系曹錕、吳佩孚。²⁵⁵孫中山則是在陳炯明擊敗桂系陸榮廷之後重回廣東，1924 年在韶關誓師北伐，於是皖系段祺瑞、奉系張作霖以及廣東孫中山遂結成反直系同盟。

馮玉祥本為直系，但與吳佩孚因利益分配問題，漸生齟齬，另一方面馮玉祥頗為欣賞孫中山，並且與國民黨人士互相往來，亦成為馮發動政變的原因。在第二次直奉戰爭時，吳佩孚派馮玉祥部開往熱河，馮先後與段祺瑞聯絡，密商政變適宜，奉系張作霖來信聯絡馮玉祥，

253 愛新覺羅溥儀著，高陽序《末代皇帝自傳》上冊新修版，頁 186。

254 莊建平主編，《近代史資料文庫》第二卷，頁 608 至 612。

255 杜春和，林斌生，丘權政編，《北洋軍閥史料選輯》下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1981 年），頁 105 至 106。

請馮暫緩熱河方面的行動，以便集中兵力攻擊吳佩孚，馮玉祥又多次與黃郛書信往來，互通訊息，此外馮更說服直系之孫岳、王承斌等人，為政變之準備，²⁵⁶1924年9月直奉戰爭爆發之後，馮玉祥率部開往熱河，10月22日突然返回北京，23日控制北京並發動政變，總統曹錕及總理顏惠慶先後辭職，由黃郛任總理，11月4日在馮玉祥建議下，黃郛內閣通過了修正清室優待條款，五日馮玉祥部下鹿鍾麟即率軍包圍紫禁城逼溥儀出宮。

溥儀出宮後便暫時到醇親王府，此時馮玉祥國民軍控制北京，封鎖交通，也派兵包圍醇親王府，一時消息不通，陳寶琛、朱益藩等近臣皆無法出入，關於莊士敦、羅振玉、鄭孝胥的活動分述如下，莊士敦在五日早上聽聞逼宮消息，立即和貝勒載濤開車入紫禁城，為馮軍拒於門外，遂轉而往使館區找荷蘭公使，復又會同英國公使麻克類、²⁵⁷日本公使芳澤謙吉共同向外交部長王正廷對馮軍的逼宮行為表示關切，王則表示保證溥儀安全，莊士敦之後便開車往醇王府。²⁵⁸羅振玉在政變發生前數日，因看到國民軍孫岳部駐紮在大高殿，復又在景山架炮，²⁵⁹知道事情緊急，先前往日本使館，和竹本多吉大佐約定以無線電交換情報，隨後乘坐使館區的京津國際列車往天津日軍司令部(支那駐屯軍)，要求保護溥儀，司令部請羅回去找竹本大佐，羅又親自拜訪段祺瑞，請段發電報制止馮軍暴動，時段祺瑞準備就寢，未和羅振玉見面，但答應拍發電報，羅在11月6日回到北京後竹本大佐表示日軍會在醇王府周圍巡視，當日出入不通，直至隔天才得進入醇王府。²⁶⁰鄭孝胥則在11月5日聽聞逼宮消息後即與竹本大佐密謀，計畫派遣醫生進入北府給溥儀看病，再以生病為由護送溥儀離開醇王府，前往日本兵營，另外又電致段祺瑞，「望公再致電馮等，許上移居東交民巷，暫避意外危險」，²⁶¹後鄭孝胥與竹本的副官中平常松、醫生村田前往醇王府，但此計畫遭到醇親王以及陳寶琛等師傅的反對而作罷，11月7日收到段祺瑞的覆電「皇室事，余全力維持保護，並保全財產」。²⁶²11月22日段祺瑞抵達北京就任臨時執政，鄭孝胥率長子鄭垂迎接段，隔天段祺瑞，

256 胡平生，《民國初年的復辟派》頁401至408。

257 麻克類，Sir James William Ronald Macleay (1880至1918)，1922年至1926任英國駐華全權公使。

258 莊士敦著，高伯雨譯，《紫禁城的黃昏》，頁312至313。

259 大高殿今稱大高玄殿，現址在北京市西城區陟山門街西街21、23號，景山位於北京市西城區景山前街景山公園。

260 羅振玉，〈集蓼編〉，《羅雪堂先生全集》五編冊一(臺北市:文華，1969年)，頁41。

261 1924年11月5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四冊，頁2026。

262 1924年11月7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四冊，頁2026，鄭孝胥致電段祺瑞之後，

請曹經沅向鄭表達欲延攬其入內閣，但鄭孝胥向來敵視民國，即使鄭與段頗有私交，此時「擬就其顧問猶慮損名」，態度堅定的拒絕了。²⁶³

自從段祺瑞任臨時執政之後，過兩日醇王府的馮軍撤退，情勢暫時緩和，醇王府內部便因溥儀行止的問題發生爭執，醇親王載灃、內務府以及其他王公希望能爭取恢復優待條款，復號還宮，反對溥儀離開，而應靜待時機，寄希望於段祺瑞以及張作霖。段祺瑞私下頗為同情溥儀，然而對於恢復優待條款一事始終虛與委蛇，況此次政變，馮玉祥事先亦與段祺瑞互相通信，金梁在其日記中批評段祺瑞並無恢復優待條款的誠意，「蓋自段張到京，皆空言示好，實無辦法，眾為所欺，以為恢復即在目前，於是事實未見，而意見已生」。²⁶⁴而鄭孝胥、羅振玉、莊士敦雖然主張不盡相同，然而其認為應該盡速離開醇王府則是一致的，鄭孝胥與金梁更因為在離開北府一事上屢遭宗室王公的反對，開始對醇親王載灃、載澤等王公感到不滿，²⁶⁵溥儀本人早在政變發生前數年尚在紫禁城內時，受莊士敦的影響，早已有出洋留學的意向，幾次計畫潛逃出宮，惟受阻於醇親王載灃，卒未成行，此時更是極望能早日離開醇王府。11月27日莊、鄭、羅共同請溥儀離開醇王府，計畫先往德國醫院，²⁶⁶再往使館區，莊士敦聽說馮玉祥近日又將有動作，羅振玉則是早就認為「北府危地，不可久居」，事先和遺老柯劭忞前往日本使館詢問保護事，²⁶⁷後又向溥儀說馮玉祥和北京的過激分子將對他不利，鄭孝胥則是在看到其子鄭禹找到的〈平民自治歌〉以及北京大學的共產黨傳單後認為情勢緊急，²⁶⁸乃向溥儀力言「赤化主義」的危險。11月29日，莊士敦、陳寶琛和溥儀先乘車往東交民巷德國醫院，抵達醫院之後，莊士敦又馬上往英國使館交涉保護溥儀事宜，莊走後鄭孝胥抵達

段曾發電致馮玉祥，指驅逐溥儀出宮有欠妥當，馮因其成見，不以為然，反而認為段祺瑞贊成推翻直系係為報私仇，並且是「磕頭磕上了癮」，杜春和、林斌生、丘權政編《北洋軍閥史料選輯》下冊，頁165。

263 《上海畫報》紀載在直皖戰爭之前段祺瑞即因雅慕鄭孝胥氣節名聲，有網羅之意，惟鄭孝胥以清遺老自居，只願意交換政見，及馮玉祥逼宮時，段祺瑞有意延攬鄭入內閣，輿論認為是段祺瑞欲以閣員職位攏絡羈縻鄭孝胥，鄭遂憤而不就，「鄭蘇戡先生軼事」，1926年，《上海畫報》，第72期，第2頁。1924年11月23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四冊，頁2028。

264 金梁，《遇變日記》，收錄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三輯，（中國文史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頁104。

265 當時王公們對於恢復優待條件非常樂觀，故鄭孝胥、金梁秘密謀劃離開醇王府，莊士敦因與載灃私交甚篤，私下勸說載灃，惟載灃仍然反對，愛新覺羅溥佳《1924年溥儀出宮前後鎖記》，收錄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三輯，頁104。

266 原址在今中國北京市東城區東單，原建築已不存，今稱北京醫院。

267 羅振玉，〈集蓼編〉，《羅雪堂先生全集》五編冊一，頁43。

268 1924年11月26、27、29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四冊，頁2029至2030。

德國醫院，由於鄭在 11 月 5 日曾與竹本大佐計畫過一次，此次定議往日本使館，在奉溥儀之命往日本使館知會竹本大佐，竹本在請示過公使芳澤之後，請溥儀速來，於是鄭孝胥與溥儀乘車往日本使館，陳寶琛也隨後抵達，公使芳澤安排房間，溥儀遂暫住在日本公使館。

鄭孝胥對於自己在這次託避日本使館的行動是非常滿意的，作詩〈十一月初三奉乘輿幸日本使館〉，其詩曰：

乘回風兮載雲旗，縱橫無人神鬼馳。手持帝子出虎穴，青史茫茫無此奇。是日何來
蒙古風，天傾地坼見共工。休嗟猛士不可得，猶有人間一禿翁。²⁶⁹

此詩自乘回至此奇四句，大概描寫 11 月 29 日當天鄭孝胥與溥儀乘馬車馳往日本使館的經過，帝子指溥儀，其中青史、休嗟至禿翁等三句尤能看出其得意的心情。關於這段託避日本使館的經過，鄭孝胥及羅振玉皆有參與，但記述卻不大相同，此與鄭羅兩人之間的矛盾有關，兩人的矛盾可以從幾件事中看出來，首先是出宮經過，羅振玉在自傳中寫到出宮時，提到是由羅和陳寶琛商議之後決定，據溥儀回憶，羅振玉並曾向溥儀稱此次出奔日本使館，是由於羅先後向竹本大佐以及段祺瑞多方交涉的結果，而刻意的忽略鄭孝胥的動作，實際上鄭與羅兩人在北京政變時皆曾與竹本大佐商量保護溥儀事。按公使芳澤謙吉的說法，在 1924 年 11 月 29 日週六，下午三點忽有「遜帝從者某氏」來拜訪，「某氏」告訴芳澤溥儀已經在使館區德國醫院，請求日本使館暫為保護，²⁷⁰芳澤當下由於事出突然，告知對方暫容考量，「某氏」離開之後約二十分鐘，溥儀一行人抵達日本使館區兵營，再由芳澤迎入使館，安排房間，雖然在當時由於芳澤不願公布「某氏」的身分，然而在比對之後可以發現此段紀載與莊士敦的說法情節大致符合，所不同者，在莊的回憶錄中，莊將保護事告知芳澤之後，「在室內踱著方步考慮這個問題，然後做出決定，他願意願意接待遜帝」²⁷¹，在《順天時報》中芳澤並未立即答應「某氏」的請求，其他情節在兩方記載中是相同的。又根據羅振玉〈集蓼編〉的紀載，「當上未蒞日館之前，予與膠州柯學士憂北府危地，不可久居，乃同訪日本公使，商假館事，公使謂由使館迎迓，種種未便，若諸君能衛上蒞此，當竭誠保衛」，²⁷²在日本外交

269 鄭孝胥著，黃坤、楊曉波校點《海藏樓詩集》（增訂本），頁 323。

270 「日使對於容留遜帝之談話」，1924 年 12 月 2 日，《順天時報》，第三版。

271 莊士敦著，高伯雨譯，《紫禁城的黃昏》，頁 354 至 355。

272 羅振玉，〈集蓼編〉，《羅雪堂先生全集》五編冊一，頁 43。

文書中 1924 年 11 月 9 日的紀錄中的確有羅振玉、柯劭忞與芳澤的談話紀錄，²⁷³但當日並無直接談論保護溥儀，而是有關擔心馮玉祥政變之後，中央政府將會出現極端社會主義的情況，如今已無從得知羅柯二人究竟在何時向芳澤提出保護溥儀的請求。又，莊士敦與鄭孝胥在託避日館一事上，兩方記載之情節也大致相符，所不同者，鄭孝胥以為在其知會竹本時，竹本即已通知芳澤，實際上竹本並未立刻通知芳澤，而是等到溥儀及鄭孝胥一行人抵達使館之後才通知的，故就莊士敦、芳澤謙吉、鄭孝胥等記載能相互配合來看，則鄭孝胥所記載的情節較為可信。

次為優待條件，到了日本使館稍微安定之後，眾人又對優待條件的問題發生爭論，鄭孝胥主張爭取恢復原條款，並曾向溥儀表示能藉由他和段祺瑞的關係爭取恢復優待條款，鄭孝胥的信心其來有自。鄭孝胥和段祺瑞部下曹經沅、王揖唐皆有私交，而從段祺瑞欲延攬鄭孝胥入內閣一事來看，兩人也的確有交情，惟段祺瑞出於社會壓力，終於沒有恢復優待條款，鄭孝胥因此事遭受攻擊，故在 12 月 6 日憤而請假離京歸滬，金梁在其日記中提到此事，認為鄭孝胥受到排擠，頗為鄭抱不平，「後知近日有人頗思為包圍計，專在排鄭，非為爭優待也，君子爭寵，小人爭利，嗚呼，死無日矣」。²⁷⁴當時鄭孝胥在眾遺老中的確因為幾件事受到攻擊，第一件事在 11 月 30 日莊士敦拜訪張作霖，本欲說明溥儀托庇在日使館的事，不料張作霖大為憤怒，指責莊不該將溥儀帶往日使館，又派部下參謀質問溥儀為何往日使館，時貝勒載濤「告以皆鄭一人之謀，且極言鄭之奸惡」前已述及，²⁷⁵醇親王載灃以及其他王公向來主張復號還宮，本就反對溥儀離開，此次託庇日館事前全然不知，11 月 29 日在溥儀抵達日本使館之後才命鄭孝胥回德國醫院告知載灃及載濤，²⁷⁶故此時載濤才會指責鄭孝胥。第二件事由於鄭孝胥與羅振玉對於溥儀住日本使館起了嚴重的爭執，羅在 11 月 6 日上書溥儀「國民軍以暴力逼改優待條件，當時處危地，不可以理喻，今既出險，若仍不言，是默認也，宜向各邦宣告當日以暴力逼迫，由片面修改優待條件情形」，羅振玉又電召升允來京以為奧援，²⁷⁷最

273 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大正 13 年（1924 年），第二冊，頁 469 至 470。

274 金梁，《遇變日記》，頁 104。

275 1925 年 12 月 1 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四冊，頁 2031。

276 溥儀來開醇王府往德國醫院，醇王府管家張文智座車一路跟隨至德國醫院。

277 愛新覺羅溥佳，《1924 年溥儀出宮前後鎖記》，收錄於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十五輯，頁 275。

終溥儀採納了羅的建議，羅並語帶諷刺的說鄭孝胥「自謂能令段祺瑞恢復優待者，亦不告而南歸矣」²⁷⁸，此後因為在出奔日使館以及優待條件兩件事上，溥儀相信羅振玉的解釋，反而認為鄭是「冒功取巧的小人」，故暫時疏遠鄭而親近羅。12月5日升允來日本使館給溥儀請安，指責鄭孝胥「清談誤國、妄談誑上、心懷叵測」，金梁的日記側面敘述了此事「初某與鄭大鬧意見，某乃召升來，挾以為重，升見上而某之說行，鄭遂決然去矣」，²⁷⁹金梁所說的某即羅振玉，此事也能說明鄭孝胥與羅振玉為爭取溥儀的信任而彼此不和的情形。

鄭孝胥在12月6日回上海後，許多近臣如師傅陳寶琛、朱益藩、遺老金梁皆希望追回鄭孝胥，金梁自從鄭孝胥任內務府大臣後便時常與鄭往來，彼此理念相近，並襄贊政務協助管理，溥儀出宮以後金梁上疏請「力速出洋」，以避馮玉祥軍的危險，並主張優待條款「上不可自爭，仍當由眾爭之」，又建議出洋之後授鄭孝胥全權辦理善後以及民國交涉，殆鄭孝胥因受排擠而返回上海後，金梁上疏溥儀，稱讚鄭孝胥「孝胥有毅力而無私心，可託大事，臣前請速出洋，而授孝胥以全權辦理善後，蓋知今日左右，唯孝胥能當此重任也」²⁸⁰，師傅陳寶琛也屢次寫信勸鄭回京，但鄭孝胥終於沒有回京。

關於溥儀遷居張園的經過，由於溥儀希望出洋，因此出洋的討論在醇王府時已經有許多人陸續提出建議，例如溥儀還在醇王府時，胡適曾來拜訪，曾勸溥儀出洋要下定決心，「如果到英國，莊士敦先生可以照料，如果去美國也不難找到幫忙的人」，²⁸¹遺老梁鼎芬認為溥儀應去英國，「當以遊學為名，上及后妃並帶教習、翻譯及文學仕從各一二人，約歲用十萬元，以三年計，分年預備，亦不難籌」。²⁸²鄭孝胥對於出洋一事則明顯較為謹慎，似無定論，鄭在政變之前是支持溥儀出洋的，在1923年10月鄭孝胥曾派其子鄭禹赴京倡議籌集溥儀出洋留學費用，預計在瑞士租房，每年費用四萬，惟當政變發生之後，其態度轉趨謹慎，據溥儀回憶當時鄭孝胥並不主張出洋，鄭返滬之後接到陳寶琛以及其姪劉驥業的電報，得知溥儀

278 羅振玉，〈集蓼編〉，《羅雪堂先生全集》五編冊一，頁43。

279 金梁，《遇變日記》，頁108。

280 金梁，《遇變日記》，頁106至108。

281 愛新覺羅溥儀著，高陽序，《末代皇帝自傳》上冊新修版，頁206。

282 金梁，《遇變日記》，頁104。

急於出洋往日本，說「非前途商妥，萬勿急行」，又說「事勢轉緩，宜以緩應」，²⁸³而溥儀在住進日本使館之後，受到日本的精心照料，逐漸對日本有好感，故決定出洋到日本，羅振玉支持出洋日本，羅在日本使館結識了使館書記官池部政次，兩人都贊成溥儀赴日，及溥儀向羅振玉提出希望赴日之後，羅與池部遂開始安排，²⁸⁴先後與段祺瑞交涉，後羅振玉父子再隨同溥儀赴天津，最終住進天津日租界的張園。

第三節 鄭孝胥在天津時的活動與主張

鄭孝胥再次見到溥儀已是 1925 年二月二十八日，時溥儀已遷居天津張園，自 1925 年至 1931 年跟隨溥儀在天津，鄭孝胥在這六年所做的復辟舉措主要有三個方面，一為聯絡軍閥以及外籍軍政界人士，二為提出〈三共論〉，三為與日本人士的往來。鄭孝胥在七年間見過的軍閥甚多，包括直系吳佩孚、齊燮元，奉系張作霖、張宗昌、李景林、褚玉璞等，按溥儀在自傳中的說法，天津時期的小朝廷對復辟主要分成三種意見，其一稱還宮派，以陳寶琛、梁鼎芬、胡嗣瑗等舊臣為主，原先主張恢復優待條款，其後見局勢不明，又主張靜待時機，醇親王載灃等王公的意見其實與還宮派較為接近，惟王公們更趨保守，北京政變之後，王公們曾寄希望於段祺瑞，事情無果之後乃主張靜待時機，但其與陳寶琛等舊臣的差別在於王公們反對溥儀離開醇王府，故相較於還宮派舊臣，王公一派與溥儀反而較疏遠，殆國民革命軍北伐時，王公們乃又搬遷到天津日租界。其二稱聯日派或出洋派，以羅振玉為首，羅振玉從民國八年自日本返國之後住在天津，開始與日本領事館、軍部往來，羅向來不信任軍閥，其主張溥儀應赴日本的原因主要是出於對溥儀安全的考慮，以及相信日本願意幫忙，故羅主張借重日本的勢力，²⁸⁵這點與溥儀及鄭孝胥頗為不同，其與書記官池部政次原本即商議溥儀先往天津日租界，再往日本，惟受到陳寶琛等舊臣的反對，遂在天津住了六年。其三稱用武人派，其最熱心者為溥儀本人，希望拉攏各地軍閥以達成復辟，鄭孝胥則並無一定之主張，鄭在天津時支持溥儀拉攏軍閥，在聯日一事上，鄭孝胥起初反對溥儀赴日本，直到 1931 年九一八事

283 1925 年 1 月 14、17 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四冊記，頁 2036 至 2037。

284 羅振玉，〈集蓼編〉，《羅雪堂先生全集》五編冊一，頁 43 至 44。

285 羅繼祖，《蜉寄留痕》（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頁 116 至 117。

變之後鄭對於日本的想法才有了轉變。

雖然鄭孝胥的主張並非用武人派，但鄭還是支持溥儀拉攏軍閥，在北京政變以前鄭孝胥就與吳佩孚有往來，天津時期接觸過張作霖，1922年6月報載吳佩孚向總統黎元洪建議廢除清室優待條款，其實欲廢除優待條款者大有人在，例如當時的國會陸續有議員提案廢除優待條款，社會上更有激進團體「反對清室優待大同盟」，除了南方之外，主政的北洋軍閥欲廢除優待條款者尚在少數，故清室聽聞消息之後大為震恐，鄭孝胥聯合上海諸遺老，草擬公函，預備辯論，此事後來不了了之，殆鄭孝胥入宮之後曾派長子鄭垂往洛陽拜訪吳佩孚，此次會面結果良好，吳「招待甚殷，覆函頗敬」，吳又特別致函國務總理孫寶琦，「極言皇室困苦，應維持其自籌生計之況」，²⁸⁶1924年9月11日鄭孝胥親自往洛陽吳佩孚宅中賀節，吳佩孚派專人開車迎接，到了北京政變時，當時正值第二次直奉戰爭，故小朝廷與吳佩孚暫時沒有往來，直到1925年7月之後吳佩孚才派部下遲雲鵬來覲見溥儀，²⁸⁷溥儀讓鄭孝胥來見遲，以後吳佩孚便透過遲雲鵬與鄭孝胥書信往來。至於張作霖，前已述及，溥儀曾在1924年11月30日派莊士敦見張作霖，張對於溥儀往日使館的行為甚感不滿，1925年7月14日，張作霖派部下閻澤溥帶了十萬元來見溥儀，邀請溥儀往他的行館中會面，鄭孝胥及陳寶琛皆反對溥儀前往，故溥儀拒絕了，惟次日張固請，溥儀考慮到張作霖對清室一向懷有感情，最終還是和鄭孝胥、榮源去了，張作霖以跪拜迎接，使這次會面給溥儀很好的映象，鄭孝胥雖然先前反對，此時對於張的表現則頗為滿意，遂向溥儀奏稱「彼有誠意，見之亦善，姑觀其後」。²⁸⁸

鄭孝胥在天津時期曾經預測中國的未來，此即「共氏三世」圖讖，後世或稱「三共論」，其內容「共和生子曰共產，共產生子曰共管，共氏三世，皆短折，共氏遂亡，皇清復昌」，²⁸⁹三共論總結了中國從晚清到民國時期的演變，共和即民國，生子曰共產一句是鄭孝胥預言民國將被共產黨推翻，共產生子曰共管一句則是預想中國被共產黨統治之後將會引起國際共管中國，最終由溥儀復辟登基，就是「皇清復昌」，總結成為清朝、共和、共產、共管、清朝的演變順序，其實三共論圖讖本身只是鄭孝胥對人的戲語，其中預言共產黨與國際共管其

286 1924年4月16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四冊，頁1994。

287 遲雲鵬為吳佩孚部屬，1924年任直魯防禦總指揮，1927年特任鵬威將軍。

288 1925年7月20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四冊，頁2058。

289 1925年11月16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四冊，頁2072。

實都與當時時事有關，1921年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共產主義學說便開始在中國盛行，許多遺民都能觀察到「赤化」的流行，例如羅振玉，羅在辛亥革命之後即往日本，殆1919年準備返國，當時犬養毅來送行，羅振玉便提醒犬養，注意共產主義的流行，「今歐戰告終，赤化遽興，此平日不謀均安之效也，此禍恐延及東方」，²⁹⁰山西舉人劉大鵬在日記中繼載山西省學生散發「赤化黨之傳單」給晉系閻錫山部的部隊，欲推翻閻錫山²⁹¹，鄭孝胥在日記中第一次提及共產黨是在1924年11月，在北京大學看共產黨傳單，對於共產主義並無好感，鄭孝胥在日記中曾評論共產主義「俄行共產制，舉國皆為盜賊，至人相食，今猶欲倡世界革命，奇哉」，²⁹²在溥儀出宮時，鄭孝胥也是出擔心共產主義將危害溥儀，故決定了暫避日使館的計畫。

至於鄭孝胥「共管」想法的來源，則是認為中國時局動亂，列國出於維護利益的立場，必然出面干涉，此即共管的來源，例如1925年發生的「五卅事件」，事件之後多地有示威罷工之情形，英日兩國租界也爆發抗議，共產黨則趁機煽動民間排外情緒，鄭孝胥與日本友人水野梅曉討論事件，「慮滬案難於收拾，將至列國共管」，²⁹³此外「共管」又與鄭的「用客卿」、「門戶開放」等理念相配合，溥儀認為鄭孝胥的共管論比張之洞的中體西用說更進一步「不但要西洋技術、西洋資本，而且主張要西人來做官…他認為復辟要成功絕不能沒有列強的幫忙，這種幫忙如何才能實現呢，他把希望寄託在『共管』」²⁹⁴，雖然鄭孝胥並未系統的論述三共論的內涵，但上述這段描述可以視為該理論中，「共管」階段之後的「皇清」階段所要施行的政策，總之鄭孝胥追求國際共管，不僅是對時局的預言，更包含了鄭的復辟策略以及治國理念在內，1930年，共產黨已在數省建立「蘇區」，鄭孝胥目睹了此種局勢之後，更加篤定的堅信「共產」以及「共管」馬上就要發生，「今年鬧共產，明年鬧共管，其時至矣」，²⁹⁵凡此種種皆被鄭孝胥視為三共論之應驗，其後追求「共管」更是成為鄭孝胥復

290 羅振玉，〈集蓼編〉，《羅雪堂先生全集》五編冊一，頁37。

291 1926年10月31日日記，收入劉大鵬著，喬志強注，《退想齋日記》，（北京市：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年1月），頁343。

292 1926年3月13日，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四冊，頁2092。

293 1925年6月5日，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四冊，頁2053。

294 愛新覺羅溥儀著，高陽序，《末代皇帝自傳》上冊新修版，頁281。

295 1930年4月20日，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四冊，頁2279。

辟策略中的重要理論。

鄭孝胥提出了聘雇外國人為顧問的「用客卿論」，鄭孝胥第一次提到客卿一說是光緒二十三年，當時鄭向張之洞推薦用伊藤博文為「客卿」，以利變法，此時鄭孝胥再提用客卿，則主要是基於其「共管論」中用外國人之資金、技術、人才來開發中國的想法。主要有三個人，其一為流亡沙俄將領謝米諾夫，²⁹⁶其二為流亡奧國男爵阿克第，三為英國人羅斯。²⁹⁷

1925年10月20日升允欲介紹謝米諾夫給溥儀，陳寶琛認為溥儀若見了謝，恐招致物議，主張反對，鄭則認為「苟不能止上勿往，不如籌一謹密之策，否則，上必密往見之」，²⁹⁸其實鄭有如此反應，還是與羅振玉有關，羅與升相熟悉，故鄭不願謝米諾夫與溥儀的關係為羅所壟斷，後鄭孝胥還是透過羅振玉結識了謝米諾夫，鄭又透過張宗昌的部下顧振權使其勸張宗昌擴張其麾下的白俄軍隊，欲借其勢力協助復辟。關於張宗昌和謝米諾夫的淵源，自俄羅斯十月革命之後，布爾什維克組成的紅軍與由部分前帝俄軍官以及保皇派組成的白軍發生內戰，後白軍不支，遂在1922年流亡至中國邊境，時張宗昌在奉系，為綏寧鎮守使兼吉林省防軍第三旅旅長，張宗昌收編了白軍，實力大增，成為奉軍一大勢力，謝米諾夫原本就是屬於這支白軍，張宗昌收編白軍之後擔任張的顧問。²⁹⁹溥儀在1925年11月1日召見謝米諾夫，謝自稱得到英美各國以及俄國羅曼諾夫皇室的支持，將來要在滿蒙邊境建立「反赤根據地」，並迎溥儀正位登極，溥儀嘉獎其「犯難舉事，反赤復國」，並撥給五萬元以幫助其事業，³⁰⁰謝米諾夫在1925年12月往日本東京活動，期間持續與鄭書信往來，1926年5月鄭孝胥與謝米諾夫、蒙古人包文淵以及畢庶澄等人齊聚會面，³⁰¹比此相見甚歡，又推鄭孝胥為大哥，足見鄭與謝的關係，但是其他的近臣如陳寶琛、胡嗣瑗則不信任謝米諾夫，主張溥儀不應繼續接見謝，鄭孝胥則滿不在乎的表示「諸人本極畏事，固宜如此」，³⁰²而謝後來漸漸以各種理由向

296 俄文原名：Григо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емёнов，1890年9月25日—1946年8月30日。

297 關於羅斯的身分，在溥儀《我的前半生》中提到他是英國人，《申報》紀載「此人係德國籍，羅姓，充紐約某報駐津訪事」，所辦報紙名為《世界誠報》，「溥儀在津被騙」，1929年11月28日，《申報》，上海版第8版。

298 1925年10月20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四冊，頁2068。

299 杜春和，林斌生，丘權政編，《北洋軍閥史料選輯》下冊，頁334。

300 愛新覺羅溥儀著，高陽序，《末代皇帝自傳》上冊新修版，頁255。

301 原名多布端，為蒙古人，改漢名包文淵，此時為謝米諾夫的翻譯。畢庶澄在1914年加入奉系張宗昌部，1925年任山東濟南防衛總司令，兼第八軍軍長及膠東護軍使等職。

302 1926年5月23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四冊，頁2102。

溥儀以及鄭孝胥要求撥給經費，³⁰³溥儀回憶，稱謝由於活動久不見效，逐漸轉為招搖撞騙，但鄭依然相信如故，戰後，謝被蘇軍處以絞刑。

流亡奧國男爵阿克第與英國人羅斯皆在 1929 年與鄭孝胥結識，而羅斯稍早於阿克第。鄭孝胥與羅斯的結識在 1929 年 5 月 23 日，羅斯向鄭宣稱將在天津辦報，以宣傳復辟理念，稱為《誠報》，並將在中國日本英國等地招股兩萬元，鄭孝胥答應入股三千元做為報館股本，鄭孝胥由於羅斯為謝米諾夫的朋友，鄭既已和謝約為兄弟，自然也信任羅斯，羅斯除了與鄭孝胥往來之外，也受恭親王溥偉聘為顧問，但羅斯的辦報經費短絀，幾次向鄭借錢，某次羅斯向鄭借四千元，鄭的長子鄭垂認為羅斯不能信任，因勸鄭孝胥留意，³⁰⁴鄭孝胥仍以自己的銀行存款作為抵押，出借四千元給羅斯，但羅斯到期不還，以致鄭的存款被銀行扣押，儘管鄭孝胥仍然信任羅斯，但是其所辦的《誠報》卻無法長久經營，1930 年 1 月 15 日鄭收到消息「誠報不支，日內將停」。³⁰⁵至於阿克第則是透過羅斯的介紹才結識鄭孝胥，其人為流亡奧國男爵，曾在奧國海軍以及在上海工部局任職，鄭孝胥計畫使阿克第在歐洲成立「震旦會」，希望透過阿克第在歐洲宣傳復辟，以得到歐洲國家的支持，鄭孝胥又和阿克第談論未來復辟之後的「政策」，請阿克第往歐洲之後代為宣傳，其政策如下：一、成立責任內閣，閣員參用客卿，二、禁衛軍以客將統帥、教練，三、速辦張家口至伊犁鐵路，用借款包工之策，四、國內所有官辦、商辦企業限五年內一體成立，分析這四條政策，可以發現一些鄭孝胥過去的理念，第一二條即鄭孝胥「用客卿」的具體規劃，因不信任中國人的能力，故大量進用外國人，第三條的主張與鄭孝胥籌辦錦瓊鐵路時的主張如出一轍，引進外國資本以速成鐵路，到了此時，這些主張因過去的經驗而延續下來並更加具體，1929 年 8 月 21 日阿克第經溥儀聘為清室顧問，鄭孝胥起草上諭，並發六個月薪奉，阿克第在 9 月 23 日出發，臨行前承諾鄭孝胥「所欲辦之事，期于必達」，³⁰⁶儘管鄭對阿克第抱甚高期待，但其後卒無成果。分析此三人

303 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四冊，1931 年 5 月 12 日條，「謝米諾夫來，言即日入北京，求借四百元」，頁 2325，1931 年 5 月 26 日條，「謝米諾夫復求小助，命鄭垂致八百元于謝米諾夫」，頁 2326。

304 愛新覺羅溥儀著，高陽序，《末代皇帝自傳》上冊新修版，頁 285。

305 1930 年 1 月 15 日，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四冊，頁 2266。

306 1929 年 9 月 23 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四冊，頁 2251。

與鄭孝胥的結交經過，可以發現謝米諾夫與阿克第是比較相似的，即此二人都向鄭孝胥宣稱擁有外國勢力支持，謝米諾夫稱自己有俄國皇室、日本的支持，其麾下白俄軍隊也讓溥儀抱有期望。至於阿克第，羅斯曾對鄭孝胥提到阿在歐洲與眾多英國、奧國貴族往來，³⁰⁷鄭孝胥也期望阿克第到歐洲之後能爭取歐洲各國對復辟的援助，故此二人皆能引起鄭孝胥的興趣，希望藉其在外國的支持或影響力，支持復辟，至於羅斯，雖然並未提到他擁有外國人脈，不過就辦報一事看，鄭對他的期望與謝米諾夫、阿克第事相似的，鄭孝胥希望藉此三人來實現共管論理想。

鄭孝胥在天津時期對溥儀出洋或「聯日」的態度，一向是反對的，其原因，除了因為與支持「聯日」的羅振玉競爭之外，也因為鄭孝胥追求國際共管，在結外援一事上並不把日本當作其唯一選擇，故在九一八事變之後溥儀前往東北之前，主張與日本合作的依然是羅振玉，鄭孝胥多數則持反對態度。此外日本領事館以及司令部兩方皆欲拉攏溥儀，因此這兩方勢力多數時間並無統一之政策，而各行其事，一時頗為矛盾，例如 1925 年 12 月 7 日，溥儀在羅振玉的引薦下會見了日本黑龍會人士佃信夫，羅振玉稱溥儀自從出宮之後，日本朝野各界都非常同情，許多人皆欲出力贊助復辟活動，佃信夫即其中一人。佃信夫觀察了中國辛亥革命之後的混亂局勢，認為中國的混亂皆因共和而起，因此鄰邦日本基於道義必須設法救助，協助復辟清朝，並趁機將滿蒙納入日本勢力範圍，是為「大陸經營」，佃信夫以此暗中活動，民國成立之後佃曾協助肅親王善耆與川島浪速的滿蒙獨立運動，暗中支持反袁勢力計畫推翻袁世凱，川島與佃同為黑龍會人士，佃自然希望川島與肅親王能成功，³⁰⁸惟袁世凱病死之後，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轉變，轉為扶持張作霖並與執政的段祺瑞親善，佃信夫遂協助張勳丁巳復辟，仍然失敗。其後佃信夫在雜誌上投稿痛斥日本公使林權助暗助段祺瑞攻張勳，³⁰⁹此次見面係羅振玉接洽，溥儀命鄭孝胥、陳寶琛、胡嗣瑗、劉驥業隨同出席，又通知日本天津總領事有田八郎出席，不料佃信夫一見有田在座，甚感不悅，轉頭就走，鄭孝胥事後責問佃信夫失禮，佃信夫則稱溥儀通知有田之舉「不誠意，不能罄其所言」，是存心和他過不去，會

307 1929 年 9 月 23 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四冊，頁 2251。

308 肅親王善耆與川島浪速的滿蒙獨立運動除了受到關東軍的支持之外，日本黑龍會也參與其中，佃信夫與川島浪速皆屬之，鄒念慈譯〈張勳與佃信夫〉，莊建平主編《近代史資料文庫》第二卷，頁 203 至 208。

309 1917 年 11 月 27 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 1695。

面便作罷，鄭孝胥雖已知道日本軍政之間的矛盾，然無傷大雅，但勸溥儀勿再親近羅振玉，陳寶琛以日本領事館代表政府，而司令部及黑龍會不可信任，認為只有領事館才能信任，當時鄭與陳皆與日本領事館較為親近，日記中亦常記載有田領事夫婦宴請溥儀與鄭孝胥、陳寶琛、劉驥業的紀錄。

1927年6月30日，時值北伐，羅振玉又向溥儀建議，稱日本司令部方面收到「革命黨便衣」的情報，為了溥儀的安全計，宜避往旅順，日本司令部亦將隨同護駕，遂命鄭孝胥與日本天津總領事加藤外松會商去旅順避暑事宜，此前6月23日，溥儀即因欲往日本而命鄭孝胥與加藤會商赴日事宜，鄭當時並不贊成，³¹⁰而溥儀在聽說「革命黨便衣」後甚為緊張，遂不顧鄭孝胥的勸阻，堅持親自詢問加藤避往旅順事宜，不料加藤聽說是來自司令部的消息後，稱此事為謠言，雖然他仍會請示日本政府，但請溥儀勿相信謠言，幾天後夜晚張園外有傳出槍聲，抓到犯人卻是一位名為岩田愛之助的日本人，岩田與佃信夫、川島浪速同樣為黑龍會會員，放槍事後不了了之，此事顯示羅振玉與司令部、黑龍會往來的情况，其極欲將溥儀送往東北。另一方面，此時鄭孝胥雖然受命與日本使館接洽，但其仍是不贊成溥儀離開的，原因是鄭認為「共管」時代即將來臨，認為溥儀只要做好準備，靜候共管即可。

第四節 鄭孝胥及滿洲國

1928年9月，鄭孝胥親赴日本，³¹¹會見日本各界人士，此事鄭孝胥對日本軍政兩界的想法發生變化，與日後成立滿洲國有重要關係。鄭孝胥在日本見過，並在日記中提到的人物甚多，主要是軍政文等方面，軍界人士諸如：鈴木貫太郎、南次郎、米內光政、津田靜枝，³¹²政界人士如後藤新平、近衛文麿、岡部長景、有田八郎，文化界如水野梅曉、內藤湖南、長尾

310 鄭孝胥奏稱「今乘輿狩於天津，皇帝與天下猶未離也，中原士大夫與列國人士猶得常接，氣脈未寒，若去津一步，則形勢大變，是去國亡命，自絕於天下，若寄居日本，則必為日本所留，興復之望絕矣」，1927年6月23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四冊，頁2149。

311 當時上海《小日報》社論有一篇《告鄭蘇戡》評論此事，「可惜他的腦筋裡還是充滿了聖喻廣訓的腐氣，不能不說他是思想時代的落伍者，倘然鄭先生在日本酒酣耳熱，逸興遄飛，發揮他腐化的論調，給日本報紙發表出來，不是要大坍其臺麼？所以忠告鄭先生，謹守著『不談國事，且食蛤蜊』之誠罷」。「告鄭蘇戡」，1928年9月21日，《小日報》，第二版。

312 1928年鈴木貫太郎、南次郎為海軍大將，米內光政為海軍少將，津田靜枝為第1遣外艦隊司令部附南京駐在，近衛文麿為貴族院議員，有田八郎為奧地利公使，岡部長景為對支文化事務局參事官。

兩山、狩野直喜，黑龍會岩田愛之助、佃信夫等，鄭孝胥在日本被視作溥儀的代表，在鈴木貫太郎、南次郎的會面中，兩人皆對鄭孝胥的復辟活動表示關心，「鈴木詢上近狀，云有恢復之志否？南次長云，如有所求，可以見語，對曰正研究將來開放全國之策，時機苟至，必將來求」，³¹³所謂開放全國之策即鄭孝胥所提出的「共管」論，鄭孝胥與日本軍政界人士交換意見，使他相信日本會成為將來「共管」時代的合作對象，並且等時機成熟之後日本將積極協助溥儀復辟，此次赴日使鄭對於日本的印象大為提升，³¹⁴並且也能說明了日後九一八事變時，鄭孝胥選擇和日本合作的原因。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溥儀希望盡快離開天津往東北，鄭孝胥從報紙得知事變發生，在9月21日日記中一面痛批蔣介石「不知立國之則」，一面又請溥儀冷靜等待日本方面派人過來，「若得軍人、商人百餘人出任倡議，脫離張氏，以三省、內蒙為獨立國，而向日本上請願書，此即時應為之事也」，³¹⁵於是溥儀派陳寶琛侄劉驥業晤見滿鐵總裁內田康哉與關東軍司令本庄繁打聽消息，派佟濟煦往東北打聽其他遺老的狀況，羅振玉則在1925年溥儀會見佃信夫之後，逐漸失去溥儀信任，而移居遼東，但羅仍然為了復辟事業持續奔走，羅振玉居遼期間，陸續結識了黑龍會人士、奉系將領湯玉麟、熙洽、關東軍司令武藤信義等各方勢力，³¹⁶熙洽字格民，為清朝閒散宗室，³¹⁷熙洽在民國四年入奉系，民國十九年擔任東北邊防副司令長官兼吉林省政府主席張作相的參謀，九一八事變前會張作相回鄉奔喪，遂由熙洽代理吉林省主席，事變發生後，羅振玉即遣人與熙洽晤見，熙洽又與關東軍師團長多門二郎簽訂條約，³¹⁸熙隨即在1931年9月21日開城迎接日軍，30日在日本關東軍扶植下成立吉林臨時省政府，³¹⁹同一日關東軍參謀板垣征四郎派遣浪人上角利一與羅振玉攜帶熙洽的信來見溥儀，請溥儀立即前往東北，熙洽即以其職權宣布吉林省先行復辟，當時國民政府的政策為「攘外

313 1928年10月13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四冊，頁2203。

314 山室信一著；林琪禎等譯《滿洲國の實相與幻象》（新北市：八旗文化出版：遠足文化發行，2016年5月），頁134至135。

315 「蔣介石返南京，對日本抗議，張學良令鳳軍勿抵抗，黨人鼠膽，又不知立國之則，對此敵國何謂抗議，應給護照與日本外交官，限三日出境，日本商民限一星期出境，然後斂兵待敵，猶可立國」，1931年9月21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四冊，頁2342。

316 羅繼祖，《蜉寄留痕》，頁116至119。

317 熙洽為太祖努爾哈赤弟誠毅勇壯貝勒莫爾哈齊的後裔。

318 多門二郎為熙洽早年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老師。

319 胡平生，《民國初年的復辟派》，頁478。

必先安內」，對日本傾向隱忍，日本於是迅速占領東三省，在此情形下使溥儀認為是與日本合作的最好時機，但是由於溥儀對羅振玉無法完全信任，並未立即答應羅與上角，而是回去先與身邊近臣商量，近臣如陳寶琛、朱益藩、陳曾壽、胡嗣瑗等皆反對溥儀離開天津，而主張靜觀事變，勿貿然離開天津，陳寶琛對溥儀說「時局渾沌不分，貿然從事，只怕去時容易回時難」，³²⁰陳曾壽上奏溥儀：

抑以今日局勢未定，固當沉機以觀變，即將來東省果有擁戴之誠，日本果有敦請皇上復位之舉，亦當先查其來言者為何如人，若僅出於一部分軍人之意，而非由其政府完全諒解，則歧異可慮，變象難測。³²¹

溥儀於是並未答應羅振玉及上角，當9月29日時，羅振玉、周善培來求溥儀的手諭，以便宜行事，鄭孝胥勸溥儀「願以定靜處之，躁進者見用，必損盛名」，³²²鄭孝胥指的是羅振玉，鄭勸溥儀冷靜等待主要還是與羅之間的矛盾之故，其實鄭孝胥此時的想法已經由原來親近領事館轉而欲依靠軍部勢力，一方面領事館對於溥儀復辟一事向來較為謹慎，相對之下軍部顯得更為積極，故鄭認為軍部是更能倚仗的勢力³²³，另一方面在九一八事變之後，鄭孝胥認為此前他訪問日本所提到的「開放之期」已經到了，此時應盡快往東北，為此鄭孝胥與胡嗣瑗還發生爭執，從他們之間的對話內容，就可看出陳寶琛、胡嗣瑗與鄭孝胥之間的差異：

(鄭):事蹟愈說愈像，恐公需準備隨行，余(胡)謂:彼方來意云何?在此尚有置喙餘地，若草率東去，落人掌握，豈復能容我忖量去就耶?孝胥云:此局恐非行不可，在此在彼直無區別，如再顧慮，只好不去。余云:論者皆主不去，固未免專看一面，縱使可去，豈事前一無商榷?我輩唯知盲從瞎跑，萬一發生意外，誰任其責?孝胥怒云:今日但問去不去，更無他事可以預商，公有所欲言，公自言之我已許相隨東行，如遇危難辦，一拼耳，斷不能退縮示怯!³²⁴

從鄭孝胥的回答可見其認為機不可失，並已堅決決定依靠日本軍部，隨溥儀往東北以達

320 愛新覺羅溥儀著，高陽序《末代皇帝自傳》上冊新修版，頁310。

321 陳曾壽，陳曾植《局外局中人記》，收錄於《文史資料選輯》第19輯，頁196。

322 1931年9月29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四冊，頁2343。

323 鄒金喜，《從「此邦俗亦偷」到「今日日光輝萬國」：鄭孝胥日本觀的轉變歷程》，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1月，頁72。

324 1931年10月2日日記，收入胡嗣瑗著，裘陳江整理《胡嗣瑗日記》，收錄於中國近現代稀見史料叢刊，第四輯(南京市:鳳凰出版社，2017年6月)，頁99。

成復辟，就在溥儀接見羅振玉及上角利一之後，日本天津領事館連續幾日派人來再三力勸溥儀需慎重，勿前往東北，溥儀為了確認情況，派鄭垂晤見日本天津總領事桑島主計，桑島不僅反對溥儀離開天津，並且外務大臣內田康哉也反對，此可見當時軍部以及領事館以及羅振玉等各方奔走的複雜情形，不過雖然其他遺老以及日本領事館表示反對，鄭孝胥不以為意，仍繼續與關東軍上角利一聯繫。與此同時日本也正逐漸侵略東北，除了已經與日本合作的吉林省主席熙洽之外，9月22日逮捕遼寧省主席臧式毅，以土肥原賢二為奉天市長，溥儀也應關東軍參謀森糾的請求，命鄭孝胥擬旨勸降代理黑龍江省主席馬占山，臧式毅、張海鵬、熙洽、馬占山以及組織東三省特別區治安維持委員會的張景惠等皆原奉系將領，日本拉攏控制原奉系軍政人士在短時間內掌控東三省。

11月2日土肥原賢二拜訪溥儀，兩人初次談論關於未來滿洲國國體問題，土肥原承諾將成立帝國，並要求溥儀在11月16日前往東北，之後溥儀又與眾臣召開會議，詢問關於前往東北的意見，會中鄭孝胥與陳寶琛發生激烈爭執，鄭孝胥對陳寶琛說「勿失日本之熱心，速應國人之歡心」，³²⁵陳寶琛以及胡嗣瑗等人的意見皆認為以日本領事館的意見為準，並不信任關東軍，認為羅振玉過於躁進，此時自然要與鄭孝胥發生衝突，惟溥儀主義已定，在11日乘船離開天津，19日抵達營口湯崗子對翠閣旅館，並見到了羅振玉、佟濟煦、商衍瀛等人。溥儀及鄭孝胥一行抵達對翠閣之後日方隨即以安全為理由封鎖交通，羅振玉則前往瀋陽與板垣會商「新國家」的問題，之所以封鎖交通主要是羅欲封鎖鄭孝胥的行動，以免鄭又和關東軍聯繫而破壞由羅主導談判的局面，惟羅與關東軍之間的目標並不完全相同，羅談判當然以復辟清朝為目標，然而對於關東軍而言，啟用溥儀已經引起日本內部以及東北地方的諸多反對。當時日本的內閣總理幣原喜重郎在外交政策上強調「協調主義」、「和平政策」，³²⁶對於九一八事變採取不擴大方針，又東北地方領袖原多為奉系人士，相對於溥儀，更希望推舉張學良，故推舉溥儀不僅在中國會引起反對，即對世界各國亦將引起疑慮，極不利於日本在滿蒙的行動，³²⁷而羅振玉堅持復辟清朝，或至少也該是「滿洲帝國」皇帝，是羅堅持儒家正

325 1931年11月6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四冊，頁2350。

326 日本歷史學研究會編著，金鋒、冷明、孔知行、王炳達、馬君雷等譯《太平洋戰爭史》第一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頁91。

327 山室信一著，林琪禎等譯，《滿洲國の實相與幻象》，頁141至144。

名定分理念的體現，³²⁸關東軍漸漸不滿於羅振玉，而以鄭孝胥為談判對象。1932年1月29日，鄭孝胥、羅振玉、板垣征四郎舉行會談，板垣對鄭羅二人介紹滿洲國體制，「眾意欲聯合三省為滿蒙自由國，推舉宣統帝為大總統，軍民分治，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³²⁹鄭與羅二人皆不滿意「總統」稱號，羅振玉尤為堅持，鄭孝胥起先雖然也是反對，但在與關東軍接觸幾次之後，逐漸不再堅持，溥儀亦極不滿總統稱號，親自寫了「正統系」十二條，內容為敘明建立新國必須為恢復大清國國號，以正統系的十二條理由，³³⁰交給鄭孝胥與板垣談判，2月22日鄭孝胥、羅振玉出席由板垣與東北行政委員會的會議，討論國體已及官制問題，惟鄭孝胥並未將「正統系十二條」在會議中提出給板垣，更向板垣保證會說服溥儀接受執政，「皇上的事，由我包辦，無所不可」，鄭垂也向板垣保證「皇上是一張白紙，由你們愛怎麼樣均可」，³³¹隔日鄭孝胥勸溥儀接受，出任「執政」，此時不惟溥儀，就連羅振玉以及陳寶琛、胡嗣瑗以及其他遺老皆對鄭孝胥的談判結果表示不滿，陳寶琛向溥儀「痛陳其不可，請上堅持」，³³²胡嗣瑗批評板垣的方案是「非驢非馬之局」，更痛批鄭孝胥欺瞞挾制，鄭孝胥此時的考量在擔憂萬一此事無法談成，則恐怕板垣征四郎、本庄繁將引咎辭職，則擁戴溥儀事亦將破局，而復辟非日本協助不可，此時雖然無法以清朝皇帝的身分復辟，但將來未嘗沒有機會，在整個談判過程中鄭孝胥比羅振玉更能退讓，更「靈活」，但也引起溥儀以及其身邊遺老的不滿，2月25日板垣正式公布「新國組織大綱」，國名滿洲國，定都長春，由溥儀出任執政，鄭孝胥則在3月5日就任國務總理。

鄭孝胥任國務總理兼文教部長，「文教部總長掌管關於教育、宗教、禮俗及國民思想事務」，³³³文教部下置總務、學務、禮教三司，具體而言文教部所辦事務約有數項，例如建立文廟崇祀孔子、派遣留日學生、表彰孝子節婦、籌辦建國紀念運動會、保存古蹟等，³³⁴設立

328 胡平生，《民國初年的復辟派》，頁489。

329 1932年1月28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四冊，頁2362。

330 愛新覺羅溥儀著，高陽序，《末代皇帝自傳》上冊新修版，頁346至348。

331 陳曾壽、陳曾植，《局外局中人記》，1932年2月22日，頁211。

332 陳曾壽、陳曾植，《局外局中人記》，1932年2月4日，頁196。

333 舉國社編，《大滿洲國名鑑》，康德元年版，頁46。

334 滿洲國文教部編，《文教月刊》第三號，大同二年八月，頁26至28。

燕樂傳習所、語學傳習所、教員講習所等機構。³³⁵鄭孝胥任內力倡「王道主義」學說，鄭孝胥親自編寫《王道要義》一書大力宣講，1935年鄭孝胥成立王道學會，任名譽會長，³³⁶1937年成立王道書院，並親自到場演講。王道主義之下再分成兩個子題「齊家說」、「弭兵說」，按鄭孝胥對王道主義的講解，所謂王道包含儒家的「內聖外王」、「克己復禮」等理念，指克制自己私慾，如懶惰、荒淫、怪癖等習慣，³³⁷鄭孝胥認為這些修持的功夫若強制別人去做則不易成功，但若由每個人自己做起，則未嘗無成功的機會，鄭孝胥在滿洲國提倡儒學，在其發布的國務院令第二號中即規定滿洲國各學校課程都要用四書五經為教材，廢止國民黨時期教科書，力求清除「三民主義」思想，以示尊崇禮教。³³⁸祀孔與燕樂傳習所也是提倡儒學的表現，並且也符合「王道主義」治國的內涵，祀孔有春秋兩季，燕樂是祀孔典禮所使用的音樂，其下設有笙、管、笛、簫、板、鼓等科目，³³⁹以類似音樂班的形制編成，樂生除了負責祀孔典禮的禮樂之外也會出席國家大典，對於鄭孝胥而言，祀孔及燕樂傳承自周禮，期望其能發揮移風易俗，並恢復中國傳統社會秩序。³⁴⁰另外鄭反對愛國思想及軍國民教育，認為此二說為造成戰禍的元兇，鄭孝胥另外有一篇著作《撥亂反正議》，內容主要講述三種阻礙「王道」的現象，從這些學說中可以發現一些特點，除了他們大多來自於儒家學說之外，即鄭對於民族主義的厭惡，鄭孝胥排斥民族主義，是為了維護「民族協和」以鞏固滿洲國，民族主義在其中實有破壞的作用，而鄭孝胥反對愛國思想以及軍國教育之其中一個原因，為其兩者都有仇外或排外的特性，但是從鄭孝胥過去在上海時其時就表現出其厭惡民族主義的傾向，有一件事可以說明，1913年湯壽潛有意在杭州議會建立明末朱舜水雕像，以示排滿，致信鄭孝胥求其作詩，鄭孝胥非常不以為然，回信稱「舜水有知，必不引亂臣賊子為同志」，

335 吉林省圖書館偽滿洲國史料編委會編，《偽滿洲國史料》第十七冊(北京市: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2002年)，頁66。

336 「王道學會發行式」，1935年3月6日，《盛京時報》，第十一版。

337 鄭孝胥，《王道演講集》，民國二十三年石印本影印，頁21至25。

338 《滿洲國政府公報日譯》第一號，頁33，日本國立公文書館。

339 韓玉潔〈滿洲國樂社和祀孔〉，收錄於《長春文史資料》，政協吉林省長春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長春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吉林省長春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2年，第27輯，頁44至45。

340 鄭孝胥在燕樂傳習所畢業典禮的致詞曾說：「民國二十年以來貪鄙險詐中於人心，無所謂中和之氣也，各習為粗獷而已」，滿洲國文教部編，《文教月刊》第三號，大同二年八月，頁73。

³⁴¹並作〈湯塾先求作明遺老朱舜水詩〉，其詩曰：

後樂園中好樹石，海波吞天滯魂魄。九原想與夷齊遊，徒倚祠門長太息。當年東鄰重忠義，藩侯倒屣迎賓客。駒籠私第址堪尋，龍麓高墳碑未泐。我遊江戶嘗憑弔，竊敬此翁世莫識。忽聞學社噪杭州，歸骨建祠爭甚力。斯人辟世雖不返，故國舊君心匪易。紛紛正欲廢大倫，謬託同心定何益。策名委質義難背，白許英靈照肝腦。善學柳下有不可，妄附紫陽渠所斥。願持此意入社來，儻訝異端從見闢。³⁴²

此詩前半部是鄭孝胥回憶早年赴日本的經歷，斯人至匪易二句指朱舜水晚年雖然終老於日本，但其始終忠於故國明朝，紛紛至何益則是斥責革命黨的行為是「廢大倫」，又批評湯壽潛建立朱舜水雕像是「謬託同心」，鄭孝胥的反應可謂嚴厲，湯壽潛希望凸顯朱舜水的排滿，鄭孝胥則關注朱舜水忠於明朝，可見兩者雖然都尊敬朱舜水，然兩人關注的事情不同，也就導致了如此結果。在 1911 年前後在鄭的日記中也能找到其批評當時社會排滿的紀錄，可以說鄭過去在思想方面就有重視儒家倫常並厭惡排滿民族主義的特點，故鄭孝胥提倡王道，實在是與過去的經歷有關。鄭孝胥任國務總理期間，多次有外國記者或學者來訪，鄭孝胥都會向他們解說王道，並分送他們《王道要義》，雖然鄭孝胥努力提倡王道，王道主義本身卻始終與日本的現實作為有差距，例如王道主義中的「弭兵說」以及博愛，被認為有反對關東軍的意圖，³⁴³1935 年鄭孝胥辭去國務總理之後，王道學說開始受到質疑，例如有日本學者質疑王道主義中的「湯武革命」與日本天皇「萬世一系」不合，³⁴⁴也迫使鄭孝胥做出調整，使王道學說能同時兼顧中國日本兩者在儒學方面的歧異。³⁴⁵除了文教部長，鄭孝胥在 1932 年 7 月 25 日任協和會會長，協和會的構想源於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石原與滿洲青年聯盟成員山口重次、小澤開作、阮振鐸、于靜遠規劃組織協和黨，³⁴⁶石原認為滿洲國不該由關東軍司令官永遠主導，但同時他也不認為應該將權力交給溥儀，而是根據一黨專制原則成立一個組織，

341 1913 年 9 月 24 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 1484。

342 鄭孝胥著，黃坤、楊曉波校點《海藏樓詩集》（增訂本），頁 253 至 254。

343 山室信一著，林琪禎等譯《滿洲國の實相與幻象》，頁 208。

344 1935 年 6 月 26 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五冊，頁 2589。

345 鄭金喜，《從「此邦俗亦倫」到「今日日光輝萬國」：鄭孝胥日本觀的轉變歷程》，頁 97。

346 林志宏，〈地方分權與自治——滿洲國的建立及日本支配〉，收錄於黃自進、潘光哲主編，《近代中日關係史新論》（新北：稻鄉出版社，2017 年），頁 660。

³⁴⁷並在將來代替關東軍成為滿洲國最高決策機關，故此構想受到關東軍內部以及總務廳長駒井德三反對，甚至連溥儀以及遺老們也表示反對，惟他們反對的理由與關東軍不同，在協和會成立之前溥儀數次與鄭孝胥討論，並曾拒絕擔任協和會總裁一職，因為溥儀不認為有設立協和會的必要，甚至將之視同朝鮮的東學黨而加以排斥，³⁴⁸鄭孝胥也數次表示反對，鄭孝胥曾與坂垣討論協和會事，表示「孔教不黨，王道無黨」，³⁴⁹1932年6月18日「使大七告駒井，如協和會為政黨，當先辭職」，³⁵⁰最後決定將協和黨改名為協和會，並在1932年7月25日成立，由溥儀擔任總裁，鄭孝胥擔任會長，本庄繁擔任顧問，駒井德三、坂垣征四郎以及各區政府首長為理事會理事，滿洲青年聯盟成員山口重次、小澤開作等人進入中央事務局，負責協和會的主要事務及運作，協和會在思想方面與文教部相同，舉凡共產主義、三民主義都在其排除之列，另外也要壓制各民族的民族運動，³⁵¹其所提倡的是「民族協和」及「建國精神」，1934年滿洲帝國成立，協和會也隨之改組，由國務院總務廳的日系官僚取代滿洲青年聯盟。

滿洲國雖然自成立時起，就受到日本的控制，但鄭孝胥從未放棄追求滿洲國的獨立，1932年國際聯盟派李頓調查團來華調查九一八事變，根據溥儀自傳回憶，鄭孝胥曾寄望於李頓調查團，希望調查團的報告能使國聯作出國際共管滿洲的決議案，從而將滿洲置於國際共管，以實現鄭孝胥的「共管論」夙願，而李頓調查團的報告結果也的確如鄭孝胥所願，「調查團認為滿意者，即依各方所得一切證據，確信助成滿洲國成立之原動力，雖有若干種，即一為日本軍隊之在場，一為日本文武官吏之活動，兩者聯合，發生之效力最大…… 基此理由，現在政體，不能認為游真正的及自然的獨立運動所產生」，³⁵²調查書提出解決原則，包括承認日本在滿洲的利益、同時考慮中日蘇三國的利益、在符合中國主權範圍內以及東三省地方特性的情況內，建立一擁有高度自治權的滿洲政府、以暫時的國際合作來促進中國之建設，並且對於行政的建議中也提到自治政府得指派一定數額的外籍顧問或官員。鄭孝胥對於這

347 山室信一著；林琪禎等譯《滿洲國の實相與幻象》，頁189至192。

348 李念慈，《滿洲國紀實》（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頁253。

349 1932年4月19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五冊，頁2379。

350 1932年6月18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五冊，頁2390。

351 滿洲帝國協和會編，《滿洲帝國協和會組織沿革史》（東京都：不二出版株式會社，昭和57年），頁55。

352 上海明社出版部編，《國際聯盟調查團報告書》（上海明社出版部，1932年10月），頁142。

份報告書非常期待，因為這份調查報告與鄭孝胥所提出的「共管論」、「用客卿」等理念有許多相符合處，但是這場調查受到日本的嚴格控制，並且調查報告在日本國內發表之後，果不其然的遭到各大報的批評，³⁵³日本外務省評論為「忘卻使命之不正當結論」，軍部的評論「不認為有何等變更之必要」，³⁵⁴最終國聯未能對滿洲國做出任何處置，日本在1933年3月27日退出國聯，鄭孝胥的期望的「國際共管」也無法實現。

鄭孝胥雖然為國務總理，但實際上由總務廳總務長官掌握實權，此即「總務廳中心主義」，按照滿洲國組織法，總務廳總務長官名義上是國務總理的下屬機關，「國務院總務廳秉承國務總理命令，處理關(於)政府部內之機密、人事、主計及需用情報事務」，³⁵⁵總務廳下置秘書、人事、主計、情報、需用、恩賞六處秘書，並出席國務院會議及管理大同學院等職務，政府實際上由總務廳掌握決策權，是關東軍與日系官僚為了加強對滿洲國的控制而做的制度設計。³⁵⁶鄭孝胥在許多場合都曾表示出他對於日本控制滿洲國的不滿，1932年10月5日眾議院議員河野一郎拜訪鄭孝胥，河野批評了滿洲國的制度「日本宣言扶助滿洲，而縱官吏盤據要津，握其利權，此為何義」，鄭回答「今日始聞此正義至公之語，吾固謂日本帝國既已表仗義於前，必不肯爭利於後，始高論加入輿論，則舉世必信之矣」，³⁵⁷10月23日陸軍中將井戶川辰三、內田康哉、荒木貞夫拜訪鄭孝胥，臨行時鄭抱怨道「日滿官吏偏重不均，今國務院滿洲不足三十人，而日本數百十人，無怪人民之不信也」，³⁵⁸1935年3月1日為滿洲國建國三年及帝制一年紀念日，鄭孝胥在報紙投書，認為滿洲國如同小兒，日本應該試著讓其獨立，「現在日本帝國既已宣言力助滿洲國獨立，則是正在放手試立之時，若愛之太過，不敢輕於放手，則此小兒雖有獨立舉步之志氣，而終無試立試走之機會」，³⁵⁹小兒說表明了鄭孝胥對於滿洲國獨立的期望。

就滿洲國的性質而言，關東軍已經表明滿洲國並非清朝復辟，但是鄭孝胥即使擔任國務

353 「日本輿論亦常激憤」，1932年10月4日，《盛京時報》，第一版。

354 「忘卻使命之不正當結論」，1932年10月4日，《盛京時報》，第二版。「日軍部聲明對報告書之態度」，1932年10月4日，《盛京時報》，第二版。

355 舉國社編，《大滿洲國名鑑》，康德元年版，頁42。

356 山室信一著，林琪禎等譯《滿洲國的實相與幻象》，頁205。

357 1932年10月5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五冊，頁2413。

358 1932年10月23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五冊，頁2419。

359 「我國猶懷抱小兒宜放手試走」，1935年3月1日，《盛京時報》第一版。

總理，在許多時候還是能發現他將滿洲國與清朝有意識的結合在一起，1932年10月6日有德國記者採訪鄭孝胥，訪問其對於李頓調查團報告書的看法，鄭孝胥表示滿洲國「執政、總理皆大清國君臣，今疾民國之暴亂，欲整紀綱，恢道德，復故國而已」，10月11日有河南回部李謙來見鄭孝胥，鄭讓對方轉告回部「將來必於帕米爾高原建立大清國西京，此不過十年內事耳」，由此看來鄭孝胥私下的確將滿洲國視為大清國的延續，或將之視為復辟之前的過渡，繼續等待時機，然而實際上鄭孝胥又不得不與關東軍妥協，1934年溥儀由執政改為皇帝，鄭孝胥為了在登極典禮的問題屢次與關東軍交涉，例如溥儀堅持祭天儀式穿龍袍，而非「滿洲國陸海空軍大元帥裝」，關東軍參謀小磯國昭「力言大典宜避復辟之嫌，求祭天勿以太祖、太宗為配，且言由日本政府嚴飭關東軍勿蹈此嫌」，³⁶⁰從這些關於儀式及符號的交涉中可以知道溥儀及鄭孝胥對於傳統價值的堅持，惟在關東軍的壓力下不得不遷就妥協。

在鄭孝胥就任滿洲國國務總理之後，其在國內的評價也隨著中日戰爭局勢的發展而越來越惡劣，包括政府文宣以及各報紙皆目鄭孝胥為漢奸，鄭孝胥的書畫、著作在各地被禁止懸掛張貼，鄭孝胥的學說如王道主義、開放政策等陸續被嘲諷駁斥，例如1933年國民政府通緝鄭孝胥，³⁶¹1934年內政部取消鄭孝胥著作權執照，³⁶²鄭孝胥祖籍所在的福建省反應尤為激烈，閩南旅滬同鄉會及福建各團體開除鄭孝胥省籍、³⁶³沒收其財產、³⁶⁴福州公安局查禁焚毀鄭孝胥書件等。³⁶⁵鄭孝胥在中國聲名狼藉，固然因為1931年918事變日本發動戰爭之故，實際上鄭孝胥在天津時期也有報紙報導其消息，故鄭的遺老立場已經廣為社會所知，惟在當時鄭的名聲尚不大壞，許多報紙也會透過採訪他來報導遜帝溥儀的近況，及1931年以後才急轉直下，其實仔細分析鄭孝胥被報紙社論罵的原因，主要還是批評他與日本合作參與滿洲國，至於其遺老的立場以及情結，輿論多少能容忍，例如1932年申報社論評論道：

「…… 假定復辟而復『不主張權利』的辟，更易商量，即如宣老統在天津的時候，

他人不認宣統，你儘管認宣統，他人不認為皇帝，你儘管認為皇帝，天天去朝見，

360 1934年1月17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五冊，頁2503。

361 「通緝鄭孝胥」，1933年，《中國革命》，第2卷第11期。

362 「內部取消鄭孝胥著作權執照」，1934年6月10日，《申報》，第三版。

363 「閩人開除鄭孝胥省籍」，1932年1月21日，《申報》，第三張第十版。

364 「福州各社團請沒收鄭孝胥財產」，1933年4月28日，《申報》，第七版。

365 「閩人查毀鄭孝胥書件」，1933年10月16日，《申報》，第七版。

天天去三跪九叩首，所謂『關門改年號』，儘管復你個人的辟，亦是一種辦法，或說這種辦法，老奴已經幹慣，還不痛快。」³⁶⁶

這段評論雖然有點揶揄的意思，但多少反應了當時一般社會輿論對於遺老的意象，換言之鄭孝胥雖然主張復辟，但其活動只要在一定範圍之內，或對政局無重大影響，似乎社會尚能容許，惟一旦與日本合作，則其行為亦不再見容於社會。至於鄭孝胥本人對於漢奸罵名究竟如何感想則難以得知，因為在前往東北與日本合作的過程中，在其日記中甚少表示出猶疑的態度，從其與胡嗣瑗之間的爭吵來看，更可見其態度之決絕，然而在1932年簽訂《日滿議定書》的締約儀式中，當時在場的日本書記官米澤菊二紀載了鄭孝胥顏面痙攣、嘴角抽搐，表情沮喪的反應，米澤即推測這是鄭孝胥害怕簽約之後被冠上漢奸賣國賊罵名之故，³⁶⁷這段記述在《鄭孝胥日記》中僅有提及締約儀式，並無關於心情的描述，報紙紀載鄭孝胥發表的談話也沒有提及，³⁶⁸尚待史料進一步發掘。

綜觀鄭孝胥對於復辟一事論述，自從「辛亥國變」之後，鄭孝胥極望袁世凱能以其權勢平定革命黨勢力，並立即召開國會施行君主立憲政體，袁就任大總統後，仍然設想他能「日後反正」，及袁世凱稱帝，鄭孝胥才結束了這種還政情結，丁巳復辟之後，鄭孝胥總結了升允、張勳兩人的復辟舉動，認為主持復辟需要「得人」，並且要得到外國援助才能成功，對於當時的中國，鄭孝胥仍然認為復辟清朝，施行君主立憲才是解決中國動亂的方法，1923年鄭孝胥入宮至1931年往東北參與籌設滿洲國，這段時期鄭孝胥在復辟方面的理念，便是追求「國際共管」，因為他認為一旦出現國際共管中國的情形，各國為了管理中國則極有可能選擇溥儀出面主持政局。及滿洲國成立之後，顯然鄭孝胥是不滿於滿洲國之現狀的，滿洲國雖然自成立時起，就受到日本的控制，但鄭孝胥從未放棄追求滿洲國的獨立，鄭孝胥曾希望藉由1932年國際聯盟派李頓調查團來華調查九一八事變的機會，將滿洲置於國際共管，以實現「共管論」，雖然李頓調查團的報告結果確實符合鄭的期望，最終國聯未能對滿洲國做出任何處置，日本在1933年3月27日退出國聯，鄭孝胥期望的「國際共管」也無法實現，又，

366 「鄭孝胥的政見」，1932年4月29日，《申報》，本埠增刊第一版。

367 山室信一著，林琪禎等譯《滿洲國の實相與幻象》，頁202至203。

368 「月圓人壽中秋佳節，議定書調印已畢矣」，1932年9月16日，《盛京時報》，第一版。

鄭孝胥雖然擔任國務總理，其實權掌握在總務廳總務長官，鄭孝胥在許多場合都曾表示出他對於日本控制滿洲國的不滿，而其他遺老如胡嗣瑗、羅振玉等，儘管不滿鄭孝胥，但是在追求滿洲國獨立一事上是相同的，例如胡嗣瑗曾向溥儀說要掌握「用人之權」，羅振玉贊同溥儀提出的「正統系十二條」，《日滿議定書》簽訂之後，則向溥儀建議以一年為期實行帝制，若逾期仍無法實行帝制即退位，欲以此為條件向坂垣談判，雖然他們提出的建議不盡相同，但也能反映出遺老們對於滿洲國獨立的意向，就滿洲國的性質而言，雖然關東軍已經表明滿洲國並非清朝復辟，許多時候還是能發現鄭將滿洲國與清朝有意識的結合在一起，鄭孝胥私下的確將滿洲國視為大清國的延續，或將之視為復辟之前的過渡，例如在 1932 年有日內瓦記者採訪鄭孝胥關於滿洲國與中國的關係，鄭提到：「中國之亂極矣，中國人民他日可合於滿洲國，滿洲國人民斷不能再合於中國」，³⁶⁹1934 年德國記者採訪鄭孝胥關於中國未來能否統一，鄭答：「滿洲國治，則入關、統一可矣」，³⁷⁰1936 年鄭與日本人的一次訪問中提到：「皇帝以滿洲皇帝兼帝中華，如英王之兼帝印度可也」，³⁷¹從這些談話可以知道鄭孝胥所設想的理想復辟情形，是以追求滿洲國獨立的形式來達成復辟，並且更進一步以滿洲國為基礎，再以某種形式統治中國，惟在毫無實權的情況下，只能退而求其次先求滿洲國獨立自主，然其最終則仍以君主立憲為目標，例如鄭孝胥在《王道月刊》創刊號中有一篇跋文提到「瑞士國小，故宜於共和，滿洲國大，必資於立憲，然王道之成效，必養成地方自治而漸減政府之權，寬平盪易使人忘政，勝殘去殺自然合軌，乃謂之極則耳」，³⁷²這段話簡單的描述了鄭孝胥認為理想的政治制度，最終這些設想在現實中都無實現的機會。

關於鄭孝胥之借債造路說，對其人影響深遠，借債造路說始於前東三省總督徐世昌，徐氏認為東三省財政短絀，若要修築錦瑗鐵路，則必須籌借國債、設立銀行，並且開放通商，以招商引資的策略以暗中牽制日俄兩國在東北的勢力，³⁷³徐氏去職後，繼任東三省總督錫良也力倡借債造路、成立銀行的政策，故借債造路說即以厚集洋債，互均勢力，招攬外國資本，

369 1932 年 8 月 31 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五冊，頁 2404。

370 1934 年 6 月 1 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五冊，頁 2528。

371 1936 年 6 月 30 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五冊，頁 2633。

372 滿洲國文教部編，《王道月刊》創刊號，頁 41。

373 徐世昌，《退耕堂政書》，卷十（臺北縣永和鎮：文海出版社，1968 年），第 551 至 557 頁。

開放市場為要義。鄭孝胥首次接觸到借債造路說在 1910 年受到總督錫良的邀請前往奉天省，協助錦瑗鐵路借款合同簽訂事宜，錦瑗鐵鐵路一方面受到日本、俄國的反對，另一方面因當時清廷財政緊張等原因最終失敗。1910 年 9 月 9 日鄭孝胥替錫良擬定進京會奏的奏稿，鄭氏認為借債是當時中國的「第一救亡政策」，主張大舉定借外債並以向外國包工的方式建造全國各大幹路，如此則各國財團將競相投資，對於當時幣制改革及立憲的推行也有助益。

1911 年 5 月清廷宣布全國幹路收歸國有，此時鄭孝胥主張鐵路國有，並在報紙上投書其文章「四大幹路說帖」，此說帖的主旨是「吸收外資為救亡之要著」、「借債以十萬萬為度，包工限年以成之」，認為中國應大舉借債，如此一來則各國競相投資，暗中牽制列強的侵略滲透。總結以鄭孝胥在 1910 年前往東北協助錦瑗鐵路事宜以及 1911 年兩個時間的借債造路主張，可以發現是相似的，兩者都主張吸引外資，互均勢力牽制列強，所不同者在其簽訂錦瑗鐵路借款合同時，主張借債造路的目的在與日俄兩國抗衡，1911 年時之借債除了有國防方面的考慮，同時也以借債造路為推動改革的一種入手方法。

辛亥革命之後，鄭孝胥隱居上海，雖然已經沒有任何官職，但從其一些言論或記述來看，鄭孝胥並未放棄借債造路理念，例如 1912 年 2 月 18 日，鄭孝胥對友人孟昭常說「今欲中國發達，惟有借債造路，則外人之壓力自然消滅……使吾主全國交通之務，當令國土實力驟漲，政治之改革乃後圖爾」，³⁷⁴1912 年 4 月 7 日鄭孝胥對王揖唐說「余為言多數宜服從少數之義，歸于開通全國，專從造路入手，又必先造張恰之理」，³⁷⁵這兩段記述的主張與鄭孝胥的「四大幹路說帖」的內容幾乎相同，皆主張先進行借債造路，再來進行政治方面的改革。

1925 年鄭孝胥提出「共氏三世」圖識，三共論雖然看似著重強調鄭孝胥個人對中國政治局勢的演變，實際上與借債造路也有關係，此處則不得不提三共論中的共管階段，其原意指中國共產政權推翻民國政府之後，列強則會基於其在中國的利益，出面干涉中國，最終選擇溥儀出面主持政局，從而進入「皇清」階段。按溥儀在自傳中的回憶，鄭孝胥主張要西洋技術、西洋資本，聘用西洋人任官，聘西洋人訓練軍隊，利用列強來開發中國，³⁷⁶則實際上，

374 1912 年 2 月 18 日，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 1400。

375 1912 年 4 月 7 日，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 1411。

376 1927 年 6 月 23 日，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四冊，頁 2149。

可以說借債造路之理念亦包含在這段共管論之內，因為借債造路與共管論中，欲借列強勢力以開發中國的目的相近。1929年8月12日鄭孝胥與流亡奧國男爵阿克第談論未來復辟時的政策，「一、成立責任內閣，閣員參用客卿，二、禁衛軍以客將統帥、教練，三、速辦張家口至伊犁鐵路，用借款包工之策，四、國內所有官辦、商辦企業限五年內一體成立」，³⁷⁷四條政策中的第三條提到借款包工之策，與其過去曾發表的「四大幹路說帖」相比仍是大同小異，所不同者在此四條政策並未強調要造四大幹路而已。

1932年3月13日，當時鄭孝胥為滿洲國國務總理，起草一份告國內文：

土地、人民、政事，合之而成國家。政事廢弛則人民凋敝，人民凋敝則土地荒蕪，此即今日國內之景像也。國家之患莫大於排外。有土地之富而不能自營，寧聽其荒曠不許外人之合作，因此而開兵端，因此以致內亂，猶憤憤曰：『他人欺我！』豈知據萬里之沃壤而閉塞之，此乃天道之所不容，其不能自保決矣。為今之計，唯有開放門戶，招來合作，為立國之本策，使吾國每年可集數千萬之資本，每年可增數百萬之人民，盡棄猜疑，盡除阻梗，則天開地闢之變化，不出數年，必成為富麗莊嚴之世界。³⁷⁸

1932年10月5日鄭孝胥與人談論滿洲國政策，提到「如能將滿洲各種實業吸收舉世之資本，則亞洲可操縱一世之大局，愿於半年內悉數定議，盡立合同，以全國二十年內之利權，付之資本家，則數年之後，此國已成世界之樂土矣」，³⁷⁹若將這兩段文字與此前的借債造路互相比較，則其目的不太相同，「四大幹路說帖」的借債目的偏向在國防以及外交均勢、改革方面，共管論中的借債則比較著重在利用吸收外資以開發中國，及其任國務總理，此時的借債造路則以建設滿洲國為目的，而其共同之處則在都主張引進外國資本，總結以上各處，則可以發現鄭孝胥的借債造路理念在各時期基於不同的目的而提出，又都有相同之處，體現出其中的延續性。

鄭孝胥在擔任總理的三年之間與溥儀的關係似乎時好時壞，據溥儀的自傳，自從1932年

377 1929年8月12日，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四冊，頁2245。

378 1932年3月13日，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五冊，頁2371。

379 1932年10月5日，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五冊，頁2413至2414。

9月15日鄭孝胥簽訂《日滿議定書》之後，溥儀對於鄭孝胥私下簽訂條約大為不滿，遂與胡嗣瑗商議改組國務院，撤換鄭孝胥，改由臧式毅任總理，並暗示鄭孝胥，要他退休養老，由此來看，溥儀與胡嗣瑗對於鄭孝胥父子已無好感，但是在《鄭孝胥日記》中，兩人的關係似乎並不壞，1932年10月30日溥儀召見鄭孝胥與近侍工藤忠、祁繼忠一起吃飯拍照，紀念從天津潛往東北的過程，以示不忘再莒，並特別與鄭孝胥單獨拍照，1932年11月21日鄭孝胥再向溥儀辭職，溥儀則表示慰留，「今無代者，當勉力至收京乃議之耳」，³⁸⁰從此兩件事看，又能見溥儀與鄭孝胥之間，猶有革命情感，並且溥儀挽留鄭孝胥，絲毫不像在自傳中之決絕，故兩人的真實關係難以得知，1935年5月21日鄭孝胥辭國務總理，寫成〈四月十九日辭國務總理得允〉詩作，導致鄭孝胥與胡嗣瑗之間互相嘲弄，其詩曰：

行年七十六，自詡好身手。雖曰非健兒，亦未齒羸叟。今朝得解官，快若碎玉斗。

屈伸數張臂，噓嘯頻撮口。千秋酸寒徒，豈易覓吾耦。營營鼠窟中，莫復論誰某。

造物定何意，留此老不朽。知我者天乎，問訊堂下柳。³⁸¹

此詩最值得注意的是今朝至玉斗兩句，玉斗出典為鴻門宴中，范增「豎子不足與謀」的典故，此處則似乎有暗諷溥儀如豎子之意，胡嗣瑗讀過此詩大為不滿，遂又作一詩給鄭：

奇計生平總自欺，怒撞玉斗是何辭。尸居久負阿衡任，距脫應傳聖德詩。鱗甲森然

希再起，肺肝如見被群疑。分明十二年來事，天地包容竟未知。³⁸²

胡詩質問鄭孝胥「怒撞玉斗是何辭」，對於一向忠於溥儀的胡嗣瑗而言，鄭孝胥此詩自然難以容忍，第一、三句是諷刺的意思。鄭孝胥讀後又作〈題胡琴初詩後〉詩作為為應，其詩曰：「尸位三年我自評，乞歸眾怒尚難平。老夫罵世殊無謂，何怪時流出惡聲。負重堪嗟忍辱時，勤攻吾過欲誰期。杜門毀譽今奚較，奮筆詩人莫太遲」，³⁸³此詩老夫至惡聲兩句表現出不在乎批評的態度，杜門至太遲二句則似乎是對胡嗣瑗所說，鄭孝胥在日記中提到「胡之謀推翻久矣」，³⁸⁴也應證了溥儀所說，胡嗣瑗欲撤換鄭孝胥國務總理一事，顯示鄭胡二人在

380 1932年11月21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五冊，頁2426。

381 鄭孝胥著，黃坤、楊曉波校點，《海藏樓詩集》（增訂本），頁429。

382 胡嗣瑗著，裘陳江整理，《胡嗣瑗日記》，收錄於中國近現代稀見史料叢刊，第四輯（南京市：鳳凰出版社，2017年6月），頁150至151。

383 1935年7月8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五冊，頁2590。

384 1935年7月7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五冊，頁2590。

滿洲國成立之後便關係冷淡。滿洲國滅亡之後胡嗣瑗隱居北京演樂胡同，1949年2月3日共軍進入北京城，18日胡嗣瑗因貧病而終。³⁸⁵鄭孝胥在擔任總理的三年之間，從一些詩文中也能看到他私底下希望能回到故鄉上海的心情，如「庭除得柳廿三株，兩架殘書便有餘，回憶海藏五千卷，何時還我舊樓居」。³⁸⁶

1938年3月28日鄭孝胥在長春病逝，獲得國葬待遇，由溥儀賜封大勳位，墓地地址在奉天東陵東方，奉天市郊外七間房，³⁸⁷即現址瀋陽市七間房村，在1938年5月21日由鄭禹、土肥原賢二、奉天省長葆康，7月3日出殯安葬，³⁸⁸在鄭孝胥病逝之後，好友太田外世雄已經在其日本私宅以及奉天願學社為其建立神社供奉，又在7月6日創建太夷宮，正式名稱為「鎮護建國太夷宮」，為供奉鄭孝胥的神社，祭神為少彥名命以及鄭孝胥，相殿神為大國主命以及猿田彥命，之所以不用神社命名是為了使滿人及漢人感到親近的緣故，太田又創辦「太夷講」組織，專門負責太夷宮的祭祀活動，³⁸⁹太夷宮在1941年舉行鎮座祭，每年有固定的供奉儀式「太夷祭」，一直持續到日本戰敗。鄭孝胥逝世之後，世間對其評價不一，曾與鄭來往的日本文武各官如近衛文麿、樞密院議長平沼騏一郎、陸軍大將本庄繁、菱刈隆、小磯國昭、坂垣征四郎等人多有拍發弔電，表達對鄭孝胥建設滿洲國的功績或表達對其人格的尊敬，並表達哀弔之意，例如坂垣：「驟接前國務總理大臣鄭孝胥閣下薨逝，追懷其為滿洲建國以來絕大功績，不勝哀悼之至」，近衛：「前國務總理大臣鄭孝胥閣下至誠至醇之人格，及千古不朽之功績，誠余所最敬慕不已者，乃今忽接薨逝之報，追惜何堪」。³⁹⁰

國民政府方面，由於鄭孝胥參與滿洲國，對他自然沒有好評，國民黨機關報《中央日報》在1933年之後便將鄭孝胥貶稱為「鄭逆」，同年由南京市黨部執委會呈請中央對鄭孝胥發布通緝，並處以沒收財產，毀滅出版物處分，並向各省通電響應，及鄭孝胥逝世，仍貶稱「大漢奸」，有詩云「死尚有餘辜，神州顛破之，那知九仇辨，姑逞一偏辭」，這首詩刊載

385 1949年2月18日日記，收入許寶衡著，許恪儒整理，《許寶衡日記》第四冊(北京市：中華書局，2010年)，頁1569。

386 1932年7月3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五冊，頁2393。

387 〈故鄭前總理墓地決定東陵東方〉，《盛京時報》，康德五年五月廿二日，第二版。

388 〈故鄭前總理墓地選定後決定七月三日舉行出殯安葬〉，《盛京時報》，康德五年五月廿四日，第二版。

389 嵯峨井建，《滿洲の神社興亡史》(東京都：芙蓉書房出版，1998年8月)，頁212至217。

390 葉參，陳邦直，黨庠周合編，《鄭孝胥傳》，(長春：滿日文化協會出版，康德5年9月)，頁158至160。

於《中央日報》，³⁹¹可見國府對於鄭孝胥主要是批判態度，基本上確定了漢奸評價。一般輿論在鄭孝胥逝世之後，雖然大多仍批評其為漢奸，卻有程度之分別，例如有《快活林》雜誌社論希望「逆產清查」，主張當局應在接收日產時調查鄭家在東北、天津、上海各處房產，加以沒收，「俾使賣國求榮者，知所炯戒」，³⁹²《新華日報》點名了汪精衛、陳公博、鄭孝胥、王克敏等人為漢奸，主張效仿歐洲審判納粹德國、維琪法國戰犯的辦法，嚴懲漢奸，絕不能以「曲線救國」、「維持地方秩序」、「將功贖罪」等理由而輕判³⁹³，此論刊載的時候鄭已逝世多年，仍可一窺其對於鄭的態度，再如《海光》雜誌，「聞鄭屈居於倭寇卵翼之下，動輒掣肘，時遭呵叱，故亦鬱鬱悲憤，但一失足成千古恨，雖欲回頭亦已無及，而倭寇監視殊嚴，既已自投羅網，亦難插翅而飛矣，鄭賊於垂斃前作詩頗多，語殊淒哀，意存懺悔」，³⁹⁴粗略比較這些評價，都有譴責鄭孝胥為漢奸之意，但前兩者主張抄家或嚴懲，後者則更溫和和一些，帶有警世涵意，此外也有稱讚鄭孝胥的才能，並借機反思四川保路運動者，³⁹⁵可見在當時對鄭孝胥的蓋棺論定，已能有許多不同的見解。

舊時朋輩或曾經有往來的文士大多作挽詩輓聯以資弔念，從中可以看出他們對於鄭的評價。其為懷念或稱讚的，如遜清內務府大臣寶熙輓聯，稱讚鄭孝胥的忠義：「艱危扈聖，謨議開邦，三載退休，詩墨從容消日月，雄節邁倫，高氣蓋世，一朝仙去，英靈上引作星辰」，張元濟輓聯則懷念夏瑞芳遭暗殺時，鄭孝胥護送其至車站的一段往事，感念兩人昔日往來的交情：「患難惜相依，把臂前行，難忘震撼同舟日，歸休終未得，撫膺欲絕，想見淋漓擲筆時」，³⁹⁶鄭孝胥的詩友李宣龔作〈挽太夷年丈〉：「……名隨天地隘，志與日月速，蹉跎謀效忠，一往不受桎，於心故無負，世議乃爾酷……空令並世人，傷心重九鄭」³⁹⁷，認為鄭孝胥籌畫復辟及參與滿洲國是為了效忠清室，對其行為表達理解，並感嘆社會的評價過於嚴酷，邵鏡人評鄭孝胥的詩作，其中有一段評價：「……及清遜帝受日人勢誘，僭號東北，太夷為首

391 〈鄭孝胥死〉，《中央日報》，1938年5月11日，第四版。

392 「鄭孝胥逆產清查」，1946年，《快活林》，第十二期第七版。

393 「嚴懲漢奸賣國賊」，1945年8月18日，《新華日報》，第二版。

394 「鄭孝胥之哀音」，1945年，《海光》，第十二期第5頁。

395 「評鄭太夷」，1938年4月10日，《晨報》，第二版。

396 葉參，陳邦直，黨庠周合編，《鄭孝胥傳》，頁178。

397 鄭孝胥著，黃坤、楊曉波校點，《海藏樓詩集》（增訂本），頁567。

任總理大臣，世人指為漢奸，然而丈夫立身，各有本末，較諸朝秦暮楚，二三其德者，不可同日而語也」，³⁹⁸肯定鄭孝胥忠於清室，而不純以漢奸論。然而亦有責備鄭孝胥晚節不保者，如陳衍：「鄭蘇戡詩專作高腔，然有頓挫故佳，而亦少變化，更喜作宗社黨語，極可厭，近來行為益復喪心病狂，余與絕交久矣」，³⁹⁹汪國垣在《光宣詩壇點將錄》中將鄭孝胥比為「天罡星玉麒麟盧俊義」，蓋化用水滸傳「盧俊義反」的典故，暗喻鄭孝胥晚年如同盧俊義落草梁山，「落草」滿洲國，批評他「蓋以自托殷頑，而不知受庇倭人，於清室為不忠，於民族為不孝」，汪國垣有陸續關注鄭孝胥的詩作，雖仍然稱讚其詩，但認為鄭孝胥晚節不終，將其比作南明的馬士英、阮大鍼以示不齒。⁴⁰⁰大體而言，對鄭孝胥的評價集中在其詩文、復辟、參與滿洲國等幾個方面，其實與當時一般輿論比較起來，這些文人的評價可以說還算是保留了些許情面，⁴⁰¹如今隨著時代過去，鄭孝胥的歷史定位及評價逐漸的能以更多元的方法來思考看待。

戰後（1947年7月1日），史學家金毓黻在日記中提到鄭孝胥，金毓黻與郭任生一同前往憑弔鄭孝胥墓，⁴⁰²郭任生稱鄭孝胥墓所在土地為郭家所有，原本已經請好堪輿師決定郭松齡墓穴，不料當鄭孝胥安葬時，正值中日兩國交戰，郭家無暇處理此事，而鄭孝胥墓正好就位在其中，兩人憑弔一番後，討論到埋葬安排：「……余笑問將置海藏遺骨於何所？任生曰：『告其子孫，欲遷則遷之，否則在冢別覓一地遷葬之，絕不使此名震一世之詩人，無尺寸地可妥魂魄也』，余撫掌稱善」，可見兩人都希望鄭墓與郭墓能圓滿解決，金毓黻又作「弔海藏」詩，「海藏磊落人，其氣猛如虎，行年七十餘，餘勇猶可賈，奈何一勇漢，甘認賊作父，持此稽生平，頗與所論忤，即謂忠舊君，用心亦良苦，忠君不恤民，於事究無補……寧知骨未寒，時勢成今古。易地妥羈魂，猶勝身為虜。勿與郭將軍，爭此一壞土」，⁴⁰³詩的前段除

398 鄭孝胥著，黃坤、楊曉波校點，《海藏樓詩集》（增訂本），頁592。

399 陳衍作此評論時當在一二八事變前後，見錢鍾書《錢鍾書集：寫在人生邊上、人生邊上的邊上、石語》，頁480。

400 鄭孝胥著，黃坤、楊曉波校點，《海藏樓詩集》（增訂本），頁603至607。

401 曹聚仁曾在其文章〈殺錯了人〉中寫到：「我常和朋友說『不流血的革命是沒有的，但流血不可流錯了人，早殺溥儀，多殺鄭孝胥之流，方是邦國之大幸』」，魯迅著《偽自由書，一名，不三不四集》（上海：魯迅全集出版社，1947年），頁104。

402 奉系將領郭松齡弟，郭松齡因起兵反奉，遭張作霖槍斃，並曝屍三日，郭家直到戰後才能安排埋葬事宜。

403 1947年7月1日日記，收入金毓黻，《靜晤室日記》（瀋陽市：遼瀋書社，1993），頁6309。

了吟詠鄭孝胥的才名之外，仍是譴責其認賊作父，最後則有請其理解郭家遷墓的意思，然而郭家最終未能聯絡鄭家後代，此事未果，直到 1952 年郭家後代在地方政府協助下，選在距離鄭孝胥墓一百公尺處安葬郭松齡夫婦。文革期間，鄭孝胥墓遭七間房村民破壞，墓穴移作他用，⁴⁰⁴遺骨無存，只有「大勳位鄭公孝胥，誥封一品夫人吳夫人」墓碑保存下來，如今展示在九一八歷史博物館。

1932 年 2 月 16 日鄭孝胥長子鄭垂病逝，此事起於 1932 年 2 月 9 日，在日記紀載「大七喉痛」，13 日記「大七喉痛甚，移入滿鐵醫院」，14 日記有鄭垂罹患症狀「唇舌皆腫，語言不清」、「往撫其額，猶熱，口鼻皆為痰塞」，⁴⁰⁵當日竟因此病逝，鄭孝胥悲痛萬分，作《哀垂》詩，抒發喪子之痛，惟卻未提到鄭垂病因，鄭垂靈柩停放在長春般若寺，⁴⁰⁶由鄭禹處理治喪事宜，待鄭禹探視鄭垂大體時，發現七孔流血，故鄭家皆懷疑是被關東軍毒害，當時鄭垂遭害的傳聞也逐漸流傳，⁴⁰⁷據鄭禹之子鄭穎達回憶，認為鄭垂之所以被害，是因為鄭垂與日本內閣之間關係密切，關東軍視其為掣肘，便將其毒害。⁴⁰⁸後鄭垂之子鄭統萬，遂因此殺父之仇，與族妹鄭崑崙，⁴⁰⁹於 1939 年一同參加「北平抗日殺奸團」，殺奸團大約在 1937 年成立，1939 年包括鄭統萬在內的數名成員共同組織「北平抗日殺奸團」，殺奸團招收北平地區的中學學生入團，主要活動為蒐集日軍情報、製造燃燒彈及武器，北平抗團的物資及重要文件存放在鄭統萬、鄭崑崙家，因兩人為鄭孝胥孫子，容易躲過日軍的監視，較為安全，國民政府軍統局曾經想將抗日殺奸團成員造冊並加入國民黨，也曾利用抗團調查共產黨情報，惟抗團認為入黨不符合其宗旨，對於造冊入黨及調查共黨等事藉故遷延，並未積極配合，仍以抗日或暗殺漢奸為要務，1940 年 8 月由於有抗團成員被日本特務逮捕，事情敗露，牽連甚眾，北平抗團成員大多被捕，鄭統萬及鄭崑崙亦被捕，鄭禹得知之後動用各種關係全力營救，日人念在兩人是已故前總理鄭孝胥子孫的關係上，才將兩人釋放，戰後抗團依照軍統局

404 初國卿，〈魂歸漁樵寨（上）——郭松齡韓淑秀墓重建記〉，《芒種》，期 9(2014 年)，頁 45。

405 1933 年 2 月 9、13、14 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五冊，頁 2441 至 2442。

406 現址在吉林省長春市長春大街 377 號。

407 見愛新覺羅溥儀著，高陽序，《末代皇帝自傳》新修版，頁 369；羅繼祖《蜉寄留痕》，頁 133。

408 李君，《1931 年前鄭孝胥》，頁 304。

409 鄭孝胥五子鄭何女兒。

戴笠的指示，發給工資並解散組織，⁴¹⁰後鄭統萬定居台灣，在台北市北一女中擔任數學教師，鄭崑崙定居在北京。⁴¹¹



410 定宜莊，《八旗子弟的世界》（北京：北京出版社，2017年2月），頁176至181。

411 周文業編寫，邵瑜審定〈母親鄭遜軼事〉，收錄於北京清華校友總會網頁，<https://www.tsinghua.org.cn/info/1023/31347.htm>（2024/1/7點閱）。

第五章 結論

鄭孝胥自甲午戰爭後回到中國，進入張之洞幕府，1897年與盛宣懷結識，盛對於鄭非常欣賞，先後委任他商會公所參贊及鐵路總公司購料處總辦等職，1898年因受張之洞薦舉而獲光緒帝召見，故得參與戊戌變法，上書直陳意見，後詔授總理衙門章京，惟因戊戌政變發生，鄭孝胥見事不可為，亦無心政務，遂請病假回到上海，未再回到總理衙門任上，仍回到盛宣懷幕，1898年11月盛宣懷委任鄭為蘆漢鐵路南段總辦，1900年會義和拳亂及八國聯軍事起，蘆漢鐵路停工，鄭孝胥離任總辦，轉任湖北全省營務處總辦。

1910年鄭孝胥受錫良、程德全邀請往奉天，參與籌辦錦瑗鐵路事宜，時錫良主張開放，基於日俄兩國侵奪東北的局勢，主張訂借外債以盡速修築鐵路，當時奉天紳民反對開放政策，鄭孝胥首先說服奉天諮議局議員，繼而前往奉天，先後擬定錦瑗鐵路包工草合同以及借款合同，與交涉司鄧邦述負責與英國寶齡公司、美國奉天總領事司戴德會商合同細節，又錦瑗鐵路未能獲得批准，一因受到日俄兩國的反對，兩國都向外務部施壓，二因清廷正在施行幣制改革，鄭孝胥及錫良幾次進京說服朝廷，最終在內外壓力之下失敗，然鄭錫二人仍然持續遊說朝廷，鄭孝胥一面替錫良草擬奏摺，一面在報紙上投書「四大幹路說帖」，主張朝廷應大舉訂借外債，興築粵漢、川藏、張恰、伊黑四段幹路；1910年雲貴總督李經羲向各督撫發電報，呼籲成立國會以應付新政，各督撫紛紛回電，鄭孝胥除了替錫良擬電稿，請朝廷速開國會之外，更將奏稿向報紙投書，力圖營造輿論，各省諮議局也紛紛請清廷縮改開設國會年限，最終朝廷下令彈壓，不再縮改，鄭孝胥主張速開國會，對此結果感到失望。

1911年清廷發布上諭全國幹路收歸國有，5月時郵傳部大臣盛宣懷拜訪鄭孝胥，兩人在當時皆贊成鐵路收歸國有，鄭孝胥也替盛代擬收回商辦鐵路奏稿，鄭孝胥在6月20日補授湖南布政使，先後進京會見盛宣懷以及攝政王載灃，並力倡借債包工、速造鐵路，又親自作《覘國談》文章投書報紙，呼籲大眾研究借債造路說，鄭孝胥的主張大多是基於國防，認為施行借債造路能吸引外資，暗含牽制列強的用意，但他的包工主張在當時受到許多輿論批評，

6月四川保路運動發起，10月武昌起義發生，鄭孝胥對於革命甚為反感，認為尚是改革之時代，惟各省陸續獨立，鄭在22日回到上海。

辛亥革命之後直到丁巳復辟之前，鄭孝胥的社交生活主要為參與「讀經會」、「一元會」，與日本人宗方小太郎、波多博等往來，讀經會的創立時間在1912年7月15日，總計成員有沈瑜慶、王仁東、林開謩、劉宣甫、吳學廉、吳學莊、楊小宋、陳樹屏、壽蔭、金邦平、陳立村、劉樹屏，讀經會成員大多為鄭孝胥的親屬或同年，讀經會大約一週一次，每次出席成員不定；一元會創立於1915年1月31日，為鄭孝胥與王午同年釀飲，總計成員有馮煦、朱祖謀、王乃徵、陳三立、楊鍾羲、李鞠農，章梲、唐宴、鄭績臣、鄭堯臣，為鄭的王午同年以及其他朋友，一元會會期不定，每次出席成員亦不定，其經常宴飲的菜館約有：式式軒、古淪軒、都益處、別有天、小有天、廣福樓、雅敘園等；鄭孝胥與宗方小太郎的第一次見面在1899年11月24日，此時鄭在漢口鐵路公司擔任盧漢鐵路總辦，之後再次見面已是1912年4月，波多博為宗方的弟子，宗方小太郎曾參與東亞同文會，後主要在中國蒐集情報，定期匯報給日本海軍，1913年宗方小太郎與鄭孝胥、西本省三、波多博共同創立「春申社」，創辦《上海》雜誌，鄭孝胥與宗方小太郎、西本省三、波多博等人的往來、宴飲、詩文、言談等成為鄭孝胥日常生活的一大活動，透過他們的集會宴飲也使鄭孝胥結識了許多日本軍政學界人士。

出現在鄭孝胥日記的家族成員，有妻吳中照、弟鄭孝樾、長子鄭垂、次子鄭禹、四子鄭勝、五子鄭何，長女鄭景、三女鄭惠、四女鄭文淵，鄭孝胥對於子女的教育非常關心，除了親自挑選報名學堂，他也經常會親自給子女出日課，諸如讓子女寫詩再由他批改，練習古文，研讀儒家經史典籍，足見鄭孝胥對於子女的教育融合中西，不僅非常重視並且皆親自參與；鄭孝胥的家庭活動非常豐富，例如聽戲、以及遊逛上海的景點，例如群仙茶園、丹桂第一台，景點如上海樓外樓以及大世界、張園、愚園等；鄭孝胥曾納上海名伶金月梅為妾，兩人初次見面於1902年，鄭在群仙茶園見到金月梅，對其讚譽有加，往後鄭多次往群仙茶園聽金月梅唱戲，兩人也逐漸往來密切，1903年4月19日岑春煊調補兩廣，鄭在六月前往龍州，兩人遂分

居至 1906 年，期間兩人因分隔兩地，情感漸生睽隔，1906 年鄭孝胥將金月梅母女接回上海，賃屋別居，但金月梅在 1907 年突然分手，兩人的關係遂告結束。

鄭孝胥在民國成立後仍然主張君主立憲，反對共和，在他看來，民主共和政體會導致當時的中國動亂頻仍，而不利於國家發展，然而相對於宗社黨等保皇的立場，鄭對於民主共和制度本身卻似乎並無惡感，他認為當時的革命黨人以及支持革命的立憲人士不足當此重任，共和制度本身在鄭的認知中倒是不失為一良善之制；鄭孝胥在日記中對於升允頗為讚賞，升允在民國成立之後繼續在陝西用兵，並說服其舊部起兵，欲奉清室在陝西復辟，惟無人響應，後遂加入宗社黨活動，積極從事復辟，鄭孝胥將其比為元末名將王保保，認為升允是復辟的適合人選，可惜因無人襄助，難以成功。湯壽潛字蟄先，鄭與湯同為預備立憲公會同志，1908 年 7 月 11 日，鄭孝胥與湯壽潛共同擬電稿，以立憲公會的名義致電憲政編查館，要求速開國會，此次請願最終未果，湯脫離預備立憲公會，鄭則辭去會長一職，湯壽潛在浙杭甬鐵路風波中，極力反對將浙江鐵路收歸國有，堅持自辦，拒絕借債，在辛亥革命以後湯壽潛轉向支持共和，鄭孝胥則希望保存皇室施行君主立憲，兩人在民國成立之後逐漸減少往來。

鄭孝胥自從辛亥革命以後希望由袁世凱施行君主立憲，期待袁世凱能盡「臣節」，效忠清室，甚至袁世凱就任大總統後，仍期待他能還政清室，隨著時間過去鄭孝胥終於不再相信袁世凱還政一事，及至 1916 年袁世凱稱帝，鄭孝胥以「亂臣」視之，鄭雖然厭惡革命黨，其視革命黨如「賊子」，然而尚能敬重之，自鄭孝胥的理念觀之，則認為「賊子」革命黨猶勝於「亂臣」袁世凱；在袁世凱病歿後，張勳先後召集徐州會議並聯合倪嗣冲以及各省成立「督軍團」，5 月會黎元洪段祺瑞府院之爭，召張勳北上調停，張勳率其部定武軍入京並在 7 月 1 日擁戴宣統帝復辟，段祺瑞隨即在天津組織討逆軍攻張，11 日張軍潰敗，復辟乃歸於失敗，在丁巳復辟期間，鄭孝胥並未參與，然而對於復辟的進展及消息卻是時時留意，復辟消息傳來時，即命長子鄭垂買上海各大報，大多反對，鄭認為復辟將危及皇室，及至 7 月 9 日清室再度退位，鄭孝胥憤恨丁巳復辟將他排除在外，其認為復辟失敗的主因在人，換言之若是鄭認為有實力才能者，則並非不可能。

在丁巳復辟之敗之後鄭孝胥開始與陸榮廷接觸，陸榮廷為鄭任廣西邊防督辦時的舊部，

鄭孝胥離開廣西後兩人較少聯絡，1914年陸榮廷北上，被任為兩廣巡閱使，4月1日進京謁見宣統帝，獲得了清室的好感，4月20日陸榮廷返回上海，親自拜訪鄭孝胥，兩人於是恢復往來，1918年1月，鄭孝胥拜訪胡嗣瑗談復辟事，兩人決定了以張勳、陸榮廷合作為主的復辟策略，鄭孝胥長子鄭垂也受陸榮廷聘為顧問，1920年7月直皖戰爭發生，鄭孝胥透過曹經沅接觸皖系要人王揖唐，請王勸段祺瑞恢復張勳、陸榮廷巡閱使之職，曹經沅回復鄭，稱張陸二人復職之事需待南北議和之後，直皖戰爭結束後約一月，粵桂戰爭隨即爆發，鄭孝胥對於桂系的表現期待甚高，然粵桂戰爭的發展，桂系陸榮廷不敵陳炯明，最終退出廣東，1921年6月第二次粵桂戰爭爆發，此役以桂系潰敗告終，7月22日陸榮廷登報下野，鄭孝胥得知消息後甚為憤怒，日後鄭孝胥雖然仍繼續與陸榮廷有書信往來，然其計畫以支持張勳陸榮廷等軍閥為主的復辟策略最終宣告失敗。

1923年鄭孝胥經清室太傅陳寶琛引薦得以在遜清朝廷中任職，清室遜位之後，按清室優待條款，民國政府每年需移撥四百萬兩與清室，然而經費時常拖欠，故為了維持皇室的日常開支，內務府經常抵押宮中文物，及至遜帝溥儀漸長，開始力圖改革內務府，1923年8月22日經胡嗣瑗勸說，鄭孝胥入京謁見，這次會見使溥儀對鄭孝胥大為傾倒，於是便安排讓鄭氏來主持紫禁城皇產事業清理以及財政改革，鄭孝胥的改革包括裁減宮中開支、古玩寶器變賣或抵押折現、再將款項存入銀行，以增加利息存款，也計畫裁併內務府中的機構等，除此之外也計畫出借清室的文淵閣四庫全書給商務印書館，是鄭孝胥的開源策略，惟遭民國政府出於利益及政治的考量而阻止，出版計畫未能成功，而鄭孝胥自擔任內務府大臣之後也在各種壓力之下，幾次辭職，6月25日上諭開去鄭孝胥內務府大臣一職，仍在懋勤殿行走。

1924年9月直奉戰爭爆發之後，馮玉祥率部開往熱河，10月22日突然返回北京，23日控制北京並發動政變，總統曹錕及總理顏惠慶先後辭職，由黃郛任總理，11月4日在馮玉祥建議下，黃郛內閣通過了修正清室優待條款，五日馮玉祥部下鹿鍾麟即率軍包圍紫禁城逼溥儀出宮，溥儀往醇親王府，11月27日莊士敦、鄭孝胥、羅振玉共同請溥儀離開醇王府，計畫先往德國醫院，再往使館區，11月29日，莊士敦、陳寶琛和溥儀先乘車往東交民巷德國醫院，抵達醫院之後，莊士敦又馬上往英國使館交涉保護溥儀事宜，莊走後鄭孝胥抵達德國醫院，

在奉溥儀之命往日本使館知會竹本大佐之後，鄭孝胥與溥儀乘車往日本使館，陳寶琛也隨後抵達，公使芳澤安排房間。

從溥儀出奔日本使館的過程看，可以得知鄭孝胥及羅振玉兩人之間的矛盾，雖然兩人之間互有矛盾，然而兩人也確實都為了溥儀的安全以及行止而奔走活動，惟從史料上看，出奔日使館之行動主要由鄭孝胥促成，到了日本使館稍微安定之後，眾臣又對優待條件的問題發生爭論，鄭孝胥主張爭取恢復原條款，並曾向溥儀表示能藉由他和段祺瑞的關係爭取恢復優待條款，惟段祺瑞最終並未恢復優待條款，鄭孝胥因此受到攻擊，羅振玉又電召升允來京以為奧援，使溥儀疏遠鄭而親近羅，鄭孝胥遂在 1924 年 12 月 6 日請假回上海，後溥儀向羅振玉提出希望赴日之後，羅遂與館書記官池部政次安排，先後與段祺瑞交涉，羅振玉父子再隨同溥儀赴天津，最終住進天津日租界的張園。

鄭孝胥自 1925 年至 1931 年跟隨溥儀在天津，鄭孝胥在這七年所做的復辟舉措主要有三個方面，一為聯絡軍閥以及外籍軍政界人士，二為提出〈三共論〉，三為與日本人士的往來，以鄭孝胥本身對於復辟的理念而言，並非堅定的用武人派，但他支持溥儀聯絡軍閥，鄭孝胥在七年間見過的軍閥甚多，包括直系吳佩孚、齊燮元，奉系張作霖、張宗昌、李景林、褚玉璞等，在北京政變以前鄭孝胥就與吳佩孚有往來，天津時期接觸過張作霖，除了連絡軍閥之外，鄭孝胥還提出了聘雇外國人為顧問的「用客卿論」，主要有三個人，其一為流亡沙俄將領謝米諾夫，其二為流亡奧國男爵阿克第，三為英國人羅斯，鄭孝胥對於此三人皆予以經濟援助，希望他們能成為復辟的助力，但都沒有任何成果。

鄭孝胥在天津時期曾經預測中國的未來，此即「共氏三世」圖讖，後世或稱「三共論」，其內容「共和生子曰共產，共產生子曰共管，共氏三世，皆短折，共氏遂亡，皇清復昌」，⁴¹²三共論總結了中國從晚清到民國時期的演變，共和即民國，生子曰共產一句是鄭孝胥預言民國將被共產黨推翻，共產生子曰共管一句則是預想中國被共產黨統治之後將會引起國際共管中國，最終由溥儀復辟登基，總結成為清朝、共和、共產、共管、清朝的演變順序，三共論包含了鄭孝胥的復辟策略以及治國理念，日後成為其復辟策略中的重要理論。

⁴¹² 1925 年 11 月 16 日日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第四冊，頁 2072。

鄭孝胥在天津時期對溥儀出洋或「聯日」的態度，一向是反對的，其原因，除了因為與支持「聯日」的羅振玉競爭之外，也因為鄭孝胥追求國際共管，在結外援一事上並不把日本當作其唯一選擇，故在九一八事變之後溥儀前往東北之前，大致言之，日本天津司令部與羅振玉較為親近，而日本領事館與鄭孝胥、陳寶琛等較為親近。1927年6月30日，時值北伐，羅振玉建議溥儀避往旅順，鄭孝胥仍是不贊成溥儀離開，1928年9月，鄭孝胥親赴日本，與日本軍政界人士交換意見，使他相信日本會成為將來「共管」時代的合作對象，並且等時機成熟之後日本將積極協助溥儀復辟，此次赴日使鄭對日本軍政兩界的想法發生變化，對於日本的印象也大為提升。

1931年918事變之後鄭孝胥的想法已經由原來親近領事館轉而欲依靠軍部勢力，一方面領事館對於溥儀復辟一事向來較為謹慎，相對之下軍部顯得更為積極，故鄭認為軍部是更能倚仗的勢力，另一方面在九一八事變之後，鄭孝胥認為此前他訪問日本所提到的「開放之期」已經到了，開始與關東軍方面聯繫，11月2日土肥原賢二拜訪溥儀，兩人初次談論關於未來滿洲國國體問題，土肥原承諾將成立帝國，並要求溥儀在11月16日前往東北，之後溥儀又與眾臣召開會議，詢問關於前往東北的意見，鄭孝胥因主張與日本合作而與，陳寶琛以及胡嗣瑗等人發生衝突。

溥儀抵達東北之後，原本由羅振玉與板垣征四郎會商「新國家」的問題，但由於羅振玉堅持復辟清朝，故與關東軍的會商進展不順利，關東軍漸漸不滿於羅振玉，而以鄭孝胥為談判對象。1932年1月29日，鄭孝胥、羅振玉、板垣征四郎舉行會談，板垣對鄭羅二人介紹滿洲國體制，2月22日鄭孝胥、羅振玉出席由板垣與東北行政委員會的會議，討論國體已及官制問題，雖然溥儀及其他遺老堅持復辟清朝「以正統系」，鄭孝胥則認為此時應該與日本合作等待時機，反而勸溥儀接受滿洲國執政，2月25日板垣正式公布「新國組織大綱」，國名滿洲國，定都長春，由溥儀出任執政，鄭孝胥則在3月5日就任國務總理。在溥儀自傳中提及胡嗣瑗指責鄭孝胥以簽訂《日滿議定書》換得國務總理職位，可能並非實情，自從抵達東北以後，胡嗣瑗即已反感鄭孝胥，屢次批評他專擅，事實上在1931年底與1932年初，熙洽曾透過台灣人謝介石給溥儀捐款，請溥儀任熙洽為國務總理，謝屢次為熙洽活動，鄭孝胥頗

厭惡，斥謝為妄人，⁴¹³可見在當時鄭的確是有意出任總理的。

鄭孝胥任國務總理兼文教部長，力倡「王道主義」學說，王道主義之下再分成兩個子題「齊家說」、「弭兵說」，按鄭孝胥對王道主義的講解，所謂王道包含儒家的「內聖外王」、「克己復禮」等理念，皆為儒家修身養性之法，鄭孝胥希望將這些理念推廣至全國，進而實現王道。另外鄭孝胥反對愛國思想及軍國民教育，他也排斥民族主義，其認為愛國思想及軍國民教育為造成戰禍的元兇，而民族主義則適足以破壞滿洲國的「民族協和」，鄭過去在思想方面就有重視儒家倫常並厭惡排滿民族主義的特點，故鄭孝胥提倡王道，實在是與過去的經歷有關，惟在 1935 年鄭孝胥辭去國務總理之後，王道學說開始受到日本學者的質疑，也迫使鄭孝胥做出調整，使王道學說能同時兼顧中國日本兩者在儒學方面的歧異。

本文以研究鄭孝胥的生平為主，試圖討論鄭孝胥「借債造路」、「開放政策」等理念的背景以及鄭孝胥在民國成立之後至滿洲國成立的復辟行動，鄭孝胥早年頗有才名，在張之洞、盛宣懷幕中始他累積許多洋務的經驗，從鄭孝胥日記來看，「借債造路」概念大約在鄭孝胥籌辦錦瑗鐵路期間開始被提及，原因是因為當時東三省受到日俄兩國勢力侵略，情況危急，故鄭孝胥一到東北，主張「借債造路」正是基於此種急迫性，日後在辛亥革命前，鄭孝胥主張鐵路國有，大借外債，實際上無異於借債造路的擴大，也是希望能富國強兵，雖然日後因四川保路風潮使的鄭孝胥的理念受到質疑，甚至有人將之視為清朝滅亡原因之一，但是基本上可以認識到鄭孝胥「借債造路」、「開放政策」主張是因應時局提出的一種解方，在日後逐漸形成其個人的學說體系，自有其淵源所在，故討論到鄭孝胥「三共論」時，其早年的經歷也是需要注意的因素之一；此外鄭孝胥在清亡之前主張「速開國會」，也同樣有一種急迫性，因為注意到當時輿論對於召開國會與革命黨勢力的活動，其主張「速開國會」實有「亂扼於未萌」的用意。

辛亥革命，民國成立之後，鄭孝胥堅持忠於清室的立場，仇視民國，也確實為了復辟而奔走籌畫，從今日看來，往往認為復辟之所以不能成功，是因為共和思想深入人心，然而分析這些復辟活動，可以發現除此之外，尚有其他因素可以探討，以鄭孝胥為例，至少他本人

413 許雪姬，〈是勤王還是叛國——“滿洲國”外交部總長謝介石的一生及其認同〉，中央研究院近史所集刊第 57 期，頁 67。

並不認為在當時復辟有必定失敗的條件，而是必須爭取外援，其他如升允、張勳在從事復辟時也都有爭取外國援助的情況，另外，民國成立之後，北洋政府及軍閥率多前清官吏，其許多人同情清室，也在私下表示支持復辟，例如段祺瑞、徐世昌皆與鄭孝胥有私交，可見當時確實還存在復辟的條件，並且從陸榮廷與鄭孝胥的往來來看，在經歷丁巳復辟之後，他們對於復辟更謹慎，並且他們各自有不同的顧慮，很難有一個共同原因將其相提並論，總而言之，透過鄭孝胥的復辟活動與交往，可以發現關於復辟更多的複雜面向。

鄭孝胥參與滿洲國，並出任國務總理，使他在中國輿論被批為漢奸，許多遺老也基於國家民族的立場批評他，觀察當時報紙的評論，不乏有譏諷他出任國務總理但並未掌握實權者，但對鄭本人來說，滿洲國成立可以說是復辟的階段性成功，畢竟相對於溥儀在天津張園靜園時期，滿洲國除了主權之外，具有政府、領土、人民等，已經接近一個政治實體，故鄭孝胥在滿洲國成立之後，其追求的目標更傾向於追求滿洲國的獨立，這同時也是胡嗣瑗、羅振玉等遺老的共同目標，從鄭孝胥留下的日記及詩作來看，顯然他仍未放棄復辟的理想，故筆者認為，用階段二字形容鄭孝胥對滿洲國的看法，甚為合適。

鄭孝胥雖然敵視民國，但卻並不阻止其弟在民國任官，在其逝世之後，鄭孝胥孫子女甚至參加抗日活動，其復辟的立場與思想並未被傳承下去，出現這種情形的原因，除了前述的殺父之仇外，其實在歷朝歷代早有先例，明末清初的徐介「遺民不世襲」即是一種例子，這種態度的特點在於王朝遞嬗之後，前朝遺民堅守忠於前朝的立場，但僅及身而止，並不會要求自己的子姪輩也繼續傳承遺民立場，鄭孝胥除了弟弟和孫子女之外，鄭孝胥的交友之中不乏有在民國任官者，甚至其本身也並非絕對的敵視共和制度，似乎可以認為鄭孝胥雖然以清遺老自居，但並不試圖向家人或朋友輸出自己的立場，更傾向其個人理念的堅持。

本文囿於筆者才疏學淺，對於鄭孝胥的分析顯有不足，希望未來能有更多史料出現或新的理論方法，俾利後人能對鄭孝胥有更全面的認識。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一、史料

上海明社出版部編，《國際聯盟調查團報告書》。上海市：上海明社出版部，1932年10月。

王景春等編，《中國鐵路借款合同全集》。鐵路協會，1916年，臺灣華文電子書庫。

王彥威、王亮編，《清季外交史料》（自光緒二十一年四月至二十六年十二月）。臺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浙江省蕭山市委員會編，《湯壽潛史料專輯》，杭州市：政協浙江省蕭山市委員會文史工作委員會，1993年3月。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上諭檔》，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

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北京市：中華書局，1993年10月。

吉林省圖書館偽滿洲國史料編委會編，《偽滿洲國史料》。北京市：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2002年。

杜春和，林斌生，丘權政編，《北洋軍閥史料選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1981年。

岑春煊，《樂齋漫筆》。臺北縣永和鎮：文海出版社，1971年。

汪詒年纂《汪穰卿(康年)先生傳記遺文》。臺北縣永和鎮：文海出版社，1966年。

宓汝成編，《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臺北：文海出版社，1977年。

金梁，《遇變日記》。收錄於文史資料選輯第13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著，北京市：中國文史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瀋陽市：遼瀋書社，1993年。

周和平等輯，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183冊。北京市：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

周秋光編，《熊希齡集》。長沙市：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

胡嗣瑗著，裘陳江整理，《胡嗣瑗日記》。收錄於中國近現代稀見史料叢刊，第四輯，南京市：鳳凰出版社，2017年6月。

徐世昌，《退耕堂政書》。臺北縣永和鎮：文海出版社，1968年。

徐世昌，《東三省政略》。長春：吉林文史工作室，1989年。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

史委員會，1981年。

桐鄉盧氏校刊，《桐鄉勞先生(乃宣)遺稿》。臺北縣永和市:文海出版社，1969年。

莊士敦著，高伯雨譯《紫禁城的黃昏》。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2012年4月1日。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北京市:中國書店，1990年10月。

莊建平主編，《近代史資料文庫》第二卷。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1月。

盛宣懷，《愚齋存稿》。臺北縣永和鎮:文海出版社，1975年。

許指嚴撰，《新華秘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4月。

國家檔案局明清檔案館編，《戊戌變法檔案史料》。1958年4月。

陳曾壽，陳曾植：《局外局中人記》。收錄於《文史資料選輯》第19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北京市: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

張謇，《張謇全集》。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

許寶蘅著，許恪儒整理，《許寶蘅日記》。北京市:中華書局，2010年。

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杭州市: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

愛新覺羅溥儀著，高陽序，《末代皇帝自傳》新修版。臺北市:風雲時代，2014年6月初版。

劉大鵬著，喬志強注，《退想齋日記》。北京市: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年1月。

鄭孝胥著，《王道管窺》，新京市:國務院總務廳情報處。1934，臺灣華文電子書庫。

鄭孝胥著，《王道講演集》。臺中市:文听閣圖書，2010年5月。

鄭孝胥著，黃坤、楊曉波校點《海藏樓詩集》(增訂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劉義慶著，劉孝標註，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

錫良，《錫良遺稿》。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編，北京市:中華書局，1959年。

舉國社編，《大滿洲國名鑑》，康德元年版。

羅振玉，《羅雪堂先生全集》五編冊一。臺北市:文華出版社，1969年。

羅曼諾夫著，民耿譯，《帝俄侵略滿洲史》。臺灣學生書局，1973年。

二、報紙雜誌

《大中華》雜誌

《小日報》

《上海畫報》

《小說新報》
《中央日報》
《文教月刊》
《民立報》
《申報》
《民報》，北京市：中華書局，2006年9月。
《東方雜誌》，臺北市：臺灣商務所書館，1971年至1976年。
《社會日報》
《南京晚報》
《紅雜誌》
《時事新報》
《盛京時報》
《國風報》，何國楨、梁啟超主編，臺北市：漢聲出版社，1975年。
《國聞週報》，天津國聞週報發行社，1933年7月10日。
《順天時報》
《漢口中西報》

三、著作

山室信一著，林琪禎等譯，《滿洲國の實相與幻象》。新北市：八旗文化出版：遠足文化發行，2016年5月。

日本歷史學研究會編著，金鋒、冷明、孔知行、王炳達、馬君雷等譯，《太平洋戰爭史》第一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

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第一版，1979年。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著，《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十五輯》。北京市：中國文史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

白蕉，《袁世凱與中華民國》。臺北市：文海出版社，1971年。

李君，《1931年前鄭孝胥》。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9月。

李喜所編，《梁啟超與近代中國社會文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聯經出版；2009年初版。

定宜莊，《八旗子弟的世界》。北京：北京出版社，2017年2月。

- 胡平生，《民國初年的復辟派》。臺北市:臺灣學生，1985年。
- 高勞，《辛亥革命史》。臺北縣永和鎮:文海出版社，1971年。
- 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6年7月。
- 張守真，《清季東三省的鐵路開放政策》。高雄市:復文圖書出版社，1995年8月。
- 連振斌，《錫良與清末新政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10月。
- 張樹年主編，《張元濟年譜》。北京市:商務出版社，1991年。
- 劉衍文，《寄廬茶座》。上海:漢語大辭典出版社，2004年11月出版。
- 錢鍾書，《錢鍾書集:寫在人生邊上、人生邊上的邊上、石語》。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
- 翹生，《復辟紀實》。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八十輯，臺北縣永和市:文海出版社，1996年。
- 羅惠縉，《民初文化遺民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1年8月。
- 羅繼祖，《蜉寄留痕》。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四、論文

- 于海超，〈鄭孝胥與日本關係探研〉。河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12月。
- 朱靜，〈清末民初鄭孝胥社會交誼探究〉。華中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5月。
- 黃昱翰，〈重把乾綱握？——滿洲國帝制之成立與時人認識〉。國立臺灣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16年6月。
- 朝野松史，〈排日問題與中日交涉（1919-1920）〉。東海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17年6月。
- 鄒金喜，〈從「此邦俗亦偷」到「今日日光輝萬國」：鄭孝胥日本觀的轉變歷程〉。國立清華大學歷史所，2009年1月。

五、期刊

- 王慶祥，〈陳寶琛與偽滿洲國-兼論陳寶琛的民族立場問題〉《社會科學戰線》，第二期，（1996年）。
- 方艷華，〈偽滿“王道政治”的出籠與其異化錯位研究〉，《蘭州學報》，第5期，（2007

年)。

李君，〈鄭孝胥在上海的遺老生活及其社會交往〉，《福建師範大學學報》，第2期，(2015年2月)。

沈燕，〈偽滿國務總理大臣鄭孝胥述評〉，《大連近代史研究》，第0期，(2014年)。

林志宏，〈王道樂土—清遺民的情感抵制和參與滿洲國〉，《新史學》，第十八卷三期，(2007年9月)。

林志宏，〈舊文物，新認同——《四庫全書》與民國時期的文化政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7期，(2012年9月)。

林志宏，〈地方分權與自治——滿洲國的建立及日本支配〉，收錄於黃自進、潘光哲主編，《近代中日關係史新論》，(新北：稻鄉出版社，2017年)。

林志宏，《危機中的烏托邦：西本省三對民國的觀察和議論，1912- 1928》，《思想史》，第8期，(2018年12月)。

周佳榮，〈近代日本人在上海的辦報活動(1882—1945)〉，《社會科學》，第6期，(2008年3月)。

初國卿，〈魂歸漁樵寨（上）——郭松齡韓淑秀墓重建記〉，《芒種》，第9期，(2014年)。

茅海建，〈戊戌年徐桐召張之洞及楊銳、劉光地之陰謀〉，《中華文史論叢》，第4期，(2007年)。

馬陵合，〈從“開門通商”到“厚集洋債，以均勢力”——徐世昌與東北外交策略的變化〉，《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14卷第2期，(2004年6月)。

馬陵合，〈借款可以救國?——鄭孝胥鐵路外債觀述評〉，《清史研究》，第2期，(2012年5月)。

張玉法，〈清末民初的官督商辦工業〉，《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十七期下冊，(1988年12月)。

張笑川，〈鄭孝胥在上海的遺老生活(1911—1931)——以《鄭孝胥日記》為中心〉，《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0期，(2012年)。

許雪姬，〈是勤王還是叛國——“滿洲國”外交部總長謝介石的一生及其認同〉，《中央研究

院近史所集刊》，第 57 期，(2008 年 9 月)。

章開沅、田彤，〈東南精英與辛亥前后的政局〉，《史林》，第 4 期，(2005 年)。

陳慶華，〈紳商企業與官府關係-以鄭孝胥與日輝織呢廠為例〉，《青春歲月》，第 9 期，(2013 年 5 月)。

喻大華，〈論民國政府處理遜清皇室的失誤〉，《史學月刊》，第 3 期，(2000 年)。

程太紅，〈清遺民復辟活動論略〉，《安慶師範大學學報》，第 5 期，(2019 年)。

黃自進，〈918 事變時期的日中政治動員與軍事作戰〉，《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26 期，(2006 年 11 月)。

胡春惠、唐啟華主編，《兩岸三地歷史學研究生研討會論文 2007》，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香港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2008 年初版)。

傅道彬、王秀臣，〈鄭孝胥和晚清文人的文化遺民情結〉，《北方論叢》，第 1 期，(2002 年)。

楊凡逸，〈唐紹儀與 1911 年南北議和〉，《中央史論》，第 26 輯（首爾：中央史學研究所，2007 年 12 月）。

雷家聖，〈失落的真相-晚清戊戌變法時期的合邦論與戊戌政變的關係〉，《中國史研究》，第 61 輯，(2009 年 8 月)。

熊月之，〈辛亥鼎革與租界遺老〉，《學術月刊》，第 9 期，(2001 年)。

劉冬梅、王麗麗，〈清末錦璣計畫研究〉，《東北史地》，第 3 期，(2014 年)。

戴海斌，〈宗方小太郎與近代中國——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所藏宗方文書閱讀札記〉，《中山大學學報》，第 4 期第 53 卷，(2013 年)。

韓華，〈梁濟自沉與民初信仰危機〉，《清史研究》，第 1 期，(2006 年 2 月)。

日文部分：

一、史料

中村謙三編，《三十七・八年役大阪毎日新聞戰時事業誌》，大阪毎日新聞社，1908 年 7 月。

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日本國際聯合協會發行。

宗方小太郎著，大里浩秋整理《宗方小太郎日記》，神奈川大學人文學研究所報。

滿洲帝國協和會編，《滿洲帝國協和會組織沿革史》，東京都:不二出版株式會社，1982年。
德富猪一郎著，《公爵桂太郎傳 坤卷》，東京市:故桂公爵記念事業會，1917年，國立臺灣圖書館。

鶴見祐輔著，《後藤新平》，後藤新平伯傳記編纂會出版。

二、報紙

《上海・上海週報》，神戶大学附属図書館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

《滿洲國政府公報日譯》第一號，國立公文書館。

三、專書

嵯峨井建，《滿洲の神社興亡史》，東京都:芙蓉書房出版，1998年8月。

三、期刊

藤谷浩悦，〈芥川龍之介の長沙遊歴—1921年の排日運動を中心に〉，《中国研究月報》，
Vol.74 No.5(2020年5月)。

